羅斯福見聞秘錄

AS HE SAW IT

小羅斯福著・李嘉譯

新羣出版社印行

一之叢文實現

羅斯福見聞秘錄

著福斯羅·奧利伊
譯　　嘉　　李

新羣出版社
一九四七年

現實文叢之一

羅斯福見聞祕錄

著作者　伊利奧・羅斯福
翻譯者　李　嘉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版

序

我的丈夫對於歷史時常有很大的興趣，並且時常覺得人類應該利用現實的遭遇作爲未來的指針。我知道他會要每個人都儘量地寫下他們自己的印象與思想，他希望這樣可以幫助增進世界各個民族間深切的諒解，並且對世界和平的保持亦將是極有價值的工具。

他的家庭觀念是相當强的，祇要一有機會，他總是想法子把他的孩子叫了來，跟他就在一起。可是他是絕對不會叫他們來的，假如他們的來會妨害他們自己的工作；如果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個感覺到他父親的需要會阻礙他特殊的任務，那麼，我的丈夫總是讓他自由發表意見 並且以他的想法爲最後決定的因素。

這就告訴了我們爲什麼在很多的事件與場合中，他總是設法叫他的孩子們，有時候包括他的女壻與他的唯一的女兒，去和他一起就一個時期，祇要他們的工作或是個人的職責並不阻礙他們去。他是如此地渴望着他們的陪伴，以致有一次他把我們的大兒子，詹姆士，帶到華盛頓去做他的祕書，雖然我們告訴他這對於詹姆士是太不公平了，可是他却不肯聽從。事先我們還曾經警告過他，說這種舉動可能會引起政治上的攻擊，同時因爲詹姆士是他的兒子的關係，他對他父親的工作價值也許會因之減損的。不幸地這些警告都變成了事實，最後詹姆士不得不放棄這一重職務上的關係，可是我想，當詹姆士在華盛頓的時候，我的丈夫的確因爲他的常在跟前，一起工作，而得到甚大的滿足與安慰的。一個人沒有經驗過作爲一個大總統的寂寞，恐怕是很難能够體會到這種渴望與家屬接近的想念與感覺吧。

在我們這一家中時常有一種很特殊的習慣，就是每當家屬中的任何一人旅行歸來，我們總是在他歸來後的第一晚，團聚在一起晚餐，使我們能夠聽他談說他在旅行期間的一切印象和發生的事故。我們都知道我們各人的生活實在太忙碌了，假如我們不立刻聚在一起，這一次旅途中的見聞會很快地失掉它的新鮮性，開始模糊起來，終於被新的工作，新的事故所吞沒，而我們將永遠無法趕得上那一段過去。

我自己一次都沒有參加這本書中所報導的那好多次創造新歷史的旅行，因此我寫的祇是局限於在那幾次家屬重新團聚的第一夜中所聽到的一切。可是伊利奧却曾經目覩這一切。我還記得他從那幾次旅行中歸來時的興奮的神情，現在讀到他關於那些重要的日子的更完備的記載，我感覺到有加倍的興趣。

這本書中所記載的很多事物，我，當然是一無所知，並且也不曾與之發生任何關係，可是我覺得，在目前每一個人，祇要他曾經有機會密切地觀察過戰爭推行的任何一面，或是參加過建設和平的未來世界組織的計劃，都應該忠實地寫下他的記錄，而對於這一類記錄的價值，我是有絕大的信仰的。

當然，每個人總是從他自己的觀點來報告他所見到的，聽到的，經歷到的事物。每一個人對於任何一個事件，一個場面，都有他自己獨特的印象，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同樣的事實却有着許多不同樣的記載。有許多人是曾經親自聽到這本書中所記載的好多次的談話的，可是我相信他們一定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思想與信仰，來解釋這些談話的意義的。這許多不同的個人所寫下的不同的記錄都一樣是十分可以珍貴的。這本書是一個觀察者對這一次世界大戰中幾次重要會議的最直接的報導，未來的歷史家們將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很珍貴的資料，足以幫助他們對歷史作最後的評價。

——羅斯福夫人。

前言

這本書恰巧是本關於戰爭的書。可是我寫這本書的最重要的動機却是想給和平以新的光度，新的啓示。

在這本書中我所預備描寫的事件，我所記得的談話，以及形成我目前的信心的那些印象與事故，約略地算來，都是從戰爭的開始一直到雅爾塔三巨頭會議以後這個長時期內所發生的。在那個時期，我可以坦白地向讀者們告白，我是絲毫沒有打算把這許多事件寫成一本書的念頭的。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樣一本書是最近被許多急迫的新事件所驅使的。邱吉爾在福爾頓和密蘇里的講演；在紐約市舉行的安全理事會會議以及會議席上各人所發表的意見；逐漸增加的美國原子彈的屯積；領導世界的幾個大國間的趨向分裂的象徵，許多背棄了的諸言，以及在貪婪而陰險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重新抬頭的强力政治；這種種都是促成我寫這一本書的重大的因素。

我們這一時代的節奏是很特別的，那就是說，我們的意見與輿論的根據並不是歷史的事實，而是報紙的標題。我們對蘇聯信任或不信任的決定條件並不是它在這次大戰中對勝利的偉大的貢獻（這依然是我們這一代中天大的一個事實）；而是三四天來報紙第一版上驚人的報導與標題——這些報紙在已往是往往不負責任的。因之，在動盪的今日，它們的立場與用意是加倍地值得懷疑。我們關於對英貸款的這

個觀念的形成並不是因爲我們回憶到當年掉在倫敦的飛彈的轟炸，或是想到仍在繼續中的英國的糧食的缺乏；而是由於我們顧慮，並且懷疑英國的帝國的企圖。在戰爭中使我們獲得勝利的是團結，而在戰後，假如我們想獲得眞正的和平，我們還是必須維持這種團結。這是極其簡單明瞭的一件事；每一個有點頭腦的中學生都能用這個題目來寫出一篇動人而極有說服力的論文來。但是在事實上，自從歐戰勝利那一天起，自從第一顆原子彈擲下以後，這一種團結便一天一天地破滅了。

也就是因爲我感覺到我們是一天天地走向這種團結的相反的方向，因爲我確信我們是在被一些應該認識得更清楚的人們推向分裂的途徑，我才開始覺到我應該寫這本書的重大的使命。

可是爲什麼要我來寫呢？我又有什麼東西來貢獻給讀者呢？在任何一次像這次大戰一樣的世界大動亂以後，一定會有千百種書籍像洪水似地從出版公司中流傳出來。將軍們，部長們，戰地記者們都會打起他們的打字機，或是提起他們的不甚銳利的筆來。可是雖然如此，我還是可以爲我的書劃出一個狹小，却又十分顯明而與衆不同的獨特的地位的。

我的第一層資格是屬於生理方面的，那就是說，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正如任何一種特權一樣，這種關係也有它不利的地方。我記得有一次他便親自和我談起這種種不利——那是在海特公園中，他還是紐約市的市長，在被指命爲總統候選人之前一個多月的時候。一個在社會上有聲望的人的孩子的任何行動都足以引起公衆的注意，尤其是假如那個人有很多的政治敵人；對於這一點他是非常敏感的。可是老實說，他對於我們的行動既不能，也不想加以管束。他認爲我們的生活該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想做什麼，

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據我自己的猜想，他，像任何的做父親的人一樣，總希望，並且相信，我們能够不做犯法的事，生長成有責任感的公民，依照我們自己各人的才賦而享受快樂與成功的生活。可是一方面他却也很小心地給我們許多規戒。

不管怎麼樣，作爲一個總統的兒子的許多不便和不利却被我的第二重資格所平衡了。那就是說，我得到很多難得的機會能够參加並且目擊這次戰爭中的，也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中的許多次最重要的會議。每一次到海外去開軍事會議的時候，父親總是需要有一個他所熟悉而信任的人，最好是他家屬的一員，在他的跟前。這並不是說他不熟悉他的政治顧問們，或是說他並不信任他們；有一個兒子在他的身傍，他是可以覺得隨便得多的。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話，大聲地自己對自己說出他的思想——事實上他的確時常如此。在他的幾個兒子之中，我的地位是最容易被召喚到他那兒當他的侍從的。譬如說，在他第一次於紐芬蘭島海面和邱吉爾見面的時候，我恰好在紐芬蘭甘特湖的一個飛行偵察中隊中服務；在他到卡薩布蘭伽的時候，我的部隊正好在阿爾及爾的外圍作戰；而當他到近東來參加開羅與德黑蘭會議的時候，我們的司令部的一個基地還依舊在突尼西亞。祇有當他到雅爾塔的時候，我無法在他的身側。

當然，除開那幾次會議中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以外，在戰爭中我也回國了好幾次，有一次是病假，兩次是公差，而另一次是例假。每一次我回國的時候，總要在白宮住幾夜，因之便有機會跟他作長時間的談話。

作爲他的侍從，我便有機會參加他的許多次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約會，談話和會議，執行我的傳

遞文書，佈達命令以及整理記錄的職務。以這種半官方的資格，我得以聽到許多作戰中的盟國的代表們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涉。邱吉爾，史大林，蔣委員長，蔣夫人，盟軍的參謀長們，每一個戰場，每一個作戰部門的司令長官，史沫茲，戴高樂，吉倫，霍浦金斯，羅飛，莫洛托夫，埃及，希臘，南斯拉夫與英國的國王們，藩王，蘇丹與王子，總理大臣，大使，公使，宰相們——這些人們我都見到。我親自在門口迎接他們，帶他們進屋子，坐下來聽他們跟父親談話——然後在他們走了以後，聽我父親談論他對他們的印象。

而當長長的會議的白晝已經過去，父親對最後的一位訪客說了晚安，我總是一個人留下來，在他熄燈睡覺以前，陪他坐上幾小時，隨便地談論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交換意見和各人的印象。有的時候他也會問起我作爲一個卒中攝影軍官的工作情形；可是大多數都是我問他許多我所感覺到困惑的問題，從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籌備情形一直問到他對蔣夫人的感想。他對我有絕對的信任，以致在那次和史大林的談判後，他立刻先把那談判的結果告訴了我，而以後才告訴他的國務卿和參謀長們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父子的關係，而變成了最親近的伴侶了；他對我的愛是一種對兒子與對朋友的混合的愛。

因之，我之得以目擊這多次會議進行的機會是雙重的：一方面我是大總統的正式的侍從，另一方面我則是最初促使聯合國團結起來的那位偉大人物的最親近的友人。通過這第二重關係，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知他的內蘊的思想，和聽他談說他對軍事勝利後建設世界和平的熱烈的希望。我知道他爲世界和

平機構所安排下的條件；我知道這許多條件是在怎麼樣的談話中產生的；我知道當初的許多談判和諾言。

而現在我已經見到這許多諾言被背棄，這許多條件被藐視，和平的機構被否定。

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寫這本書的原因。寫的時候，我有屢次會議的官方紀錄本作我的參考，同時我又從我當時自己做的記錄和我的回憶中來取得補充的資料。大部份我是依靠我的記錄而不是單單憑藉我的回憶的。

這本書是爲許多跟我有同樣見解的讀者們而寫的——我們都認爲羅斯福是在戰時促成聯合國團結的建築師，羅斯福的理想和政治家的風度是足以在戰後維持這團結的完整性的；而他爲我們所指劃出的路線現在却被一些人們惡毒而又故意地遺棄了。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它可以多少幫助我們重新走回到那條路線。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其他的我是不敢想像的了。

目次

序（羅斯福夫人）……一
前言……三
一　從德克薩斯到沃根基……一
二　大西洋憲章……一七
三　從沃根基到卡薩布蘭伽……四三
四　卡薩布蘭伽會議……五七
五　從卡薩布蘭伽到開羅……一一六
六　開羅會議（一）……一三三
七　德黑蘭會議……一六〇
八　開羅會議（二）……一八七
九　從開羅——德黑蘭到雅爾塔……二〇〇
十　雅爾塔會議……二一七
十一　結論……二二八
譯後記……二三九
譯名中英對照表……一

一　從德克薩斯到伏根基

一九三八年九月，歐洲的危機終算在慕尼黑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被「解決」了；在這個時候，各人對它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依據各人對世界與人類的觀念而定的。至於我自己，說老實話，對那一次週末的緊張祇抱着絕端自私的顧慮。那時候我正準備開始一個新的事業計劃，在德克薩斯地方建立一個小型無線電台網；因此，我所担憂的祇是那些戰爭的風傳和納粹與法西斯的劍拔弩張的姿態是否會影響到我個人的收入與營利的機會。

要究明一個事件的眞相，莫過於直接向那消息的來源地打聽。那一年九月我恰巧到華盛頓去住了幾天，因此我決定去看一下父親，預備小心而機警地從他身上探出一個究竟，看當時的政治情形是否對營業會有什麼妨害。當我終於得到許可，走進他的書房和他作十分鐘的單獨會面的時候，他剛好發出他致希特勒的第二封文書，並且把文書的內容給各報館發表。我告訴他我預備收買無綫電台管理權的計劃，並且想試試是否可以使這個事業成爲一個穩固的經濟基礎。

「當然囉，」我試探地說，「最近關於戰爭的這許多傳說……」我帶着期待的神情瞧着他。他把他的椅子向後拉了一下，轉過身子來正面地對着我。沉默了一下子，我有些氣餒地接下去說：「看了許多

報上的標題，好像戰爭明天就要爆發似的。據我看，這情勢恐怕對新的事業計劃不見得會有什麼好處吧！」

他笑了一笑，回答我說：「那麼你要我告訴你些什麼呢？告訴你戰爭不會爆發？告訴你應該開始進行你的無線電台的計劃？告訴你大家毋須担心？告訴你說你第一年準可以賺錢，而在第三年的年底你就可以成爲一個富翁？」

「不，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其實，這些東西祇要是經常睜開眼睛的人都知道。歐洲的局勢遲早是要惡化的。英國和法國遲早是會感覺到希特勒幹得有些太過份的。當然，這決不致於在這個禮拜內就發生，可是這誰也沒辦法能預料。蘇聯的角色……捷克的人民……」

「可是即使歐洲有什麼變亂，不見得我們也一定要被牽涉在裏面呀？」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們一天到晚所憂慮的也就是怎麼樣使我們不被牽涉在裏面。我們都有我們最高的希望，最高的希望！」他停頓了一下，拿起他書桌上的小擺設，在手中玩弄了一陣子，冷漠地皺住眉頭。「我說，」他突如地接下去，「要是我是你的話，我一定飛快神速地立刻把你那個無線電台計劃實行起來。你毫無理由去聽信某些報紙的標題而把你的全盤計劃放棄了。抓緊住一個機會而好好地幹下去。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

這就是我談話的結局。在我回德克薩斯的途中，我極力思索他那突如其來的，過份親信的保證，而

開始懷疑到在他的字裏行間是否隱藏着其他的意思。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九月和十月，我們大多數美國人還離開現實不知有好幾百光年呢。結果，我祇是聳了聳我的肩膊而決定暫時忘記歐洲這個問題，開始我在德克薩斯的工作。

假如我們大多數美國人——當然連我也包括在內——在那時候能够少聳些肩膊而多注意些滿洲與捷克那些角落裏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今日一定會有比較圓滿一些的收獲而可以毋須流那麼多血的。爲了要證實我這一點點眞理，我翻閱了一些當時，以及更早期的公文與記錄。裏面有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我父親所主持的一個新聞記者會議的記錄。有一位懷疑主義的記者，要我父親解釋爲什麼要在太平洋建立軍備。他認爲我們是絕對無法保障菲律賓與其他的太平洋島嶼的，假如我們還得同時在西半球保障我們不受攻擊的話。而我父親的回答是這樣的：

「當然，假如你祇有一個敵人，你的話是很對的。可是假如你同時有兩個敵人，從兩個不同的地方來攻擊你呢？那麼，你的兩支脚便應該採用點機變的步伐了。你應該敏捷地先把其中的一個打倒，然後再把你的軍隊調回來打其他的一個。這是你唯一的路。」

所以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當全國正熱中於關於添設軍備的大爭辯中，父親已在盡他的全力使我們不致於毫無準備地來遭受諸似珍珠港事件之類的攻擊。在國會中緬因的布魯斯脫，紐約的漢姆菲許，密西根的范登堡，堪薩斯的凱潑以及愛達荷的鮑拉都是反對派的領袖，堅決不贊成任何增加陸海軍費的提案的；漢斯脫系的報紙以及麥克可密克——畢得生的徒黨則熱烈地攻擊集體安全政策並且鼓吹孤立主義。

一九四〇年的六月，我恰巧又因事到紐約去。在我回德克薩斯的途中經過華盛頓下車的時候，盤旋在我心目中的問題正是當時一切的商人所關心的問題——營業稅；尤其是超額利得稅這一個問題。對於這一項稅目，大商人或許可以對付，可是一個小規模的經營，資本少而負債多，則未免有些難以負担。正好在我父親吃完早飯，還沒有開始他白天的工作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機會跟他談起這個問題。

「究竟是怎麼回事，爸？難道政府眞的不想給我們這些小商人們以一些活路嗎？」

他臉上泛起了一陣微笑，把桌上的一堆芝加哥，紐約和華盛頓的報紙推到地板上，抬起頭來問我：

「你喝完了你的咖啡嗎？」

「別管我的咖啡。告訴我這個超額利得稅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不見得以爲你的公司是特殊性的吧，是不是？」

「不，不過我……」

「而你總得承認我們政府必須籌一筆巨款？而現在這許多大企業公司都已經開始接受國防契約而大規模地工作，它們的日見增加的利益當然可以變成政府籌款的最好的來源。而我們非要弄到一筆錢不行，假如我們要建設一個充實的陸軍，海軍與空軍。」

「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們這些小商人們呢——」

他阻斷了我的話。「毫無問題地，新的稅律將要增加某一部份人的負担。不論這是怎麼樣一種稅律。一般地說來，關於小商人的福利，我是比誰都要關切，我總希望他們能有更好的機會與大商人競

爭。可是營業與稅務並不是我們目前的唯一問題。我們目前的問題要比這些重大得多。千百倍地重大。對於你個人的頭痛我甚爲抱歉。我勸你還是吃幾片阿司匹靈吧。」

我笑了。

在我的心目中，那時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于是我接着問他：「關於徵役這問題又怎樣呢？」

我問得如此奇突，以致他最初還以爲我是指財團利益的徵收呢。想了一下，他才明白。「喔，你是指徵兵。怎麼樣？」

「我是在想假如徵兵案通過了以後，你聲得約翰，佛蘭克林和我應該怎樣。我看詹姆士的年齡似乎已經太大……」

「不論怎樣，詹姆士已經是海軍陸戰隊的預備軍人了。」他提醒我。

「你能不能告訴我政府所要通過的徵兵案的性質呢？我的意思是指服役年齡等等。」

「有一件事我非得跟你說明白不可。假如那徵兵案已經成爲了法律，那麼，這將是你們個人的事了，你們必須憑你們各人的良心來決定你們的態度與行動。假如你們願意等到兵役成爲事實的時候，那麼你們不妨等。不過，假如徵兵案已經成爲了法律，你們各人都將受你們不同的兵役委員會管轄，而他們會採取適當的行動的。

「至於要我給你些忠告，告訴你應該怎樣做，應該怎樣行動，那麼你應該首先認識清楚我是怎樣一個人。你們的事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從不干與。徵集適合兵役公民的法令之成立與否決不會變更這一

點。我可以說，天下沒有一件事能變更這一點的。」

這就是我們那一次談話的結局。

從我個人的出發點來看，那次談話的結果並不能說是怎樣圓滿。事實上，我沒和他談話以前或許我還知道得多一點，而和他一談之後，我所知道的似乎反而少了。他對於應付小商業的徵稅問題似乎也並不樂觀；對於我個人應該採取的賢明的行動，他也並未給我以任何暗示。我之說那次談話並不圓滿，那是因爲我當時的感覺的確如此。現在我把當時的情景回想起來，我感覺到他之始終設法叫我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實在是對的。

那一年夏天我回到我德克薩斯的工作地以後，我很快地就決定了我自己的出路。德克薩斯實在是一個好地方，當一個人預備要決定去爲他祖國的陸海軍投効的時候。在德克薩斯，那正是一個人所該做的。而我得承認，每天早晨清醒地讀我的報紙，我覺得我們的國家的確有些像是遲早不得不被迫參戰的樣子。談到我個人的營業，它當時頗能自己支持；事實上，政府軍事訂貨所引起的任何生產增加都可能招來更多的廣告收入。那麼是不是有什麼事情阻止我去從軍呢？我覺得並沒有什麼。而我投軍後又怎麼樣呢？祇是一年的軍事訓練。（我那時候是這麼想的。）那麼爲什麼不去投軍呢？它既無害處，又可以使我多知道一些事態的究竟。

因此在八月中我又回到華盛頓，走進了陸軍部的大門。

好幾年以前我曾經是一個私人飛行師；我曾經在航空工業方面做過事；我曾經爲漢斯脫系的報紙担

任過航空編輯；因此在當時我的心目中，認爲我最好是參加陸軍中的空軍部隊。在某一點上講，這也可以說是羅斯福對海軍之不忠（譯者按：羅斯福一家與海軍有悠久密切之關係），可是讀者們應該記得，我是唯一沒有進哈佛大學的羅斯福。

好多年以前，當安諾德將軍還是一個中校，駐在加利福尼亞麥其機場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父親對於他的能力與理想是一向很看重的。一九四〇年安諾德已經升爲少將並且是陸軍航空部隊的總司令了。因此我既然走進了陸軍部，我當然應該去看他一下，跟他打個招呼，並且和他的部下談談我投効的事情。當時，我希望能够做個飛行員。

可是作爲一個飛行員，我是不够資格的。他們對我體格的要求實在太高：他們說我是絕對不適宜於空中戰鬥；而即使想得到空軍中的一個行政上的工作，我也必須要簽上一張放棄許多生活上的權利的棄權書的。我趕忙抓住了那第二個機會；和我談話的那位軍官認爲我的組織無線電台網的經驗在空軍的傳用局中是很有用的；而我的年齡使我有資格當一名預備役的上尉——後者完全是公文上的規律。這一切我完全守祕密，對家庭中的任何人都沒有談起。在九月十九日我接到政府的通知，說我的委任狀已經批下來了。這時我才準備去告訴我的父親。

當我走進了白宮，我發現我父親正忙得很，他預備循次召見他的各部首長們。我在他中間休息的時候，找到了個機會闖進他的書房中。

「瞧，爸！」

他看了一看我手中拿的那張委任狀，然後抬起頭來看我，我看見他的眼中閃耀着淚光。我是他兒子中第一個自願去投効的。他有好一下子說不出話來。然後他說：「我爲你而感覺到光榮。」

他的衝動的情緒使我自己也覺得十分光榮。

那一個週末我們差不多闔家都團聚在海特公園慶祝兩個生日：我祖母的生日是二十一日而我的生日恰好是二十三日。我們舉行了一個合併的慶祝會，而在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我的父親舉起了他的酒杯，提議大家來一個乾杯：

「這一杯酒是爲伊利奧而乾的。他是我們家中第一個人對美國所受的威脅加以嚴肅而清醒的考慮，而毅然去投軍的。我們都爲他感覺到光榮。我是其中最覺得光榮的一個。」

他領頭，接着我的母親，我的祖母和我的兄弟們都爲我乾杯。

我時常感覺到我和我父親的特殊親密的關係是從我走進白宮他的書房，給他看我的委任狀那一刻開始的。當然，從前在我的二十一歲的那年夏天，我也曾單獨和他倆個人到歐洲去旅行。可是這一次却完全不同。從這一次起他和我談話總是帶着更親密的態度，更大的信任，和更密切的關係。好像是他偷偷地在內心——些毫不曾對我明言——給了我一個試練，而我非常圓滿地完成了它。這在他看來，似乎是十分重要，而我得承認，在我也是有同樣的感覺的。

那一天晚上，在他的臥室中，當我走進去說晚安的時候，他叫我坐下來談談。他問我心中感覺如何，而我回答他「很好」；我們毫無目的地談了些關於惠脫攤場（我被派往工作的地方）的事情。後來

他問我對於戰爭的感想怎樣。我那時心中所盤念的一件事正是在那些日子中許多人心中所想到的：爲什麼我們還在不斷地把廢鐵送到日本去？我們當然知道給日本一塊廢鐵就等於幫助日本殺一堆中國人……

「我們是一個和平的國家，」他一邊想着，一邊慢慢地回答我。「這並不單單是一個條件，而事實上是我們的心理構造。那就是說我們並不探求戰爭；我們並不要戰爭，而結局我們根本沒有戰爭的準備。廢鐵——你別笑——廢鐵並沒有歸入戰時資材的部門。因此，日本或是任何與我們有商約的國家都可以自由地購買我們的廢鐵。」

「可是……」

「再進一步來說。假如我們突然停止賣廢鐵給日本，那麼它將有權利來認爲我們對它已經做了一件非友誼的行爲，說我們想從商業方面來使它飢渴。

「再說，它可以用我們的這種行爲來作爲它與我們斷絕國交的充份的理由。

「我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假如它認爲我們是的確毫無戰爭的準備，我們是的確毫無充份的武裝，那麼它甚至可以用它來做對我們宣戰的口實。」

「它完全是裝假樣子嚇人的。」

「這也難說。可是依我們目前自己的地位來說，我們能說它是嚇人嗎？」

我突然地想到了麥克可密克的芝加哥論壇，以及一小羣上下院的議員們的演講，說日本對我們毫無戰爭的用意，說我們在遠東方面的權益並沒有受到日本的威脅。我又想到許多說我父親是戰爭製造家的

批評與非難。

「我們無論是在事實上，或是實質上，」他接下去說，「都是在討好日本。這是一個醜惡的字眼，你別以爲我會喜歡這個字眼。可是事實上我們確是走這一條路。我們討好日本爲的是想爭取時間來建設起一個頭等的海軍，頭等的陸軍……」

「和一個頭等的空軍，」我插了上去。

「和一個頭等的空軍，」他笑了。「一點也不錯。今後我必須記得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該多談些空軍。」

幾天以後我就出發到差，開始我作爲空軍徵用局中的一個上尉底新的，陌生的工作。說老實話，我當時就絲毫沒有想到我父親的敵人會利用我完全出於至誠的行爲（我之投效與請求軍官的委任）來作爲他們的政治資本的。我之從軍不是爲了好玩，或是爲了我以爲軍隊的生活會比我在德克薩斯的業務工作要快樂得多。我要是那麼想，我才眞是個大傻瓜呢。可是在我到差後不久的幾個星期中，反應就開始了。

在一九四〇年總統選舉運動的時期，我從全國各地一共收到了三萬五千封信和明信片，當然，大部份是沒有署名的。

在那個時候，讀者們應該體會到，那些信和明信片是相當使我感到痛心的。父親在十月間巡游西部到丹頓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些信件和明信片正如雨水似地湧進我的信箱中，差不多每一次郵包到時，這

一類的信件總有一千封左右。我父親那時預備利用他巡遊到丹頓的機會，由安諾德將軍陪着視察一下惠脫基地；因此我決定到他的選舉運動專車中他私人的車廂內去看他一下。

「不管你信不信我，爸，這對我倒沒有什麼關係。可是這一類的事對你的再選恐怕會有很大的阻害。」

他臉上的表情甚爲嚴肅。人家攻擊我們，說我企圖以這種半寫字間的工作來逃避戰鬥，說他想用他的勢力來保護我，不使我受到戰爭的直接的危險，這一類的誹謗究竟不是普通人所能受得了的。他問我有什麼辦法，打算怎麼樣。

「我預備辭職。辭掉我的官職。我想在事先告訴你，因爲我知道你的感覺，當從前我告訴你我……」

「你現在對我說話，是不是以一個下屬對大元帥的關係來說話？」他閃了一下他的眼。

「假如你以爲應該如此，我當然不能反對。」

「那麼你等一下。」於是他回過頭來對斯蒂甫·歐萊說，「請你叫安諾德回來一下。」

當安諾德將軍走回到那專車中的會客室中的時候，我父親告訴他我的請求。「這件事我完全交給你辦，」他說。「這是你的問題。你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於是他回過頭去，看看窗外。

安諾德將軍用一只眼斜視着我。「你當眞嗎，上尉？」

「當然是的，將軍。」

「那麼以後你預備怎麼樣呢？再加入空軍，從一個下等兵做起？是不是？」

「報告將軍，假如我不能再入伍做一個下等兵，我想加入加拿大的皇家空軍隊。」

「很好。你該照公事的程序正式把你的辭表遞上來。寫明你辭職的理由。我們會馬上採取適當的行動的。」

於是我便按照公文的手續把我的辭表一級級地遞上去。一星期以後，上司的答覆又照原有程序一級級地批了下來：「辭職難以照准」。我於是對我的上司開始了有計劃的攻擊，屢次以傲慢的態度向他們發脾氣，想因此可以被撤換而派到海外去。不多久，我這計劃便發生了效驗。我終於被調到勃林機場，在一個苦幹的，頭腦清楚的「西點」出身的年青人，勞利斯·諾斯達特之下，接受作爲一個空軍情報軍官的訓練。當我完成了我情報訓練的全部課程以後，我即刻被派到傑米·克萊布少校所指揮的第二十一偵察中隊服務。第二十一中隊的防地是在紐芬蘭，它担任的工作是在大西洋北部巡邏，警戒納粹潛艇對我們船舶的威脅。我雖沒有正式地被派向海外，但至少我已經是在祖國和海外的中途了。

我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字眼來描寫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在紐芬蘭的工作環境——當地的氣候，生活情形，土地（倒不如說沒有土地）的情形等等。或許我可以用「荒漠」這個字來形容，假如讀者們可以從「荒漠」這兩個字來領悟到我所指的那種悲慘，泥濘，荒涼，與愁苦的混合情景。我當時感覺到沒有一個環境要再比一九四一年三月的紐芬蘭更糟，更不愉快了。因此我自動請求担任一件新的測量工作，這新的工作的目的是在北極圈內找尋適合於作空軍站的地點，以便給由美國運往英國的戰鬥機作途中的降

落接續站。這件任務中最微妙的地方是在怎樣避免陸軍與海軍在工作進行中可能發生的摩擦。這件工作使我從拉布剌達出發，到巴芬羣島，經過格林蘭，轉冰島，而終於到達英國，在那裏我預備和英國的飛行員們以及航空部的官員互相交換各人的發現與收穫。說老實話，我眞希望能够再遲一點到達英國，因爲我到的時候正趕上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間納粹對英大轟炸的末尾。雖然那已是大轟炸的末尾，可是却也够受的了。我和當時的每個人一樣，經驗到目擊許多大廈被炸成廢墟時的那種驚愕的衝擊，以及看炸彈雨樣地掉在四週，而自己一無能爲的那種無望的心境。

在我那次戰時中首度訪問英國的旅行中，我曾經被邀請到邱吉爾總理的鄉村別墅中去渡過一個週末。那是一個頗有家庭風味而十分愉快的週末，祇不過有兩個時刻我却感到十分窘：第一次是我剛到達那裏的時候，從門口走出一個好像剛從米高梅的影片中跳下來的十足英國風的執事，跑到我跟前問我帶了多少件行李，而我所能交給他的却祇有一把木梳與一根牙刷；第二次是在星期日的早上，前一晚他們借了一套很漂亮的用中國絲所做的睡衣給我，看來似乎是主人的所有物，可是因爲尺碼太小，早上醒來的時候，我發現那套漂亮的睡衣在我睡着的時候已經被我的身子所撐破，從頭到底，整整地撕裂成兩片。

一九四一年的仲夏，我的中隊已經在北極圈內找到了五個可以做空軍站的地點。我們替這些地點起了五個名字，這些名字恐怕是祇有那些在今後四年中時常在那裏降落起飛的飛行員們才熟悉的。拉布剌達的鷲灣，格林蘭的藍東，魁北克的水晶一與巴芬羣島的水晶二，水晶三，這是我們對當時的空運連絡

制的一點貢獻，使大量的轟炸機與戰鬥機得以在一九四二，四三年的夏天陸續經美國運到英國。

八月初我又回到了巴芬羣島，生活在深及膝蓋的泥濘的凍土帶中，在肯巴倫桑測量一個可能改成飛機場的地點；突然我接到一道由無線電打來的命令，叫我立刻動身回到紐芬蘭我的基地去。又是什麼官樣文章，當時我這麼想。在甘特湖我的基地司令部他們分派給我一架OA－10葛魯曼式的小型飛機以及一位飛行員。我們的任務是在八月八日，星期五到聖約翰去接紐芬蘭的美軍總司令，然後同他一起到沃根基的海軍基地去。當時我認爲此行目的無非是有幾位長官想和我商討關於我所測量的飛行基地的問題而已。

當我們的飛機飛過連綿的崗嶺而能看到沃根基的海港的時候，我們的總司令正沉默地坐在飛機後面的座位上，而我則坐在副飛行員的位子上。我們的飛行員尖起嘴輕輕地吹了一下口哨。海灣傍佈滿了軍艦，大部份還是很大很大的。我們對看了一眼，皺了下眉頭，表示不解。我們的無線電隨即發出信號，詢問我們的飛機應該繫留在那一處的停泊標上，而在領港的小艇到來以前我們該等多久。在等待的時候我們還在苦苦地想弄明白爲什麼有這麼多驅逐艦和巡洋艦停泊在港口。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合理的解答就是我們正巧趕上了又一次大西洋的海軍大演習。

不多幾分種以後，他們派了條小艇來，把我們飛快地帶到了巡洋艦奧古斯大號上，我們從艦邊爬了上去，而在那巡洋艦艦長的背後，我看到了華生準將，我父親的陸軍武官，與勃朗海軍少將，父親的海軍武官。我萬萬沒想到會在這兒碰到他們，因此一下子我呆住了，以致我把從小自我父親（他那時是海

軍次長）那兒學來的海軍禮節全部給忘了。華生對我笑了笑，勃朗少將在向我揮手，而這時候我才醒過來，趕忙回轉頭對艦尾的美國國旗敬了個禮。華生趕上來跟我握手，口中喃喃地說：「大元帥很想馬上看到你」。我急忙地往前走去，正碰上我的弟弟小佛蘭克林，他那時是海軍中尉。

「嗨，你也在這兒？」

「究竟怎麼會事我也弄不清楚。上個星期我們的軍艦梅朗號和另一條驅逐艦接到命令退出護航的任務。說我們應該留在這兒參加另一個海軍艦隊担任巡邏的工作，保護海港的進口。今天早晨他們又叫我立刻到奧古斯大號上來見大元帥。」他把一只手指伸進他襯衫領子裏抓了一下。「我眞想不出我幹了些什麼玩意兒，我們的海軍上將金氏會偏把我給吊了出來。」

「爸在那兒？」

「前面。在艦長的房艙裏。你覺得怎麼樣？」

「還不跟你一樣。恐怕又是什麼海軍大演習吧。」

「這兒走。你該帶了些換洗的內衣來的吧？」

「我沒有帶。爲什麼？」

「據我看我們恐怕得在這兒住個兩三天吧。反正不管它了。」

那天正是星期五，吃午飯以前的時候。我的襯衫祇有我軍服內所穿的一件，而我得在艦上住到下星期二才能走。幸虧我的父親的領子尺碼和我的差不多大，我可以借用他的內衣。否則，穿着件髒襯衫在

一傍目證那歷史性的大西洋憲章的簽字，恐怕未免是太有失體統的了。這一點，我想讀者們一定會同意的。

二　大西洋憲章

星期五那天快吃午飯的時候，我和佛蘭克林見到了我的父親。我們還來不及對他說一聲「哈囉」和問我們的母親以及其他的家屬安好，他先開口了：

「瞧這個，我叫華生把這個給你們準備好了。」於是他交給我一條大元帥陸軍侍從的飾帶。「這不過是給你們臨時帶幾天的，」他笑了一笑，又給了佛蘭克林一條海軍侍從的飾帶。

「你的精神還是那麼好，爸。不過，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呀？你是不是趁例假來釣魚的？」

父親很得意地大聲笑了起來。「新聞記者們都是這麼想。他們以爲我是到芬狄灣附近來釣魚的。」他像個孩子那麼樣的高興，他誇揚他的高明的手腕，怎麼樣騙過了許多新聞記者，自己坐了他總統的帆艇波特瑪克號先航行到緬因的奧古斯大。接着他便告訴我們這一次旅行的眞相。

「我預備在這裏和邱吉爾會面。他明天坐威爾斯王子號到達這裏。哈萊·霍浦金斯陪他一起來。」說到這裏他停住了，往椅背上一靠，想看這個消息給我們的反應。我雖然沒有鏡子在身邊，可是我猜想得到我當時臉上的興奮與驚愕的表情。

在繼續敍述這一段故事以前，我想先提一提被我父親遺留在後面的白宮記者們。我父親之所以那麼

做是因爲他事先與邱吉爾有一個約定，講明雙方都不准帶記者與攝影師，而報上也不准有關於這第一次會面的披露。爲着要履行這一個約定，我父親不得不在他出發以前很巧妙地騙過了包圍着他的記者們，對於這一點，他覺得非常得意而高興，好像一個玩捉迷藏的孩子巧妙地躲過了他狡猾的對手似地。可是第二天邱吉爾到達的時候却帶了全班新聞隨員們，很拙劣地假裝是情報部的官員。這是第一次邱吉爾以背信而使我父親感到驚訝。可是這決不是最後一次。

談到釣魚，我父親在這次旅行中的確釣了魚的，不過祇釣了一次。那是我到達的前一天的事。他釣了一條怪魚，船上沒有一個人叫得出它的名字。「把它送到 SMITHSONIAN 那兒去吧，」我父親建議，而在這一次旅途中他不再從事於釣魚這一門消遣了。

我父親和邱吉爾第一次會面之所以要選定這一個獨特的地方是有很多理由的。爲着安全與機密起見，這一次會面不得不在華盛頓以外的地方；假如他們選擇華盛頓做他們會面的地方，那麼過份誇張了的閒話與謠言一定會抹殺不少這會議可能產生的最後効果的。我父親與邱吉爾都是海軍出身的人物；一九一九年他們就是以這種身份作最後一次的會面的；在海上會面這一個念頭是保證可以挑撥起他們的幻想與興味的。可是很明白地他們是無法能在海上會面；納粹潛水艇活動的威脅使這一種想法絕對不可能成爲事實。那麼在什麼地方呢？最理想的該是人口稀少的海岸線上的保護嚴密的港口或是大西洋中的島嶼上。亞速爾羣島？這是葡萄牙的屬地，根本是問題之外的。從我個人的出發點來看，我是覺得應該選擇百爾慕他羣島或是西印度羣島中的任何一個小島的；紐芬蘭在八月中已經是十分荒涼而寒冷了；大部

份的時間都是迷濛的霧；而太陽是很少見的一位稀客。可是紐芬蘭當然也有它顯然的優點：人口不太密，附近駐有很多英美和加拿大的部隊，尤其是在沃根基這港口任何大規模的艦隊的集中都不致於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與猜想，因爲誰都已經知道我們的海軍早就在這兒建築着基地。

所以我便到了沃根基，期待着過幾天與我日常工作不同的新奇的生活。

那天吃午飯的時候，和飯後的那個寒冷而灰色的下午，我始終和父親在一起，談說着家庭的新聞。佛蘭克林也和我們就了一個時候，他告訴我們他的驅逐艦護航到冰島去的情形。父親的精神非常好，顯然地他因爲能暫時擺脫一下他日常的工作而感到高興。他問起我在北極圈內的工作情況，特別是我那次到英國去時的所見所聞，英國現在究竟是怎麼一個模樣，我所碰到的那些英國人的民氣如何，大轟炸與大火的景像如何（我在英國祇經歷到不多幾天的轟炸，因此我實在不够資格來說明這一點），我對他多年不見的邱吉爾的印象如何，等等。我則詢問他這一次會晤的目的是什麼。

「你自己曾經到過英國，」他回答我。「你親眼看到英國的人民。你甚至還告訴我他們的樣子——灰色，消瘦而艱苦。這樣一個會晤對英國的民氣當然是會有天大的好處的。是不是？」

我點了點頭。

「這些日子正是納粹們趾高氣揚的時候。他們活像是歐洲的主人，我們至少得給英國一些精神上的援助，否則我們自己就要面臨大礮與炸彈。我相信今天不見得有多少美國人會不同意這個見解的。」

「那麼祇是精神上的援助了，」我提醒他。

「不僅如此。還有我們的租借法案呢。英國人知道他們已經走近了他們生產力的局限——而在這個局限之內，他們是不足以支持一個攻勢的戰爭的。這一次的會晤是想法子草定一個生產計劃——而尤其英國人感到重要的是交貨的方式與計劃。他們對於我們究將以多少的生產量轉給蘇聯，似乎感到重大的不安。」

「還有呢？」

「我已經知道了邱吉爾對蘇聯繼續作戰能力的估價。」他豎起他的手指表示一個零。

「我想你自己的估價總比這個高一點吧。」

「霍浦金斯對蘇聯有很高的評價。而他有辦法使我信服。」

當然，在我們談話那個時候，美國的生產量還是微少得可憐，和現在的相比，恐怕祇是很小很小的一點。而英國所担憂的是怕他們從我們這兒所得到的將是這一小點的一半。

「邱吉爾明天將親自到這兒來，因爲他——我想他自己或許不會這樣表示的——明知道沒有美國英國是沒法子繼續它的抗戰的。」

我吹了一聲口哨。我自己曾經親眼見到五月大轟炸的尾梢，大火燃燒掉英國大部份的工業中心區，可是我倒還沒有想到他們的難關有這麼嚴重。另一方面，再加上俄國人正在一步步地通過草原地帶往後退却。……

「當然囉，」我的父親又繼續下去說，「邱吉爾最大的關心是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參戰。他知道得很

詳細，假如美國的力量祇是集中在生產上，那麼其最大的作用也無非是足以使英國能夠藉以支持戰局罷了。他知道假如英國要採取攻勢的話，沒有美國的軍隊是辦不到的。」突然間他反問我：「你在倫敦的時候看不看英國的報紙？」

我告訴他我注意到很有些報紙的論文嚴勵地非難美國，說我們祇是想看英國被打得慘無人色，毫無招架的時候，才會利用最後的一秒鐘來挽回大局的。父親很得意地點了點頭，表示他猜測的勝利。

「等着瞧吧，」他說，「你看邱吉爾一來馬上就會要求我們立刻對納粹宣戰的。」

我不大明白我們可以從這次會晤中得到些什麼好處。「從精神方面來講，我們當然是早就站在英國的一邊了。」

「就是呀，」我父親說，「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你不應該忘記我的海陸空軍參謀長們都在這裏。他們可以知道很多的新東西。英國戰爭力的確實情形如何？從人力這一方面來看，英國究竟是不是已經到了無法可施的地步？」

「你說還有誰在這兒？」我問。我在這兒所看到的祇是我父親和他的侍從武官們。

「還有金氏，史塔克，馬歇爾，安諾德……很多大人物全在。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

一個送信的帶了一大包公函走了進來，暫時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走了以後，父親又把話題轉回到那行將舉行的會議上。事實上我想他是在練習他明天所要開始的談話，一點一點地指出他之所以出席這一次會談的許多內在的原因，準備怎樣對付邱吉爾可能提出的請求。

「還有一件事，」他說。「大英帝國已經走進了一個危急的階段。這是一般人不大知悉的一件事，英國的銀行家和德國的銀行家事實上很久以來早就把持世界貿易，作爲他們的囊中之物，雖然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是失敗了的。現在，這對美國的貿易是不大好的，是不是？」他對我聳了一下他的眉毛。「假如在以往，德國和英國的經濟利益曾經合作把我們從世界貿易中排擠出來，對我們封鎖起這個和那個市場，而現在德國却與英國對戰了，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有一點我們是馬上可以知道的。我們不應該太貪婪，看那一邊給我們的利益多而決定和那一邊合夥：暫時我們可以劈開目前的事實，就是說納粹主義是可憎的，而我們的天然的利害關係，以及我們的私心是與英國合流的。可是事件却還有另外一個角度。我們應該從最初的開頭起就跟英國講得明明白白，我們是不願意做一個老好人，在大英帝國危急的時候可以被它利用來幫它脫出危機，而在事後又永遠地把我們忘了。」

「我不懂你最終的意思在那兒？」我插嘴問他。

「邱吉爾告訴我他之做英皇的總理的目的並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的分解的。（邱吉爾後來在一次無線電廣播中親自重複此說——作者）。我想我可以以美國的大總統的資格來說：美國決不願在這次戰爭中幫助英國，使它能夠在戰後再繼續那麼專橫地統治它殖民地的人民。」他停頓了一下。

「我想，」我小心地說，「今後的幾天中恐怕免不了處處都會生出些糾葛來的。」

「我們等着瞧吧，」父親說。「等着瞧吧。」

那天下午，若不多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威爾士和哈立曼到我們這條巡洋艦上來。他們有好多文件要與我父親一起校閱，因此我便起身退出，直到快吃晚飯的時候才回去。晚飯時的談話都是無關緊要的閒談。那天我們都睡得很早。

星期六早上九點以前我們全體走到甲板上看威爾斯王子號航進港口，在我們的奧古斯大號不遠的水面上拋錨。我扶着我父親在看。我們看到那條英國軍艦的甲板上也站着一堆人，好像邱吉爾也在裏面，可是那是一個灰色而迷濛的早晨，我們誰也不敢確定。

兩小時以後，邱吉爾親自登臨我們的艦上，帶着他隨員中主要的人物。這是他們一九一九年來的第一次晤面，可是他們即刻談到他們的通訊，他們橫隔大西洋的通話，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工作與他們的煩惱，而很快地他們便直呼其名，用起「佛蘭克林」與「溫司頓」的親暱的稱呼來了。這稱呼當然是私下用的；在有其他官員在場的時候，他們還是用「總統先生」與「總理先生」的稱呼的。可是日子處久了，我父親在正式的場合也放棄了這種禮貌上的假裝，雖然邱吉爾卻始終拘謹地墨守着這種稱呼的禮節。

這第一次的拜訪完全是公式上的；邱吉爾帶了一封英皇給我父親的信。比較顯目的卻是邱吉爾隨身帶的一批顧問們。和我父親帶來參加會議的一小羣隨員相比，邱吉爾卻顯赫得多了——他雖然還沒有把百家姓上的全部姓氏都帶來，可是卻也够瞧的了；從貝弗勃洛克到耶爾他全帶了來。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還有一批英國情報部的官員也在場，隨身帶了筆記本和攝影機。安諾德將軍一下子溜到我的背後，

偷偷地在我耳邊說最好我們趕快設法弄幾個攝影師和一批膠片來，並且問我在甘特湖附近有沒有什麼航空攝影技術人員可以找得到。那一天早晨我立刻派了我的飛行員駕駛我那架葛魯曼式的小飛機回去，載些照相材料和兩個陸軍攝影師來，使我們的報紙將來也可以得到一些關於這次會議的資料。

事實上，英國方面顧問，隨員，侍從，跟班之多在另一方面也使安諾德感到十分困惑。在後來舉行的參謀會議中他發現他處於一個極不利的地位，因爲他根本沒有帶助手來，而與他地位相等的英國代表既有祕書們，又有侍從，又有大批助理員。因此在有幾次會議席上，我便被臨時抓差，叫了去當陸軍航空部隊的記錄員。

在他們會晤的第一天，父親和邱吉爾，還有霍浦金斯一起進午餐；霍浦金斯是陪邱吉爾一同上船來的。這次又能看到他我覺得很高興，尤其是看到他的精神比以前好了一點。對於他的健康的改進我是有些小小的功勞的；在他上個月赴倫敦以前，他曾經在甘特湖停留了一下，我們帶他去釣了一天魚，我們這次釣魚是十分道地的。在一天之中，他似乎年青了十年。現在他又回歸到他的工作崗位上，忠實而苦幹。

我們其餘的人們都是海軍上將金氏的客人，另外在一起站着吃午飯。吃完午飯以後我回到艦長的房艙內，父親正和邱吉爾面對面地坐着，很有禮貌地在爭辯。

「根據我的情報，佛蘭克林，你們美國人民的民氣似乎已經傾向於我們。事實上可以說是他們已經準備參加這一個偉大的戰爭了。」

「你同時也可以看到許多和你的情報相反的徵象的，」我父親冷冷地回答。

「可是關於租借法案的那次大爭辯……」

「假如你眞的關心美國的輿論，溫司頓，我勸你還是每天多讀些我們的國會記錄。」

兩個觀念現在是正面衝突了：邱吉爾很顯明地是被一個支配的思想所推動着，那就是說，我們應該立刻和納粹德國宣戰；而我們的大總統則處處都在顧慮到人民的輿論，美國的政治，以及許多反覆無常的無形的條件與因素。最後，喝完了他杯中的剩酒，邱吉爾站了起來。已經是快兩點半了。父親告訴他說他代表我們的海軍送了些禮物給威爾斯王子號以及保護它的三條驅逐艦上的全體官長士兵們。邱吉爾點了一點頭，短短地道了聲謝就走了。

那天下午，一千九百五十包禮物盒，裏面有香煙，鮮菓，乞司等，便送到英國方面分發給他們的官兵們。而那天下午，雙方面的參謀長們按照議事日程開始工作：生產量，優先權，船舶，戰爭資源——物資，人力，財力——所謂現代戰爭中的三大要素。這次會議中我也幫安諾德將軍處理了一些事務；後來，會議完畢以後，我給一位美國的海軍軍官點了支紙煙，一起走出會議室。

「愛我們！」當我們一起走向正中甲板的時候，他喃喃地說，「他們要的是咱們的命呀！」

他所講的一點兒也不錯；可是像我這樣一個人，親眼看到了英國的戰爭的性質以及他們眼前所碰到的種種的阻礙與困苦，是很難能够在同時完全保守客觀的態度的。

那天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們奧古斯大號上艦長的沙龍裏舉行了一次正式的公讌。我父親是主人。邱

吉爾當然是主客，坐在他的右邊，其他的賓客有英國外交部常務次長賈德幹；邱吉爾的侍從，乞威爾爵士；威爾士；霍浦金斯；哈立曼；和英美雙方的各部參謀長們。晚餐的時候，以及晚餐後直到午夜的時刻，我看到我父親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在他所參加的任何一次集會中，他總是主宰着一切的；這並不是因爲他堅持他的領導權，事實上這是他的天賦和自然的傾向。但是今天晚上他却完全相反。今天晚上他祇是靜靜地聽。另外有一個人在支配着聽衆，使用着他的華麗的，滾熟的，週期性的演詞，不太花巧，可是却永遠那麼像果子似的圓熟而恰到好處，使聽衆們感到他的句子好像是可以抓到手中而擠出淋漓的汁來似的。那天晚上，是邱吉爾在支配着我們全體——而每一秒鐘他都意識到他在支配着，把握着我們。父親在那天晚上祇是偶而地投一兩句問話——使他繼續地講，使他把他肚子的東西都講出來。霍浦金斯也偶然說幾句話，不過祇是在邱吉爾停住換氣的時候。大致說來，我們穿軍服的人都保守着沉默，祇不過偶而跟坐在一傍的人低低地說一聲：「有洋火嗎？」「謝謝你。」「請把水瓶傳給我。」「嘘，」「他肚子裏好像醋挺多似的？」「是呀——還沒完呢。」

他很少往後靠在他的椅背上，老是把嘴上的雪茄一下子從左邊換到右邊，一下子又從右邊換到左邊，形成一個很得意的角度，兩個肩膀往前彎着，活像一只壯而大的水牛，他的手時常在空氣中揮動着，幫助他的表情，他的眼睛閃着光。那一天晚上是他發言的天下，而他滔滔不絕地談着。我們之所以保守沉默並非是因爲我們覺得厭倦了。即使在我們和他意見不合的時候，他都有那種魔力把我們懾服住。

他談到戰爭的經過。他談到每一次的戰役，失敗了的戰役：「可是在任何一次戰爭中英國都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的！」他以相當的坦白告訴我們他的同胞怎麼樣曾經事實上一度接近潰敗的地步：「可是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太笨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他們不敢。」有的時候他的談話中又帶着一種堅決的懇求的色彩：「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你們非得參加到我們這一邊來不行！假如你們一定要等他們先給你們一個打擊而才參戰，我說參戰，那麼他們就會在我們被打垮以後再來打你們，而他們的第一個打擊也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打擊！」但是即使他的聽衆能夠偵察出他語調中所包含的懇求，他的整個的風度與架子還是給人以一種不屈不撓的力的印象。表示即使你們不接受我的警告，謝謝你們，我們自己還是有辦法想的。

隨時一有機會，我父親總設法問他一聲：

「那麼蘇聯呢？」

「哦，蘇聯！」他的聲調中含着很明顯的輕篾，可是他很快地就發現到他的疏忽，趕忙補上一句：「當然囉，他們是比我們所敢期望的程度要强得多了。可是誰能講究竟有多久，……」

「那麼你認爲他們是不能持久的？」

「在莫斯科陷落以後……祇要德國人越過了高加索……當俄國人最後停止了他們的抵抗……」

他的答覆永遠是肯定的，無條件的。他連「假如」這個假定詞都不用，對於俄國的抵抗他是可以說沒有什麼信賴的。在那一個八月的晚上，他的手裏握着一顆骰子，而他是預備孤注一擲的。他急切地要

我們明白租借法案中最大的部份應該歸之於英國；給蘇聯的任何援助都祇是遷延時間，而最後終歸無効的。而這種見解更使他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

「美國必須參加到我們這一邊來！你們必須參加，假如你們想生存！」

父親坐在一傍聚精會神而又正經地聽着，有的時候擦擦他的眼睛，玩弄下他的夾鼻眼鏡，或用燃熄了的火柴在桌布隨便劃着。圍坐在那一間充滿捲煙味的沙龍中的美國人都保守着緘默，不置可否。

那一晚好像是兩個友好的對手的第二場拳鬥。沒有什麼決定性的結果，可是羣衆裏却亦沒有一個人想大聲地喊他們加些油，好好地再幹幾手。我們希望雙方面都勝利。

星期天的早晨，在我們離開奧古斯大號到威爾斯王子號的甲板上去做禮拜以前，我得到一張條子，說我們的那一架小飛機已經回來了，帶了兩個陸軍航空隊的攝影師和大批的膠片。我把這消息轉告安諾德，他叫我請他們一塊兒來。

我們的小艇被吊上那條英國軍艦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一點了。一星期來像鉛似地鬱結在我們上空的潤濕的雲塊在開始分散，好像是得到了什麼信號似地。

陽光從雲隙中射下來。

排列在甲板傍的是英國船上的全班人員；站在他們一傍的是二百五十名我們的水手與陸戰隊的兵士。船上的祈禱壇前垂掛着英美兩國的國旗。

我們齊唱「主呀，你是我們自古的恩人！」「前進，十字軍的士兵」，以及「不朽的父主」，我們高揚的歌聲有力而溫暖地散佈到海面上。我們一起齊心祈禱。

我不曉得傍人在想些什麼，可是我自己則在想：這兒，在這個甲板上，頭上蒙着不時從雲霧中透射出來的陽光，是一對領導着兩個强大的國家的重要的人物。想到這裏，我就想到在英國有千百萬人辛苦地工作着，白天製造着炸彈，而在夜晚則不眠地躺在炸彈下面。我想到英國的陸軍，被打退了回來可還保持着森嚴的氣魄；穿着長褲，短褲的英國士兵們：肩上綴着"COMMANDO"字樣的義勇兵團；穿着藍軍服的英國皇家空軍；這一條船上的軍官和士兵們，他們已經戰鬥了那麼久，又那麼疲乏，他們都認爲這一次的航行是天賜的休息，而這些可憐的人們，又誰知道在不多幾個月以後竟命裏註定要跟着這同一條船被日本的魚雷所打沉呢？

而我又想到在我的家鄉，美國，工廠裏開始有了新的生命；千百萬走出廚房的女人和走出農場的青年們都開始在學習新的，刺激的，重要的手藝；每個人都多少受到了戰爭的波動；假如他們既不在軍隊裏又不在戰時工場中工作，那麼深夜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大街上巡行，頭上戴着防護團的鋼盔，他們或許覺得這種行爲有些傻，可是他們却感覺到他們究竟是他們國家的一份子；每個人都是一個偉大的努力，一個超越的努力底一份子。

假如說英國目前有些透不過氣來，在一連串的拳擊下有些步伐不穩，那麼美國已經在開始鼓起他堅韌的肌肉，在摩拳擦掌，預備動了。

而這兒站着他們的兩個領袖，在祈禱：我們的父主，你在天國，你神聖的名字……

祈禱以後我們就留下吃午飯，邱吉爾做主人。在吃的時候，突然聞有人叫大家靜下來，高聲喊道：「諸位，英皇萬歲！」接着是一陣子椅子移動聲，脚步擺動聲，於是一片沉靜，大家把杯子高高地舉起來，乾了杯中的酒。這未免有些宮廷味的炫耀，說不定也容易引起人們的冷嘲，可是這也是一個使人不可否認地感動而不能忘懷的場面。至少對於從沒有經歷這樣的場面的我，是有這樣的感覺與反應的。

當天整個的下午要開軍事會議，在我們回去的時候，我告訴父親早晨做禮拜時我所想到的一切。「那是我們的主調，」他說。「假如我們在這兒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故發生，我們今後將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前進，十字軍的士兵！』我們是十字軍，我們要前進，靠着上帝的援助。」

下午的會議中，雙方面的軍事代表都抱着不同的意見，因此會場中的空氣便和早晨的那種理想的團結迥然不同。英國的代表堅持着他們的主張，用種種的方法來說服我們，想要我們把更多更多的租借物資交給英國，而儘量地減少給蘇聯的物資。我並不相信他們的動機會是完全政治方面的，固然我們都得承認，拆穿了來說，他們對蘇聯持久性之缺乏信心就是由政治原因所促成的。在談論中，馬歇爾，金氏和安諾德繼續堅持必須給蘇聯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因爲這是很合乎邏輯的。再說，我們的理由是建築在

德軍已經進入蘇聯領土的這一件事實上；多給蘇聯一些坦克，飛機，大礮就等於多殺死些納粹兵士；給英國的租借物資，在目前，是沒有什麼効用的，最多也不過是增加其國積的數量而已。我們在另一方面當然亦不能忘記了我們自己國防上的需要，建設我們自己的海軍與陸軍還是需要很多的物資的。

英方的龐德海軍上將，狄爾陸軍上將，費利曼空軍上將——他們三個人屢次在辯論中聲明國積在英國的物資和軍火在結局的時候對盟國的總的戰力將有更重大的價值。他們反覆地鼓吹他們的觀念，說給蘇聯的一切戰爭資材結果一定會被納粹們俘虜過去的；而爲美國本身的利益着想，美國非把大部份的物資送給英國不行。幸運地，美國的發言人是在一個不同的光度下來看美國本身的利益以及整個戰爭的廣泛的利益的。從我個人來講，我那時懷疑到英國的目的是否想使納粹與蘇聯兩敗俱傷，而英國得以趁此機會而强大起來。

會議進行的時候，我父親則在和威爾士校閱一部份草稿。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那草稿的內容是關於些什麼問題：後來我們才明白他們那時候所仔細校閱的正是那份大西洋憲章，以及給史大林的一封短信，闡明我們打倒希特勒主義的一致的決心。

那天晚上邱吉爾回到我們奧古斯大號船上來晚餐。這一種場合大家便感覺到親熱得多了；掛滿金章飾帶的幾位雄糾糾的武人都走了。參加這個晚餐會祇有父親，邱吉爾，以及他的幾位貼身的侍從，還有小佛蘭克林和我。因此這是可以認識邱吉爾得更清楚一點的一個好機會。

晚飯後，邱吉爾又像昨晚一樣的精神抖擻了。雪茄一支接着一支燃成煙灰，杯中的白蘭地酒很快地

被喝乾。可是他的態度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假如說有，那就是他的頭腦與心計運用得更清明，而他的辯舌也更靈活了。

可是和昨晚的談話對比一下，今晚的空氣是的確有些不同的。昨晚，除開偶而的一些發問之外，邱吉爾是毫無阻礙地一個人滔滔不絕在發言的。今天晚上，還有傍人的思想與意見被擲進這一鍋熱水中，而這鍋熱水因之沸騰起來，有一兩次幾乎濺了出來。傍觀者似乎意識到這兩個一向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已經在衝突起來，已經試探了對方的能力，而準備正面挑戰了。我們應該記得在這個時候邱吉爾是戰爭的領導者，而父親不過是通過有形的方式來表示同情的某一個國家的大總統而已。因此，邱吉爾便依舊掌握着談話的線索，依舊支配着整個飯後的時間。可是我們已經能開始感覺到空氣中有些異樣的味兒了。

關於帝國問題的討論第一次明顯地證實了我們這一種感覺。

是我父親先開始的。

「當然囉，」他似乎很確定地說。「戰後維持永久和平的一個先決條件當然是在最大的可能的範圍之內實行貿易的自由。」

他停頓了一下。邱吉爾的頭低了下去；他透過他的眉毛，穩定而警戒地瞧着我父親。

「不准有人造的障礙物，」父親繼續下去說，「特惠經濟協定愈少愈好。大家都能有擴張的機會。市場必須開放，給各國作健康的競爭。」他的眼光很天眞地在室內掃視了一週。

邱吉爾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動下身子。「大英帝國的貿易協定，」他沉重地開始，「是……」

父親趕忙插進來說：「是的。這些帝國的貿易協定就是一個例子。就因爲有了這些協定，印度，非洲，以及殖民地化的近東和遠東到現在還是那麼落後。」

邱吉爾的頸子紅了，他把身子湊向前來。「總統先生，英國從不曾提議過要在大英帝國的屬領中放棄它特惠的地位。使英國偉大的那些貿易必須繼續，而且要在英國大臣們所訂定的條件之下繼續。」

「你瞧，」我父親說，「我早就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們之間的意見是不會一致的。

「我堅決地相信假如我們要建立一個鞏固的和平，我們必須開發一切落後的國家。落後的人民。這應該怎麼樣才辦得到呢？很顯然地，假如我們仍然採用十八世紀的方法，這是永遠辦不到的。現在——」

「誰說十八世紀的方法？」

「我不知道是你的大臣中的那一位曾經介紹過一種政策，主張把殖民地國家中的原料財富都搬走，而反過來卻絲毫不給這個國家以任何報酬或是代價。二十世紀的方法是把工業介紹到這些殖民地中。二十世紀的方法是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給他們新的教育，給他們衛生的設施，以增加這國家人民的財富，使他們明白他們的原料雖被搬走，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是得到相等的報酬的。」

屋子裏的人全都湊過身子去，很注意地聽着。霍浦金斯臉上帶着微笑。邱吉爾的侍從湯姆生海軍中

校臉色變得很難看，有些吃驚的樣子。邱吉爾自己也開始有些手足無措了。

「你是在指印度，」他帶着吼聲說。

「是的。這使是沒法打的，假如我們一方面說是在對抗奴化人民的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自己却不想法去幫全世界的人民從落後的殖民地政策中解放出來。」

「那麼你們自己的菲律賓呢？」

「我很高興你居然先提到了菲律賓。菲律賓的人民將於一九四六年得到完全的獨立。而他們已經得到了近代化的衛生設施，近代化的教育，他們的文盲一天天地在減少……」

「要想改動大英帝國的經濟協定是絕對辦不到的。」

「可是它們是人爲的……」

「它們是使我們偉大的基礎。」

「和平，」父親堅決地說，「與任何延續的橫暴主義決不兩立。和平的機構必須有，並且一定可以獲得，民族間的平等。民族間的平等就必然地包含着貿易競爭的最大的自由。誰能說德國之想在中歐獨霸貿易的企圖不是造成這一次大戰的最主要的因素？」

這一類的爭辯是很難能在這兩人之間得到一個解答的。話一路地說下去，可是邱吉爾却慢慢地能够把握住談話的中心了。他不再一句一句地說了，而是一段一段滔滔不絕地發言了……海軍中校湯姆生的焦急，難堪的臉色也開始明朗起來了。當邱吉爾的聲浪又在全室中震蕩起來的時候，他似乎恢復了他的自

信，可是却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而這個問題在他們所參加的下一次會議中，以及再下一次的會議中都始終沒有獲得解答。印度與緬甸——這些是責難的主題。我父親，既然已經一度大聲地提到這個問題，以後就經常在他的英國賓客之前用這個來提醒他們，他的堅硬的手指正點住他們的隱痛的場所，不斷地戳，不斷地刺。我父親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惡意的，實在是由於他的堅決的信仰。邱吉爾是很明白這一點的，因此使他更覺得杞憂。

他很圓滑地改換了談話的主題，他很圓滑地談到霍浦金斯，我的弟弟，我——以及任何人來勞開談話的主題，使我父親不再有機會提到殖民地的問題，以及他所堅決反對的不平等的大英帝國的特惠貿易協定。

直到深夜兩點鐘的時候，英國的客人們才起身告辭。我扶我父親走進他的臥艙，坐下來陪他吸最後的一支煙。

父親咕噥地說：「一個道地的老式保王黨，是不是？一個十足的保守的保王黨。」

「我看他最初好像要爆炸的樣子，爸。」

「喔，」他微笑了一下，「我有辦法跟他在一起幹的。關於這一點你可不必担心。我們會在一起很有名地幹下去的。」

「祇要你別提到印度這一個問題。」

「姆，這我很難講。我想在我們完結以前，我要多多地談到印度。不僅印度，我還要談緬甸，談瓜

哇，談安南，談印度尼西亞，談一切非洲的殖民地，談埃及與巴勒斯坦。我們這一切都要談到。有一件事你可別忘記。老邱這一生中有一個最崇高的使命，可是祇有一個。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戰時內閣總理。他的最大的任務是使英國安全地渡過這次戰爭。」

「我得說他自己似乎也的確表示他祇想做到這一點。」

「是的。可是你是否注意到祇要我們一談到戰後的問題，他總設法把話題打開了？」

「你所談到的許多問題是相當難於應付的。尤其是從他着想。」

「除此以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因爲他祇有一副做戰爭領導者的十足的頭腦。可是要邱吉爾來在戰後領導英國？那是完全沒用的。」

現在事實證明，英國人關於這一點是和我父親有同樣的見解的。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鐘左右，邱吉爾又親自跑到奧古斯大號的艦長的房艙裏來。他跟我父親一起工作了兩小時，他的工作的對象就是大西洋憲章。他和賈德幹，威爾士，霍浦金斯和我父親一起圍着那張草案，聚精會神地研究着，直到午飯的時光才休息。在這兩小時之內，我在這房艙內走進走出了好幾次，祇聽到他們談話的片段，可是我却始終在奇怪着邱吉爾究竟以怎樣大的神通來使他昨晚上所說的那些話居然和這部大憲章的精神合致起來。我相信他自己也一定在同樣地詫異着。

寫到這裏，我必須順便提一下，威爾士是爲這部憲章操勞最多，對它貢獻最大的一個人。自從他們

在華盛頓開始考慮到要草擬這部大憲章的日子起，他便始終爲它而忙碌；這部憲章實在可以說是他的產物。當他從華盛頓飛來的時候，他的公文包中便放着這部憲章的最後稿本；在當時，在現在，全世界都知道這是多麼重要的一部文件，多麼重大的一個聲明。我們今日之不能履行這重大的聲明，這絕不是威爾士的錯，也不能說是我父親的錯。

那一天，他們辛辛苦苦地研究着這文稿的措辭與用語，一直到快吃午飯的時候才停止工作，邱吉爾和他的隨從們向我們告辭，回到他們自己的船上去。飯後，父親忙着批閱國會送過來的許多重要的信件與案卷；那天下午有一架專機等着要把這些批示帶回華盛頓去。

星期一那天下午，邱吉爾終算有了一些空閒和休息的時間。從奧古斯大號的甲板上，我們幾個人看他從威爾斯王子號出發到沙灘上去散步，攀登那兒岸邊的一座岩壁。最初我們看到大船上放下一支捕鯨的小艇，上面坐着一些英國水手們，他們把小艇划到大船的昇降部旁邊。於是我們看到邱吉爾穿着一件羊毛套衫和一條齊膝的短褲，從昇降梯上一步步走下去。從我們所站的地方看過去，他活像是一個發育過份的大胖孩子，所欠缺的祇是一付孩子當玩具用的小鏟子和小吊桶而已。一走上那條鯨船，他立刻走到舵旁，發施起號令來。當那支小船飄過海面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得到他大聲的吠叫——水手們則齊心一力地在划着槳。不久一會兒，我們就看不到他們了，可是從旁人那兒，我們知道他們後來幹了些什麼。據說邱吉爾一個人爬上了那座高約三四百英尺的岩壁。爬上去以後，他從岩壁的際縫裏看到他的幾位夥伴正舒服地躺在沙灘上，希望享受一些難得的陽光。邱吉爾先生馬上拾起了一堆石子，居高臨下，

很得意地向他們身上擲過去，把他的那些沮喪的從者們打得七零八散，四處逃奔。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邱吉爾趕回來和我們一起晚餐。這一晚我們眞是隨便極了；一起吃飯的祇有霍浦金斯，小佛蘭克林，我，和這兩位領袖。那是給我們寬弛一下的機會；不管前一晚的熱烈的辯論，我們又是一家人了，很遲緩而很隨便地捺天。可是在那個英國人的心中却還是念念不忘地想說服我們，要美國立刻對德宣戰，可是他明知道在這一方面他是沒有什麼成功的希望的。這幾天裏面，我們接二連三地收到關於雙方軍事會議的報告；雙方面都已經開始感覺到英國如果要得到最後勝利，是非依賴美國的生產與軍事行動不行的。

諸如此類的感覺與認識是一定會影響到這兩位領袖人物間的關係的。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領袖的外衣慢慢地從英國的肩上滑落到美國的肩上了。我們親眼看到這一種轉移，那是快近深夜的時刻，話題突然又觸逢到昨夜使我們全體沉默的那場辯論了。在我父親看來，那將是邱吉爾對他的明言的保守主義的告別詞。這時候，邱吉爾已經站了起來，在房內來回地踱着，一邊嘴裏在說話，一邊做着手勢，最後走到我父親跟前，突然地站住了，有半響不說話，對我父親瞧着，忽然間他伸出他粗胖的食指，在我父親的鼻尖下揮動着。

「總統先生，」他大聲地叫道，「我相信你是在想法子毀滅我們的大英帝國。關於戰後世界組織你所抱的每一個觀念都顯示出你這一種企圖。可是雖然如此，」——他的伸出的手指揮動了一下——「雖然如此，我們知道你是我們的唯一的希望。並且，」——他的聲音戲劇性地沉了下去——「你已經知道

了我們曉得這一點。你已經知道了我們曉得沒有美國，大英帝國是站不住脚的。」

邱吉爾在那個時候承認了他知道和平是祇有按照美國所定下的方式與教條才能獲得的。而在他說上面的那些話的時候，他是在承認英國的殖民地政策這一條路是走不通的。英國想支配世界貿易這一條路是走不通的，而英國想在美國面前離間蘇聯這一個野心也是一樣沒法實現的。

至少我們是可以這樣說的，假如我父親還活着的話。

第二天吃午飯的時候，英國的給養大臣貝弗勃洛克爵士也參加了會議。同時雙方的「軍事對頭」們也在海軍上將金氏的房艙內舉行會議。兩點半的時候，大家對於行將發表的聯合聲明已經獲得了最後的同意。這個週末的主要的外交方面的工作已經全部達成，我知道父親和威爾士二人的心中是充滿着歡喜與得意。當每個人擠出來到奧古斯大號的甲板上的時候，全體總合的印象好像是一個偉大的微笑；警衛隊和艦上的樂隊齊整地排在一旁，當邱吉爾跟着英國各部的參謀長們走下我們巡洋艦的時候，樂隊奏起「上帝保佑吾王」的英國國歌。會議的工作就此全部結束。第二天用大總統與總理大臣二人的名義代表美國和英國發表了這部歷史性的大西洋憲章，聲明下列八點：

（一）英美兩國並沒有擴張領土或其他的野心；

（二）英美兩國絕不容許有違反當地人民自由意志的領土變更；

（三）英美兩國絕對尊重各國人民均有選擇其政府方式的權利；並且願意使一切在武力下喪失宗主

權與自治權之民族能恢復其應享之權利；

（四）英美兩國將在與彼等現有責任不衝突的原則下，努力使一切國家，不論大小，戰勝國或是戰敗國，均能享受平等權利以經營世界貿易並獲得本國經濟繁榮上所必需的世界資源；

（五）英美兩國將促成世界各國間在經濟領域內之密切合作，其目的在保障各國之勞動生活改善，經濟調整與社會安全；

（六）在專制的納粹主義澈底消滅以後，英美兩國希望能建設理想的和平，使一切民族都能安全地居住在國境之內，並且保障居住在任何土地上的任何居民都能自由地生活，不受恐懼與貧乏的威脅；

（七）這和平將使一切人民都能毫無阻礙地橫渡公海；

（八）英美兩國深信世界上之一切國家，爲現實上以及精神上之理由所驅使，終必放棄武力之使用。威脅，或可能威脅，鄰國國境之國家設繼續運用其海陸空之軍備，則將來之和平甚難維持，因此，英美兩國認爲唯有解除此等國家之武裝，始能建立一廣泛性與永久性之全體安全制度。英美兩國同時將協助並鼓勵其他有實際意義之方案實現，使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得以減輕其軍備之重擔。

這一個聲明在我看來是有着特殊而辛酸的歷史意義的，尤其是當我後來看到了這個聲明的文字與精神同時被人背棄、違反。

除開最初的兩點我們先不去理它（可是我們還是不得不跟比基尼羣島的居民打個招呼，要知道他們是爲了要讓我們的文明來實驗它的最新穎，最迷人的玩意兒而被迫搬離他們的居所的），我們拿第三點

來看，我們應該反省一下我們對爪哇與印度西尼亞的人民究竟幹了些什麼。關於第四點我們不妨匆匆地放過；它的神祕實在太深奧了。第五點形成了曾經一度是我們最高希望的至誠的反響。第六點，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還須明日的事實來證明。第七點似乎是很安全，至少在目前並沒有多大問題（雖然二十世紀的人民說不定不僅希望這一條適用於海洋，並且能早日適用於世界的領空中）。最後一點中三句特出的文句在今天是尤其有强烈而尖銳的作用的；特別是像格羅夫斯少將之類的人物是應該把這些句子多讀幾遍，多聽幾遍的，他們堅持增加原子彈製造的主張今天是已經在逐步地侵占了，代替了我們成熟而週密的美國外交政策。

星期二下午快打五點的時候，威爾斯王子號拔錨出發，回到戰爭中去。當它航過奧古斯大號，艦上立刻發出敬禮的信號，樂隊奏起別離曲。我站在父親的旁邊，扶着他的手臂，看那條英國的戰艦航出港口。我們自己也即刻匆匆道別，因爲奧古斯大號按照預定的計劃接着就要出發。天氣十分陰沉，有雨意；坐飛機回甘特湖是不可能的了。最後，我和貝弗勃洛克爵士兩人不得不上岸坐火車回到我的基地去，在那兒我預備替他訂一個飛機座位到華盛頓去，他要跟我們租借法案的代表們繼續會議。

「貝弗」和我到甘特湖去所坐的火車眞可以說是一件眞正的古董：木頭的座位，每節車廂中都有個小火爐，每走十哩路要在站上停上二十分鐘。我們的不舒服的旅行似乎頗不合我的那位貴客的胃口。當一位挺和順的車上侍役偶而不小心地領錯了我們的座位的時候，這位「貝弗」爵士居然大發起雷霆，用

他的神異的尖銳的聲音足足訓了他三分鐘之久，用語中還夾雜着不少頗爲毒辣粗俗的短短的英國字眼。這位侍役居然能毫無反抗地受得住他這頓訓罵，眞是相當出我意料之外的。我相信他不是個哲學家，便是個聾子。

當我能够不被這位貴客的噴火性的發作所擾亂，而得以安靜下來的時候，我便在腦中設法分析一下前幾天的重要性。英國人已經親自上門來求援了，可是却帶着高傲的態度，有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有些狂妄地。我們的領導者們雖然意識到英國人已經被局鎖在戰爭中，而這個戰爭也可以說是代我們打的，代我們一切美國人而打的，可是他們所代表的人民却還沒有能够清亮地，毫不迷亂地覺察到面對着他們的危險。美國還在從和平到戰爭的中途。我們的參謀長們的任務是非常微妙的，他們得把英國的要求和蘇聯的要求在天秤上小心地均衡一番，使這兩個作戰中的國家都能從我們這裏得到足够的援助來殺戰納粹們。

那些日子的記錄曾經深深地感動了我，而今天我還有同樣的感覺。在那些日子中，美國的命運被操在穩固的掌握中，掌握美國命運的那些人們曾經一方面不惜以任何方式維持我們國家的和平，另一方面又在保護着遼遠而悠久的國家利益。

在那一個八月中，在沃根基的海港內總統和他的參謀長們所安排下的賭博中，時間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我們今天回顧一下，當時的時間是很快地就沒有了，其快速之程度是使我們的生產比牽戰乎無法趕得上的。

三　從沃根基到卡薩布蘭伽

在北極圈中的偵察工作是比較上不十分活躍的，尤其是當我從沃根基參加了這次軍事會議回來以後，我更覺到這工作之沉悶乏味。幸而我的中隊在九月初就接到命令調回美國，那是會議結束後還不到兩星期的事。一回到國內，我立刻申請進空航學校受訓——我想我即使沒資格做一個正式的駕駛員，我至少可以做一個航空員，這樣，我便有更多的機會被派往海外工作。在內心裏我暗暗地祈禱我的申請能被接受，而我這心願竟居然有了效應。九月底的時候，我接到通知說我的申請書已被批准，令我即刻向德克薩斯，聖安東尼奧的凱萊機場報到。我曾經做過地勤，做過情報，而現在我要担任空勤的任務了。

我翻閱一下我剛回到美國以及初到凱萊機場時所記的日記，我差不多在每一頁上都可以讀到當時美國的那種昇平安恰的空氣。對於剛從國外服役歸來的我，這種空氣當然是十分刺激的；我相信那時候每一個從英國回來的人都是有同樣的感覺的；因之關於這一點我似乎不應該有過大的驚異。可是當我後來親耳聽到我的朋友們苦苦地勸我（事實上有三個不同的朋友曾經這樣勸過我），說我現在應該脫下制服，說我已經在軍隊裏混了一年了，說我因爲目前營業情形的好轉，已經放過了好幾個發大財的機會等等——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第一個反應是跟他們辯論，後來看他們對於世界大勢的眞相簡直是麻木不

仁，毫無感覺，我祇好關上談話之門，而索性保守沉默，置之於不理。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時候，要想和他們爭辯，說服他們，是毫無效用的。關於當時人民心中的那種自得其樂的昇平的氣氛之由來，我是有着一個大約的概念的，這概念在讀者之前也決非新穎。這種自得其樂的昇平的氣氛是一部份美國最重要的報紙所造成的。這些報紙是芝加哥論壇，漢斯脫一系的報紙，紐約日報，華盛頓時報，以及斯克利浦斯——霍華特一系的報紙：它們音調一致地唱着一齣恬淡，安樂而柔順的使人迷醉的歌。假如說這美妙的調子是當時全國民氣的反映，那麼我們的報紙便沒有盡它們應盡的責任，給人民以正確的報導與認識。假如報紙的發行人們認爲他們當時已經盡了這個責任，那麼我們便可以不客氣地給他們腦中所謂的正確的報導，正確的認識以一個不好聽的名稱。

十二月的第一個週末，我得到例假到華斯堡外我的農場去看一下我的家。假如一切都順利的話，我再過幾天便可以畢業了；我當然不知道畢業後我得派到什麼地方去，因此在我畢業之前，我便希望能回家住一兩天，跟我的孩子們在一起。

星期天的早晨我起身很遲，一吃完早飯我便出去騎馬。到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才回來；妻告訴我哈金生和卡格爾從我的電台上打電話來過。我想他們大概是要在我回聖安東尼奧之前跟我談些業務上的事情。我當時並不想談生意，因此也就沒去理他們。孩子們想聽音樂，插上了無線電，而不多幾分鐘我便明白爲什麼方才哈金生和卡格爾要打電話給我了。無線電的音樂剛開始，我就聽到了緊急廣播，命令一切在外休假的官兵們立刻回到防地報到。這命命叫我們一刻都不准遲緩。

在大家七張八嘴地一齊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我趕忙脫掉我的農場服裝，穿起軍服，打了個電話給凱萊機場的副官，所得的答覆是叫我當天下午立刻坐汽車回到我的營房去。在等候我的汽車開出車房的時候；孩子們爭着問我：什麼是珍珠港？它在什麼地方？一會兒汽車已經調到大門口，我匆忙地跟我的家屬說了聲再會，便向南出發。

在向聖安東尼奧的路上，我越過了千百個步行回防地的軍人們。我的車子中還可坐四個人；因此在馬薩諸塞我搭了一個人，在東德克薩斯我搭了一個，在西德克薩斯我搭了一個，最後在北卡羅來納我又搭了一個年青軍人上來。

在凱萊機場，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地興奮而茫無頭緒，每一小時過去，都有更多，更嚇人的謠言傳來。我向副官與值日軍官報到以後，便回到我在機場附近租來的公寓中，立刻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父親。這長途電話足足打了兩個鐘頭才打通，在這兩小時之內，我眞有些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最後電話的鈴聲響了，我抓起了話機。在那一頭說話的是海克梅絲脫小姐，她是白宮的主任接線員。

「哈囉？」

「是伊利奧上尉嗎？」

「哈囉，海克……父親忙嗎？」

「我馬上給你接通。我不過是想先問一問究竟是不是你。」

電話裏沉默了一下子，我就聽到父親的聲音。

「是伊利奧嗎？」

「哈囉，爸！」我差不多是在大聲喊叫了。

「你好嗎，孩子？」

「我？我很好。你呢？」

「很好……當然囉，忙得很……」

「有什麼消息沒有，爸？」

「消息？當然，事情看來是相當嚴重。你那兒有什麼消息沒有？」

「我這兒？」

「是呀。你聽到些什麼？」

「謠言多得很，他們說我們全體明天就要坐船出發……所有的中隊都要開拔到菲列賓去……」

「眞的嗎？」

「方才我又聽說日本人在墨西哥有一批登陸部隊。而隨時隨地德克薩斯都可能受到敵人的空襲。」

「噯。」

「又有一個謠言說日本人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有力的地上機動部隊——都是步兵——從墨西哥通過國界來攻打德克薩斯或是卡羅來納……」

我可以聽得到他嘴裏咕噥了一聲，表示很有興趣；然後我聽到他說：「很好，假如你再聽到些什麼

新的花樣，你一定馬上給我知道，好不好？」

「當然，當然，爸！祇要我……」

我可以聽到他把受話機放回到機座上的響聲。於是我也把電話搖斷了，而開始……

嘿！

這到底究竟是什麼回事呀？我打電話給他想從他那兒打聽些消息出來，而結果是我告訴了他……

而他還想要我聽到什麼新的消息再報告給他聽。眞是大元帥與上尉之間！

我嘆了口氣，倒頭便睡了。

珍珠港的事件發生後，我的空航的課程還是照常繼續，一直到預定畢業的那一天才結束。我的命令指派我參加第六偵察中隊，那時候，這個中隊駐防在西部海岸，司令部則在穆洛克乾湖，在靠近加利福尼亞州蘭伽斯脫的沙漠中。我們的工作是担任太平洋上的巡邏。一直到次年的一月爲止，我先在第六偵察中隊，後來又轉到第二偵察中隊去；最後，出我意料之外地，我接到了一道祕密的命令，叫我立刻出發到華盛頓勃林機場向第一測圖聯隊的司令官報到。

關於這一道命令，以及我將來工作的性質，似乎是很機密似地，因此我的希望突然一下子竄入雲空。一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多半是要派我到海外去……

結果，倒的確是派我到海外去，不過當我知道了我的新工作的性質，我不免有些沮喪了。這新的工

作有一個暗號名稱，叫做「鐵銹的計劃」，這工作在我看來是如此地乏味，因此我覺得它不僅是「鐵銹」簡直是「破碎」。我和另一個航空員被派到海外去担任空中情報和測圖攝影的工作，而工作的對象是北非洲的大部份地區。天呀，非洲！

在我出發以前，我得到一個機會和我父親談了一次話，那是在他吃完早餐以後，開始工作以前的時間。在談話中我帶了些失望的情緒告訴他我最初以爲是相當重要的新工作。說老實話，這工作是十分機密的，可是我認爲他作爲全國海陸空大元帥，一定是已經知道這件事的。

他是事先早就知道了的；聽完了我的話，他馬上解釋給我聽，爲什麼在事實上我的這件新工作是比我的想像中的更爲重要。像他每一次的解釋一樣，他的話總給我不少新的啓示，尤其是關於這次世界戰爭中的許多問題與戰術。當我告訴了他我的新的工作的時候，他的臉上泛起了歡喜的神情。我接着就開始有些埋怨起來，告訴他爲什麼我認爲這一類工作是不值得大題小做的，他一面聽着，一面自己又煑了一壺咖啡（爸總是愛自己煑咖啡的，他認爲廚房中的那些傢伙是永遠不懂得怎樣來煑一杯道地的好咖啡）。

最後，當我講完了爲什麼我認爲這工作是不重要的以後，他開口了：

「你完全錯了。你以爲你不過是被派了去照一大堆沙漠的相片，而那是既浪費時間，又浪費膠片。可是事實決不是如此。你應該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先問你，我們是不是應該極力使中國能够繼續抗戰？」

「當然……我以爲是應該的。」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

「日本？」我懷疑地問。

「爲什麼不呢？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那麼這和非洲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知道在目前我們是怎樣把軍事給養運到中國去的？」

「通過緬甸路。」

「假如緬甸陷落了呢？」

「從印度空運過去？」

「對了。那將是唯一最迅速的辦法。現在，我們要把物資運到印度去……」

「我懂了。地中海。」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知道保障船舶運貨到蘇聯是一件十分艱難的工作。摩爾曼斯克那一次的攻擊……」

「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所以現在我們打算利用波斯灣。我們還必須不斷地顧慮到怎麼樣使我們的物資能一路安全地運過非洲的南端。你還必須記得即使是在馬達加斯加島上，都有人甘心願意給日本和納粹的潛水艇做掩護的。我們必須掌握住地中海的航綫。因此……」

「非洲。我懂得了。最初使我始終不明白的是——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大兜圈子，浪費時間呢。爲什麼我們不能來一下總準備，直接從英國來狠狠地把納粹正面幹一下子呢？」

「事情沒那麼簡單。別以爲我們已經達到了全速度生產的地步。」父親很苦澀地笑了一下。「別一下子把希望提得太高。目前我們所知道的祇有兩點：中國人是在殺日本人而俄國人在殺德國人。在我們自己的海陸軍還沒有充份的配備與能力來幫助他們以前，我們必須使他們能夠繼續目前的這種任務。所以我們必須設法送給他們千百倍於他們以往從我們這兒所得到的物資。非洲就是使他們能夠獲得我們物資的保障。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非洲。納粹們之停留在薩哈拉大沙漠並非是想洗一個大大的日光浴。爲什麼他們想要埃及？爲什麼他們想取得中非？要知道從那兒到巴西並不很遠。貝夕法尼亞街很可能會改名爲希特勒街，別以爲我是在說笑，這是十分可能的。

「你應該好好地給那沙漠照上幾張有價值的照片，可千萬別想到那祇是膠片的浪費！」

歐萊從門口探進他的頭來，很有意義而誇張地看着他的錶。父親大聲地笑了。

「兩分鐘就好了，歐萊，」他說。於是門又關上了。我相信我當時的臉色一定是頗爲沮喪，因此父親聳起了眉頭，帶着詢問的目光看着我。

「這戰爭是那麼偉大的艱巨的一件工作，」我說，「而我們離開完全準備就緒這一階段却還是那麼遼遠。」

「你可以把它比做一場英國式的足球賽，」父親回答我。「我們就好像是預備隊，先坐在一傍的長凳上瞧人家的。俄國和中國形成先上場的第一隊，在某一種程度上，英國也可以說是第一隊的隊員。我們是預定了要做那……那俗語中叫做什麼的？是不是叫結束全局的生力軍？」

「我懂得你的意思。」

「在球賽進行到我們的先鋒隊員快要疲乏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參加進去作最後的一着，以決定全局的勝利。我們應該精神抖擻，元氣旺盛地上場。假如我們時間估計得準確的話，我們的先鋒隊員那時還不致於完全疲乏。而……」他停頓了。

「而怎麼呢？」

「我相信我們的時間估計一定會很準確的。第一，雖然我們國內還有一部份口頭高唱失敗主義的人物，但是美國全體的人民畢竟還是有魄力，有勇氣來完成這艱辛的工作的。

「第二，上帝決不希望這個美麗的世界被少數人所統治。他將給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以支持戰爭和獲得最後勝利的力量。」

門又開了。「已經兩分鐘了，」歐萊探進頭來說。「好了，那麼祝你一路順風，」父親對我說。我忽忽地辭退了出來。

所謂「鐵銹的計劃」所包括的工作區是阿克拉，在黃金海岸的附近；巴得斯特，在英領岡比亞；卡諾，在英領非洲赤道區；以及拉密塞，在法屬非洲赤道區。這「計劃」費了我整整的好幾個月的時間，日夜辛勞地工作着，從空中用攝影來測畫出整個的西北非洲，有的時候遭遇到法西斯的巡邏機，有的時候也受到砲火的射擊，不過大體地上講來，我們是以儘量迅速的手段完成了這一件炎熱而枯燥的工作。幾個月以後我又回到了美國，渡過七，八兩月，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我大部份時間是消磨在醫院內的，設法根除我在非洲染上的赤痢與瘧疾。當我能够起床，得到軍醫的恢復健康的證明書的時候，我接到新的調令，派我到英國去担任第三攝影偵察聯隊司令的職務。（我在非洲的時候已經升任少校；這新的職務又使我升了一級，成爲中校。）

我在回美養病的兩個月中並沒有很多的機會跟我父親談話。一方面固然因爲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醫院內，而另一方面則因爲他實在忙碌得不得開交。我設法去看了他三四次，每次我停留幾分鐘就退出了，而每次我都看到他一臉疲乏與極力壓制住的緊張的神情。那些日子可以算是我們盟國戰事最不利的日子；英國，中國和蘇聯大聲要求我們供給更多的物資和給養；而我們無法使他們完全滿足。在那些日子裏，每一個統帥，每一個領袖都免不了錯誤百出，這些人們苦苦地學習怎麼樣執行戰時的工作，他們

以往既不曾做過這種戰時工作，而我相信他們在將來也永不希望再做這一類的工作。從我父親的蒼白的臉頰中可以看出這許多累積起來的辛苦與憂慮，因此每逢我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和他什麼都談，可是却不能觸及戰爭這一個話題。

在英國，我的部隊駐防在斯蒂潑爾·莫登，離劍橋不遠。當時，英美兩國的戰術家之間發生了一種爭論，結果使我們那一年沒有對法國海峽邊岸施行攻擊，而主張等到我們有充份的人力物力而後行動的一派人士得勝了；我的聯隊的工作是以諾曼提和布列塔尼爲對象，担任攝影偵察的任務，但是這工作祇能說是一種訓練與經驗，預備將來在非洲戰場上運用的。在九月末尾的時候，我到邱吉爾鄉下的別墅中去過了一個週末；這一次我特別小心多帶了一些行裝，因此派頭似乎比上次要好了一些。晚飯以後，邱吉爾告訴我他預備和我父親通一次橫隔大西洋的長途電話，他問我是不是願意和我父親說幾句話。我相信他的那種漫不在乎的問話的神氣完全是假裝的；我覺得他對我的關心和思想的週到使他記起了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而使我能够那樣和父親通話實在可以算是我當時可能得到的一件最好的禮物了。英國的總理大臣打給美國大總統的電話費了兩個多鐘頭才打通，我接上話機，先聽到政府的檢查官警告雙方說話要千萬小心，不得走漏機密，接着我就聽到我父親的聲音，祝我有一個快樂的誕辰。在我們掛斷電話以前，我父親很小心地暗示我，說我可能在最近見到我家中的一個親人，而叫我不必驚訝。

第二天早上，我得趕回我的部隊去。邱吉爾派人來找我到他房間去道別。我發現他一個人在房裏躺

來蹺去，全身除了嘴裏含的那一根雪茄而外，一絲不掛。天呀！我想，這倒是將來我告訴我孫兒們聽的我的一次珍貴的經驗。

這所謂「家族中的一個親人」結果却就是我母親。在她到達的前一天，我得到我們倫敦大使館的一個電話，說她要到英國來，已經在路上了。我趕到倫敦去會她，她一到倫敦就即刻到白金漢宮去，我是在那裏見到她的。

她在英國大部份的時間都被壞天氣包圍着。就在那一晚我和她一起在白金漢宮參加英王英后的晚餐會，她已受不住那寒冷了，宮殿中的房間都像馬房那樣大，因此也就特別顯得陰涼。可是我們却沒聽到什麼人訴苦或是不滿，因爲這顯然是英國的森嚴，而英國的皇族也得像其他的沒有足够燃料的英國平民一樣忍受這種種戰時的不便。可是這皇宮的房間也實在太大了，即使在平時燃料足够的時候，要想使這整個皇宮溫暖起來的話，這筆燃料的開支也一定會大得使常人難以支付的。

那夜的晚餐會中，除開我們和霧的主人與主婦，還有史沃茲將軍（在晚餐桌上我就坐在他傍邊，和他談說我在菲洲攝影的經歷，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錯覺，認爲祇要我在菲洲，我當然是他管轄下的居民之一，可却忘掉了他所管轄的那部份菲洲離開我從前的菲洲工作地還不知有幾百英里呢），以及蒙巴頓爵士。蒙巴頓處處都想表現出符合他聲望的風流倜儻，勇敢與魅人的態度。晚飯以後，我們都退到防空室裏，看諾爾·柯特的「精忠報國」，那是一張剛完成不久的新片。蒙巴頓當然是那張片中主要人物的模

範與靈感的來源。在片子放映中，他不斷地對這張片子用來作故事基礎的事實與經歷加上了許多評語與解釋。

那一天晚上，我陪我母親在她的臥室裏坐着，通宵沒睡，天氣十分寒冷，我們的牙齒直打着戰。

在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們在準備攻入菲洲；後來她告訴我，她那時也已經曉得了那個消息。可是在那一天晚上，我們的談話雖然圍繞着那個問題在打轉，但我們說話都異常小心，生怕洩漏出這事實上我們二人同時都已知曉的祕密。可是最後她却告訴了我一件我所不知道的新聞，那就是說：我父親很想自己到大陸的這一邊來，和邱吉爾會面，並且他們都希望跟史大林也見一下面。這一次飛行使我母親感到十分疲乏，但是她很高興地就接受了我請她到我的地方來檢閱我的部隊的請求。

她到斯蒂潑爾·莫登來的那一天，好像英國的天公故意做對，正趕上英國的壞天氣中最壞的天氣。又冷，又刮風，又沉悶，又潮濕。一會兒是濛濛小雨，一會兒又是傾盆大雨。母親由一羣英國的嚮導人員帶領着，淋到了一小時，害我的可憐的部隊們排着隊，冒着寒風寒雨在行政大廈前的柏油廣場上多等了好久。最後她到了，大家都興奮起來，我陪着她一路檢閱過去，她那次跟差不多兩千個人握手，儘可能地和許多人談幾句話。檢閱完了以後，我們趕忙請她進去喝茶（她的嚮導員們要威士忌酒，我們爲了不使母親知道，把酒倒在茶杯裏給他們喝）。

第二天，我們參加侵入菲洲戰役的人們都接到命令不准離開各自的基地。

我的地勤人員於十月末尾出發到乘船地去。

空勤人員則於十一月五日乘飛機向作戰區出發。

九日那一天，我們開始攻打菲洲，我的聯隊在第二天就在被我們奪過來的一座飛機場上開始工作，我們是在戰鬥還在進行中飛進降落在那裏的。

以後的兩個月中我不斷地工作，可以說是我最忙碌的日子了，每天都有許多必須立刻解決，緊急處裏的問題，因此使我沒有時間去留意或是關心到戰爭的其他方面　我所知道的祇是以邁遜·布朗基機場爲中心的戰役，在阿爾及爾的外郊。

最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的那一天，我突然接到一道命令，叫我立刻到阿爾及爾的總司令部向同盟國遠征軍總參謀長比台爾·斯密斯少將報到。這一次，多謝我母親的暗示，在我出發以前，我已經多少猜到了些爲什麼比台爾要我去的用意。

可是去了以後，他什麼都沒說。他祇叫我架飛機把海軍大將殷格沙爾帶到卡薩布蘭伽去，到達以後即刻向當地野戰司令官報到。統轄卡薩布蘭伽野戰區的那位上校立刻證實了我的猜想與希望。那位上校在偷偷地告訴我那個祕密的時候，那股興奮與緊張的勁兒，恐怕他一輩子都不會有過。你的父親，他說。還有邱吉爾。說不定還有史大林。後來他叫我在一天半之內不要在外瀏亂跑，在父親到達後才准出外，他說恐怕碰到有認識我的人會猜想到我是到那兒去接我父親的。

四　卡薩布蘭伽會議

在我吃完第六只新鮮鷄蛋的時候，父親和他的隨員們還在巴西境內。因此，我有充份的時間來舒展下身子，休息一下，暫時忘掉戰爭，和可能就在附近的朋友們寒暄一番，參觀一下我所住的地方。

戰事已經變更了這個城市的面貌。

在十一月八日，星期日那天晚上我們所發動的對非侵入戰中，這兒是我們預定攻擊地點中的最南端的一個。我的戰區是阿爾及爾，在非洲的西北角上；這算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我們派到卡薩布蘭伽的弟兄們的攻擊對象。

戰事過去已經兩個多月了，可是在下面的港口我們還可以看到那條遍體鱗傷的法國戰艦，傑恩·拔脫號躺在那兒。而這個城市的本身，從碼頭一直到山脚傍，都展示出戰爭的確從這兒經過的痕跡。現在，已經是正月了，大路上擠滿着美國的部隊和美國的吉普車，卡車；往山頭看去，非洲的早春已經爲萬物染上了可愛的顏色，點綴着有錢的法國居民們的邸宅與別墅。明朗，溫暖而歡樂。這和沃根基成了一個最尖銳的對比，其間的距離，使人感覺到好像有一個年代那麼久遠。

我相信我們之選擇卡蘭布蘭伽做我們的會議地決不是爲了卡薩布蘭伽這個字在西班牙文中的意義是

「白宮」。總之，它是那麼湊巧地被選作這次重大會議的地點，而當我們的當局這樣決定以後，他們立刻派了一隊密探們在邁克·瑞萊的指揮之下來徵選那些「最重要的人物們」生活，會面，談話的恰當的場所。我到那兒的第一個下午就碰到了邁克。他帶着些發牢騷的神情，告訴我當他接到命令要把卡薩布蘭伽保護得像白宮那麼安全的時候所碰到，與所必須解決的許多困難與複雜的問題。

第一，在法屬摩洛哥的全部區域之內，到處都是敵人的間諜與情報員。納粹們之被趕出這個領域還是最近的事；他們雖然走了，法國的法西斯份子還殘留在那兒，荷包裏滿是德國人送給他們的錢，而我們的保安隊還得時常設法去破獲他們，把他們逮捕起來。同時，我們在卡薩布蘭伽與西領摩洛哥相距並不甚遠，而在一九四三年正月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法朗哥和他的黨徒們並不見得對我們懷着有什麼好意。

好像這許多麻煩還不够；僅僅三個星期以前，德國人還對卡薩布蘭伽來了一次全面大空襲。說不定那祇是一次盲目的攻擊，可是也說不定那是有目的地想炸毀巴頓將軍的巨大的汽油庫；事實上，他們那次的炸彈全都掉在毫無軍事價值的對象上，炸死了好多阿剌伯平民，引起了阿剌伯人對他們的仇恨。可是那次空襲却足够使邁克担心的了。他調來了大批新的高射砲隊，分佈在卡薩布蘭伽的週圍和城內，因而使納粹們在他們的對北非短波廣播中開始了胡亂的猜測。（在柏林，戈倍爾的蝦兵蟹將們有一次相當接近了事實的眞相，他們報告說馬歇爾將軍準備不久到那兒去和英方的參謀長們舉行軍事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英美聯合參謀總部的高級軍官們以安福旅館作爲這次會議的本部。安福旅館是一座

十分愉快的，專招待遊客的旅社，雖不十分宏偉，却非常近代化，小而安適。在旅館的四週劃出了一塊禁地，重重的鐵絲網架得密不通風；這一大塊禁地他們稱之爲安福軍營，裏面除了那座安福旅館之外，還有預備給我父親和邱吉爾住的幾所別墅。在鐵絲網的外面來回地巡邏着巴頓將軍的部隊，他們向一切進出這塊禁地的人要求查看通行證，而一方面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這塊禁地裏面究竟預備幹些什麼。

在那塊禁地之內，當我父親坐的那只巨大的飛船還在南大西洋的上空，在巴西與英領岡比亞之間飛航的時候，我一個人伸着鼻尖跑到廚房裏去嗅探一番，想看一看他們給行將到來的許多大人物們所預備的伙食。兩個月的英國伙食和兩個月的C種糧食配給已經減低了我胃口批判的標準；因此，我感覺到那次管理廚房的軍官們把伙食做得實在有些太好了。

星期二，快近黃昏的時候，我和邁克趕到梅特依納機場去迎接父親和他的隨員們。他們預定在六點零幾分到達。我們所站的地方就在專門留出來停泊我父親的飛機的空地傍邊。

「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邁克喉嚨裏咕噥了一下，轉過頭來望着我。「我忽然想到這是我父親自從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飛到芝加哥去接受總統任命以來第一次坐飛機。」

「不僅是這個第一次，」邁克回答我，而他臉上的表情告訴我他在想到這許多「第一次」所給與他的憂慮。「這是有史以來一個大總統第一次坐飛機出國旅行。事實上，這是一個大總統第一次坐飛機，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不論是公事或是私事旅行。」他頗有表情地望着我，用手在額上做着擦汗的姿勢。

不久，按照規定的時刻，父親坐的那架C—54式飛機從遠遠的地平線處飛進了眼簾，在機場繞了個圈子後，雄偉地停落在跑道上。我趕忙跑上去和父親打招呼。父親先下飛機，接着下的是霍浦金斯，麥金泰海軍元帥，麥克利大尉，俾斯萊上校——以及其他十多個人。還有差不多一打的密探們，有一部份是跟第一批人員一起到的。

父親的精神十分好，一點沒有疲勞的樣子。我們坐着一輛不知從什麼地方徵用來的巨大而舊式的法國逢車回到那座營地去，一路上他不斷地談說着他這次的飛行以及途中的所見所聞。

「當然囉，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飛行。一九三二年的六月……」

「爸，你在說些什麼？那一次飛行不是我也跟你在一起麼？」

「喔，對了。可是當我在海軍部的時候我也坐過好幾次飛機呀——那時候你還是個孩子呢。那時我坐的是海軍飛機，出去視察。那種飛行你絕對不會曉得的。」

「多謝上帝！」

「可是這一次對我是很重要的，伊利奧。我覺得很高興能够看到我們這許多飛行員的工作的情形，以及這許多年來航空事業的情況和飛行技術的進展。使我透視到將來的……」

他又談到他那天的飛行。

「飛過達喀爾。我們這次飛的並不是平時的航線，你知道，平時他們是在陸地的上空直接飛過的……」

「我知道，爸。這條路線我飛過有三四次了。」

「一點兒也不錯，一點也不錯。我知道你是老資格。可是你也總得給我一個初次經歷的人一個機會呀。」他皺了一下眉頭，又很快地對我微笑了一下。「從飛機中看到停泊在達喀爾港口的戰船李乞留號。我幾乎忘記告訴你英領岡比亞境內的情形。巴得斯特。你別說了：我知道你也到過那兒。可是我可以和你打賭，我在巴得斯特一個下午要比你在那兒住兩個月所看到的東西還要多。」

事實上，他的確如此。

一進那塊禁地，我們的車子就一直開到我父親住的那座別墅門口。那座別墅是值得描寫一番的地方。裏面的那間起居室總有二十八英尺高，從高大的法國式窗子中可以望到外邊的一座美麗非凡的花園。大概是爲了要保護這些窗子，這個別墅的主人在窗外裝了鋼質的簾子，拉下來可以把整個的窗子完全掩遮起來；從邁克的觀點看來，這可以說是再完善沒有的裝備了。外面有一個臨時改裝的防空壕，就建築在花園隣近的游泳池裏。

屋子裏有三間臥室。兩間在樓上，裏面的一間分配給霍浦金斯住，另一間則是分配給我與小佛蘭克林的（小佛蘭克林大概在一兩天之內就可以到達）。樓下的那間臥室則是給我父親睡的，這間臥室有很多值得讚嘆的地方，可是却絕對够不上「得體」這兩個字。我父親看了一眼之後，他不由自主地吹了一聲口哨。「現在我們什麼都全了，祇缺少這屋子的女主人，」他笑了一笑對我說。非常明顯地，這是一位十分女性化的法國婦人的臥室。屋子裏倒處是幕幃，倒處是裝飾。一張床至少至有三碼寬。而浴室中

的那張浴盆是陷入地下的，砌着黑色的大理石。

離開我們住的地方不遠是邱吉爾的別墅，霍浦金斯跑了去請他到我們這兒來吃晚飯。那第一天晚上，除了我父親，邱吉爾和霍浦金斯之外，還有馬歇爾將軍，金氏海軍上將，安諾德將軍——美國的三個參謀長以及英方的陸軍上將勃魯克爵士，海軍上將龐德爵士，和空軍上將鮑德爾爵士三位參謀長。蒙巴頓將軍和哈立曼那天晚上也在場。

那天晚上，大家都有點疲乏了，可是這却並沒有妨礙了他們享樂的興趣。吃晚飯的時候，雙方唯一的意見衝突是由於這次卡薩布蘭伽會議的祕密性——或不如是沒有祕密性而起的。出席的軍官們——尤其是英國方面的軍官們，而邱吉爾則組護他們——都担心着怕納粹們可能來一次偷襲，祇要他們得到些風聲，確定這兒有什麼大事在進行中。英國方面主張大家應該即刻搬到馬拉喀什去。父親則反對這一個主張，並且明白地說了出來，他的始終堅定的態度終算把他的反對派鎮壓了下去。不過麻煩的是不僅在那一天，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都得以同樣堅決的態度來鎮壓他的對方。馬拉喀什這個名字不斷地在談話中被人提出，不論我們是在談論着些什麼。

晚飯以後，父親和邱吉爾二人並坐在靠着那排大窗子的一張安適的沙發上。鋼簾已經拉了下來。其他的人們則把椅子拉近來，排成一個半圓形，圍着他們坐着。談話的題目是政治。在晚飯後的這兩三小時中，陸海軍的將軍們陸續告辭退出，最後到了近午夜的時刻，祇剩下了父親，邱吉爾，霍浦金斯，哈立曼和我。談話的方式似乎有些迂迴。主要地是關聯着兩件事：史大林和那糾紛重重的法國政局（當這

次會議開始的時候，達爾朗已經入墓了快三個星期了）。

關於這第二件事，那問題是：史大林會不會來？而那答覆是：不會來。他已經拒絕參加這次會議，父親告訴我們，理由是：一，他必須親自指揮紅軍作戰（那時候對於東戰場頻頻傳來的好消息我們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二，我們都知道，假如他眞的來了，他一定會不斷地提出西戰場這個問題。

「不管怎麼樣，」邱吉爾說，「沒有他我們也可以照常進行我們的會議。我們可以和他維持經常的連絡。任何計劃都可以送到他那兒徵求他的同意。我們有哈立曼在這兒。」

站在他的立場上，哈立曼（那時是我們的租借物資管理委員）報告說，除開對歐洲的一個全面攻擊，蘇聯最最需要的是必須按時交付的租借物資。父親爲我們的生產計劃非常担憂。我們的生產還不能達到我們的預定的計劃，因此這不僅影響了東戰場，甚且還影響到我們對英國所該負的責任以及我們自己海陸軍的迫切的需要。

在那一天的晚上，似乎誰都不願意馬上就談到正經事。大家都想舒舒服服地靠着椅背，打個呵欠，伸個懶腰，喝杯酒，鬆弛一下。我父親可以說是這好幾個月以來第一次能够卸掉一會兒戰爭的重担，而其他的人也正和我父親有同樣的感覺。我忙着在跟他們斟酒。父親和霍浦金斯開始問起邱吉爾關於戴高樂的事；談話一下子就轉變到第二個主要題目上來了。

「戴高樂呀！」邱吉爾嘆了口氣，動了動他那富有表情的眉毛。

「你非把你那問題中的孩子帶到這兒來不可，」我父親說。那是我們給戴高樂取的綽號。從那個時

候起，在整個會議中，戴高樂便被稱呼爲邱吉爾的「問題孩子」，而吉倫便變成了我父親的「問題孩子」。

當時，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對這個被我們的侵入非洲而引起的政治糾紛感到樂觀或是滿意（這可以說是最溫和的形容詞了）。在這兒重新申述到當時的那件複雜錯綜的冒險，我必須附帶闡明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當時的政治策略的運用曾經減少了好多美國人性命的犧牲——這無論從軍事或是愛國的觀點來看，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另一方面，毫無問題地我們現在知道（事實上，那時候我父親心中早就知道）當時有人却也犯了很大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是相當嚴重的一個錯誤。

父親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好像是被兩個觀念所支配的：第一，他急着要以最好而最快的方式來解決當時那顯然已經混亂得太不像樣的局面；第二，他發現到他的國務院已經被拖進了一條無法回轉的途徑，而爲了將來外交上的交涉和來往，他必須儘量保全國務院的面子。事情做錯了，這當然是不好的；可是明明知道已經錯了，而還假裝着沒錯的樣子一味地幹下去，這就更糟：這一條眞理產生了我父親的第一個觀念。當你的僚屬犯了一個錯誤，（而這些僚屬們在今後的年月中還必須每天和你的「名是盟國，實是競爭者」的友邦們從事微妙的交涉），這是不好的；但是你如果棄你的僚屬於進退兩難的地步而不顧，那麼你就等於間接幫助了你的競爭者：這一條眞理產生了我父親的第二個——與第一個完全衝突的——觀念。

總之，在那第一天晚上我父親顯然地是祇想聽聽邱吉爾對於這一個問題有什麼話好說，而想因此探

明邱吉爾肚子裏的打算。

「戴高樂現在正架子搭得十足，」邱吉爾說，「他拒絕跟我到這兒來。他非常乾脆地拒絕了。」他對他自己的困難，好像非但不介意，而且還感到相當得意。「我沒法子迫他離開倫敦到這兒來，」邱吉爾很快樂地說。「他對於盟軍在摩洛哥和阿爾及爾取得統治權的那種方式十分不滿，他簡直在大發其脾氣。你知道，他有一種極端的愛國心理。並且，現在艾森豪威爾既然已經派吉倫在這兒主持大局……」他很憂愁地搖動着他的頭。

最初父親採用溫和的方式，可是後來他的態度逐漸轉爲堅決，終於堅持着非派人把戴高樂帶來不可。他堅決地主張臨時政府絕對不可以交給一個人來主持，不管是戴高樂也好，吉倫也好；而這兩個法國領導者必須共同建立起一個機構，來統治法國，一直到法國眞正地得到解放爲止。

在那一天晚上的談話中，我得到一個印象，覺得邱吉爾和艾登一定在從前毫無辦法的時候，曾經私下答允過戴高樂做復興法國的唯一領導者。在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談話中，邱吉爾那晚所採取的步驟是十分小心翼翼的。

「我的問題孩子，」他說，「認爲吉倫在這兒的正式的地位是對自由法國的一種非友誼的行爲。」他的聲音十分莊重。我又重新感覺到他對於他的「問題孩子」的這種作風似乎並不眞眞的關心。「他希望，」邱吉爾又接下去說，「能夠有單獨的權利來判斷，並且決定參加任何臨時政府的人物。這我知道當然是辦不到的。」

我父親提議英美兩國應該趕快給戴高樂一道强硬的通知，向他明白地說明，假如他不馬上停止他的叫喊而立刻飛來參加會議的話，那麼英美將即刻停止對他的一切支援。邱吉爾點了點頭。「我想這大概是最好的辦法了，」他說。「不過目前我當然是無法能保證他的行動的。」

過了午夜很久，邱吉爾才離開我們。父親已經相當疲倦了，可是他談話的興致還很好。一方面是由於旅行以後的興奮，另一方面則因爲又能看到我，他覺得很高興。我坐在一傍，看他寬衣上床。

「還是我在胡思亂想呢，」我說，「還是邱吉爾眞眞地爲了戴高樂的搗亂不聽話而感到苦惱呢？」父親笑了。「我不知道。我希望能够在一兩天內把事情弄個明白。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很有力的懷疑，」他說的時候，特別着重「懷疑」這兩個字，「我覺得我們的朋友戴高樂之沒有到菲洲來是因爲我們的朋友邱吉爾根本就沒有請他來。我有相當充份的理由來相信在這個重要關鍵的時候，祇要是邱吉爾和他的外交部的命令，戴高樂是什麼事都願做的。」

「爲什麼呢？」

「利害相同。英國人準備保持他們在他們的殖民地中的地位與勢力。他們也準備幫助法國人保持他們在他們的殖民地中的地位與勢力。邱吉爾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偉大的人物。他的臉就活像是永遠維持原狀的。是不是？」

這使我想起了那次在沃根基的爭端。父親沉默了一下子，突然微笑了，好像是發現了什麼祕密的思想似的。

「你笑什麼，爸？」

「我在想蒙巴頓，」他回答，「你知道爲什麼邱老這次把蒙巴頓也帶了來？他來的目的就是想說服我，想告訴我派登陸艇到西南亞去是當前怎麼樣重要的一件急務。」

父親看出了我眼光中驚訝的神情，於是他繼續着說下去：

「當然是這樣的。緬甸！英國人想要克服緬甸。這是第一次他們對太平洋戰爭表示眞正的關心，而爲什麼呢？爲了他們的殖民地帝國！那都是英國殖民地問題的一部份。緬甸影響印度，和安南，和印地尼西亞——它們都是互相關聯的。要是裏面的一個獲得了自由，其他的便會跟着要求學樣的。這就是爲什麼邱吉爾要那麼關切地把戴高樂藏在他的角落裏。戴高樂和邱吉爾的思想完全相同，他也絕對不願意看到一個殖民地帝國在這次戰爭中消失。」

「這和蒙巴頓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預備選他來做一個嶄新的戰場的最高總司令——西南亞戰區。可是你用不着担憂。我懷疑他們是否有能力來說服金氏。要想從他那兒拿走我們一部份的太平洋登陸艇！還是想從這個戰區中拿走我們一部份的大西洋登陸艇！」

我問我父親關於吉倫怎樣。

「吉倫？我從我們的國務院裏時常聽到關於他的很好的報告。在我們攻入非洲以前，羅非就一向負責處理我們和法國的事務，他在屢次的報告中都說吉倫是可以用來平衡戴高樂的勢力的唯一的人物。」

「伊利奧，」他接下去說，「戴高樂預備出來在法國組織一個一人政府。我簡直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他更靠不住的了。他的整個的自由法國的組織裏充滿了警察間諜，他用密探來偵察他自己的人民。在他，所謂言論自由就是剝奪人民批評他的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誰又能完全信任在戴高樂背後支持他的那個力量呢？」

這使我又想起了方才父親所說的關於緬甸的那些話。當然，從邱吉爾的立場看來，這一個冒險是合乎邏輯的。收復新加坡——一個最好沒有的，戲劇性的突擊；這可以使英國的聲望在亞洲與近東的殖民地民衆之前大大地增高。可是這一個戰事所需要的軍隊，給養與登陸艇在那兒呢？給養路線之延長也是個大問題。再說另一方面，我們正迫切地需要着這許多東西來打擊希特勒。

父親打了個呵欠，我站起身預備走了，可是他搖了搖手，叫我再坐下。

「別走，」他說。「還早着呢。再說，我還有很多話要談。」

他又談到了戴高樂，說他的身體，他的靈魂，他的一切都是英國人的，說英國給他金錢，物資，以及精神上的援助使他能建立起在倫敦的自由法國政府並且開展在法國的地下活動。他好像又在大聲地說出他的思想，他在排練，組織起他的思想，預備在第二天以及今後延續十天的會議中運用。

他的思想又回轉到殖民地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問題，這個問題他認爲是將來一切和平機會的核心。他在他的煙咀中換上了一支香煙，帶着思索的神情說：「殖民地的制度就等於是製造戰爭。從印度，緬甸，爪哇榨取一切的資源——從這些國家中搬走一切財富，可是却從來不給回他們些什麼，諸似教育，

好一點的生活標準，最低的衞生設備等等——這種行爲就等於是在埋伏下戰爭的導火綫。也就是說在和平的機構尙未開始以前，你已經在否定了和平機構的價值。

「當我們一提到印度這兩個字，你留心注意一下邱吉爾面上的表情！

「印度應該立刻採取共和政治。在某些年以後——五年或是十年——它應該有權力來決定它自己的地位，依然留在帝國範圍之內還是獲取完全的獨立。

「作爲一個共和政治的國家，印度應該有資格來享有一個近代形式的政府，適度的衞生與教育的標準。可是當英國年年不斷地從印度搬走它全部的國富，印度又怎麼能得到這一切呢？每年，印度的人民都在等待着兩件大事——死亡與納稅。比什麼都要準確，他們年年都有災荒。他們稱呼這個時期爲災荒的季節。」

他停住了，想了一下。

「我必須告訴邱吉爾我今天在英節岡比亞所看到的一切，」他說，聲音中帶着堅定的調子。

「你是說在巴得斯特所見到的？」我提醒他。

「今天早晨，」他說，現在他的語音中含着極爲眞摯的感情，「在八點半的時候，我們坐着汽車通過巴得斯特到飛機場去。土人們剛開始工作。穿得襤褸不堪……面色陰沉……他們告訴我說這些土人們要到快中午的時刻才變得比較活潑一點，高興一點，因爲那時候太陽已經晒乾了地面上的露水，驅逐了晨早的寒冷。他們說這些土人的一般工錢祇有一先令九辨士。一先令九辨士！連五角錢都不到！」

「一個點頭嗎？」我帶着些傻氣地問。

「一天！五角錢一天！此外，他們還可以得到半杯米。」他不安地在他的大床上移動着。「汚穢。疾病。死亡率高得可怕。我問了一下他們的一般生活年齡——你永遠猜不到的。祇有二十六歲！這些人過的生活連牛羊都不如。他們的牛羊還可以比他們活得久一點！」

他半天沒說話。

「邱吉爾或許以爲我上次沒當眞。這一次他該明白我不是在說着玩的。」他帶着思慮的神情對我看了半天。「你那個地方的情形怎麼樣？阿爾及爾情況怎樣？」他問我。

我告訴他那兒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地土甚富，資源很多，土人們窮得不堪設想，祇有少數白種居民生活過得非常好，還有少數的土王子過着十分優裕的日子，此外則是貧窮，疾病與無知。他點了點頭。

接着他就對我談起今後我們所該採取的路向：我們應該幫助法國恢復它世界强國的地位，然後委託它管理它戰前的殖民地，作爲一個委任統治者，它必須每年報告它代理統治的情況，諸似文盲掃滅的程度，平民疾病之治療與根除等等……

「等一等」我插嘴了，「它向誰報告呢？」

「在聯合國的組織成立以後，它該向聯合國理事會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談到這個計劃。

「沒有旁的，」他回答，「世界四大强國——美國，英國，中國和蘇聯——在打完這次勝仗以後，應該負責建立世界的和平。這四大强國應該担負起重大的任務，幫助全世界一切落後，不景氣的殖民地

區域推廣教育，提高生活水準，改善人民健康。而當有一天這些殖民地區域能够到達成熟的階段，它們應該有享受獨立的機會——祇要全體聯合國公認它們已經有了足够獨立的資格。

「假若我們連這一點都辦不到，那麼我們不如乾脆承認我們是無法避免再一次的戰爭了。」

這想法未免有些太沮喪了；夜已經很深了，我想。

「兩點半了，爸！」

「是的，我現在也覺得相當疲倦了。你自己也該好好地休息一下子，伊利奧。」

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第二天下樓吃早飯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經遲了。還祇有十點鐘，可是已經有五六個人在我父親的臥室中陪着他很勤勉地在開始工作了；這些人照理是應該由我來接待，通報，然後引到父親跟前去的。趕忙呷下了我的咖啡，我走進去看了他們一下：他們是馬歇爾，金氏，安諾德，霍浦金斯和哈立曼；不久，提恩將軍，美國聯合參謀總部的祕書長，也加入了。我在旁邊聽了一會，知道他們是在討論英美參謀長聯合會議中的議事程序。這議事程序中一定有些頗費周折的地方；我時常奇怪爲什麼人們老是化了好幾個鐘頭來算計他們還要化好幾個鐘頭來討論的事情。這一次，他們足足談到中午才停止。

天氣十分晴朗而美麗。祇要往外邊的花園中看一下那些鮮豔的花叢，你就可以馬上感覺到午飯是應該在外邊露天吃的。我們一共六個人：霍浦金斯和哈立曼；邱吉爾和他的貼身侍從，湯姆生海軍中校；

父親和我。吃飯時談話的中心是當天下午的工作計劃以及還應該召見的人物：諸似艾森豪威爾，墨非等等。邱吉爾同時要求允許他介紹英軍中東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給大家會面一下，假如亞歷山大來的話。我們很歡樂地吃着，談着；許多問題祇不過是偶而談到而已，誰也沒有對它加以漫長的討論。

在這個時候，我們攻入北非的戰事進行得還算順利，不過却也沒有什麼驚人的收獲。我們準備把羅美爾的部隊包圍到海邊，一網打盡，可是這一個戰役的軍事局面還依然是一個大問號。那天下午，我們同意雙方該詳盡地報告並且討論今後的軍事作戰計劃，以便決定我們第二個攻擊目標。渡過英法海峽，攻入大陸的作戰始終是雙方公開的爭論點，這個作戰計劃當時的暗號叫 ROUNDUP，就是一九四三年的第二戰場。跟往常一樣，在我們的屢次談話之中，美國方面永遠是推動提出這個問題，而英國方面則始終迴避。

午飯以後，邱吉爾和他的侍從走了，哈立曼也跟着辭出；他們走了不久，艾森豪威爾就到了。我知道他曾經害過病，因爲不久以前我曾經見過他一兩次；可是那天下午他的病似乎已經好得多了。他是陪馬歇爾和金氏一塊兒吃午飯的；他一見了我父親，馬上就對非洲的戰事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他敍述給養的困難，因爲北非海岸的鐵路是單軌的，而且已經十分陳舊了，父親很有興趣地聽着，艾森豪威爾又說那兒的公路對於給養的輸送也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幫助。

「納粹的間諜是否搗亂得很兇？西領摩洛哥對我們有什麼威脅？」父親問。

「我們很密切地在監視着他們，總統先生。一直到目前爲止，他們還沒有做過任何活動，而我預備

相信他們在將來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作爲的。」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看你所碰到的政治問題也够多的了，」父親笑着說。艾森豪威爾微笑了一下，表示回答。他沒說話；假如他說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會說：「喔，這些問題壓得我背部痛了！」他又繼續地敍述我們的部隊在卡夫薩與推貝薩區域內所遭遇到的抵抗，在那些日子，在我們還不過是在開始懂得戰爭的時候，敵人的抵抗是相當堅强而頑固的。

「這不能算是一種推託吧，我相信，」父親最後說話了。

「不，總統先生，這不過是說工作是相當艱難的吧了。」

「那麼，究竟怎麼樣？你的估計如何？」

「我不懂你的意思，總統先生。」

「完成這一件任務要多少時間？」

「我可不可以『假定』一下，總統先生。」

父親微笑了一下。

「祇要氣候有一個轉變，總統先生，我們可以在暮春的時候把他們整個兒地包住，或是趕下海去。」

「你所謂暮春究竟是什麼時候？六月？」

「說不定能够在五月的中旬。至遲是六月。」

這使我高興極了。父親也表示滿意的樣子。

墨非在五點鐘左右的時候進來和父親談了幾分鐘。他和艾森豪威爾和我父親祇討論一個問題——法國政治。墨非十分迫切地想引起我父親對吉倫的好感，他說吉倫是怎麼樣一個有才幹，有能力的人物，說他實在是美國所應該選擇的理想的對象。我在傍邊聽了一會兒，點了一下頭和我父親打了個招呼，就輕輕地溜到外邊來了。按照規定的計劃，聯合參謀總部要在傍晚的時候交給邱吉爾和我父親一部詳細的報告，敍述他們當天午飯後會議中的經過與成就，因此我跑到大門外去等他們來。邱吉爾比預定的時刻早到了幾分鐘，在他的後面跟了三個人；他要我父親在五點半的會議開始之前見一見他們。我和邱吉爾把他們帶進了父親的屋子裏。他們是陸軍上將亞歷山大，空軍上將泰德爵士和國防部的陸軍上將依斯梅。正像上次在沃根基一樣，英國方面出席會議的顧問們又在數量上佔了優勢，和我們的人數相比幾乎是二對一。

亞歷山大將軍那時正在西部沙漠指揮着英軍追擊羅美爾的非洲兵團，這次他就是從那兒的司令部直接飛來的。他恐怕可以算是英國的最能幹的野戰將領了，而那一天下午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嚴峻的，疲乏了的，單純的軍人。他鬍子也沒有刮，身上穿着戰鬥服，皮膚被日光晒得黑黑的，樣子似乎有些疲怠。他簡短地，可是却非常生動地敍述英軍的攻擊情形，怎麼樣地把納粹的軍隊迫向美軍在北非中部所形成的鐵壁。

在談到某一點的時候，父親的注意力忽然有些渙散，我湊過身子去輕輕地在他耳朵邊提醒他：

「爸，你的意思是不是要使出席這次會議的每一個英國將領都有一個相對的美國將領來平衡勢力？」

「對了。」

「那麼他們既然找了泰德來，我們爲什麼不找史巴茲呢？」

「眞的，我幾乎忘了。趕快出去找安諾德。叫他立刻設法把史巴茲找了來，愈快愈好，假如他的來不妨害那兒的戰事。」

史巴茲將軍是我的釘頭上司，在一兩天以後他坐着飛機趕了來，出席以後的參謀會議。爲了要使讀者明白當時的實際情形起見，我得乘便提一提那一天下午來向邱吉爾和我父親報告的出席聯合參謀長會議的人員中，英國軍官佔了九位而美國軍官祇有五位。可是說不定我們的參謀長們一個人要說兩個人的話。我不知道。因爲那次會議我並沒有參加。

和雙方的參謀長們談了一小時半以後，我父親還有半小時的工作要做，因爲哈立曼帶着英國的運輸大臣藍得士爵士來看他。這又是一次預定祇有五分鐘，而結果延長到三十五分鐘的談話。

最後，父親終算有了個機會休息一下，喝一杯我爲他調製的他所愛喝的酒。

「這樣很可以，」他喃喃地說，在沙發上很舒服地移動了一下他的身子。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吧？」

「我想是如此，」他微笑着，帶着回憶的神情。

「怎麼啦？」

「顯然地今天下午英國方面提到了緬甸。」他很滿足地呷了口酒。「你知道，伊利奧，我們不知化

了多少精力和時間才勸服金氏把所有的船舶和登陸艇調到大西洋戰區中——這戰區還祇不過是我們主要戰爭的背景而已。你能猜到當英國方面提到緬甸的時候他的反應嗎？他眞是一個偉大的海軍。他說：『在一切的戰爭中，勝利是由海上的力量決定的；因此，海軍所決定的計劃當是最好的計劃；目前，祇有太平洋戰區才是一個海戰的區域；因此，太平洋戰區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戰區。』」父親大聲地笑了起來。「這並不能算是他的推理，不過也差不多了，這理由已經足够了。」

「爸，」我打斷了他的話頭。

「怎麼？」

「告訴你一件好消息。他是今天下午來的。」

而小佛蘭克林從門外走了進來。我們一家人又團聚在一起，大家都興高彩烈。小佛蘭克林是驅逐艦梅朗號上的執行官，他曾經參加卡薩布蘭伽的攻擊；他很迫切地想告訴我們那次攻擊的經過情形，而我們也同樣迫切地想聽他敍述。幾分鐘後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的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也參加到我們一夥，很熱心地聽着。他談到戰爭，他目睹的戰場，怎麼樣參加那次侵入戰和其後的戰鬥——關於後者我也插了幾句嘴，說了一些我自己的經驗——這次談話使我父親聽得又羨慕又妬嫉，使他回憶起他在上次大戰中也曾作爲海軍次長參加過戰爭，到過前線。

「這一次我也要到前方去一下。」

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對看了一下，繼續地吃他們的晚飯。

「怎麼啦？」父親追問。「爲什麼大家都不作聲？」

「沉默或許就是表示同意，爸，」我的弟弟回答。

馬歇爾睜大眼睛對他瞪了一眼，他趕忙把嘴閉上。

「這絕對不可能，總統先生，」艾森豪威爾將軍說。

「這根本辦不到，」馬歇爾將軍表示同意。

「爲什麼呢？不見得有多大危險吧。你們倆個來的時候，路上碰到什麼困難沒有？怎麼樣，艾森豪威爾？從阿爾及爾到卡薩布蘭伽一路上遭遇到什麼攻擊沒有？」

「最後的兩百英里中我們大夥兒都套着降落傘預備隨時跳下的，總統先生，飛機上的一只引擎壞了，而還有一只也差不多了。坐在飛機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覺得心慌的。」

「可是這種危險是機械上的。你們之不讓我到前方去應該根據軍事上的理由。究竟是否有什麼軍事上的危險呢？恐怕沒有吧，是不是，伊利奧？」

這一下可把我問得有些狼狽了。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都睜大着眼睛望着我。我做了個手勢，指指我塞滿着食物的嘴。「沒辦法說話，」我含糊地說。

「胆小鬼，」我父親說。可是他很耐心地等着，我祇好假裝着把嘴裏的東西吞下去。「你說吧，」他催我。

「從阿蘭和阿爾及爾到突尼西亞，爸，運輸機在路上是很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擊的。這決不是開玩笑

的事。」

「我們可以派一隊戰鬥機護送呀。」

「總統先生，」艾森豪威爾指明說，「大批的戰鬥機護送一架C—54的大飛機，尤其是在納粹的無線電廣播中對這次會議的種種猜說以後……這祇會招引敵人的攻擊機，像蜜糖招引蒼蠅一樣。」

「命令是命令，總統先生，」馬歇爾說。「可是假如你一定要命令我們這樣做，那麼美國陸軍中自我們而下，沒有一個人會願意負這個責任的。」他說話的神氣非常認眞，使我父親感到很大的失望，可是他不得不表示同意。最後，他們終於採取了一個妥協的方式，請我父親到拉巴特的北部去檢閱巴頓將軍的三個師團。

吃過晚飯以後，並沒有什麼規定的工作。兩位將軍坐了一會兒就走了，祇剩下我和小佛蘭克林陪父親閑談……我們談到我們的家，我們的母親及其他的家屬……都是些兒子與父親別後重逢時一般所談的話。父親身邊帶了些紐約和華盛頓的報紙，我們趕忙圍上去熱心地翻閱一陣，談論着報上所載的事情，裏面有一段記載，敍述一個叫做拉姆伯脫生的議員在下院中指摘羅斯福的兒子們，說「他們沉湎在紐約的夜總會中，樂而忘返，而美國的一般青年們則都遠離家鄉，在爲國家而戰鬥，而死亡。」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我的大哥詹姆士正跟着卡爾遜的突擊部隊在太平洋中作戰，而約翰則在受訓，不久即將派到海上做一個軍需官。這些報紙上總是有些荒謬得使人發笑的片段新聞的。

父親那天晚上睡得相當早，還沒到十二點鐘他就上床了。他實在需要一晚好好的睡眠。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第二天早晨，一向來得很晚的邱吉爾居然很早就到了。他到的時間還沒到十點鐘，他和父親整個一上午都和艾森豪威爾，墨非，和英國的駐盟軍總司令部專員麥克美倫爵士在一起。他們討論的題目又是法國政治。小佛蘭克林和我自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在沃根基會面以後就不曾再碰到過；事實上，他是沃根基會議以後我所見到的第一個兄弟；我和他在屋裏就了沒多久就出來了，祇聽到他們談話的中心又是戴高樂和吉倫。到那個時候，邱吉爾和我父親又給戴高樂和吉倫找到了新的名字來代替「你的問題孩子」與「我的問題孩子」的稱呼。他們現在乾脆簡短地叫他們「D」和「G」。D在什麼地方呀？爲什麼他還沒準備來呀？他們就那麼簡短地問。那天的主要的政治論點還是怎麼樣爲法國的政治糾紛找出一條比較圓滿的出路。前一天晚上，我已經讀了相當多的國內報紙上的記載，使我明白到這是怎麼樣一個重要的外交問題。那天我第一次覺察到墨非是怎樣地受到各方的煎熬與責難。從我們所聽到的他們的談話中，至少有一部份的批判是相當正確的；他的主要的關心的路向似乎是怎麼樣使任何的未來法國政府能夠包羅那些曾經在戰爭爆發前危急的幾年中被目爲主要的「綏靖主義者」的人物。

午飯又是在花園裏吃的：一共是五個人，父親，霍浦金斯，佛蘭克林，我和新來的喬治·杜爾諾。喬治那時是航空運輸部的上尉，他戰前在白宮中幹過多年 INS 的工作，是我父親的老朋友。這又是一個父親能夠隨便休息的場合。到卡薩布蘭伽以後，雖然工作十分繁重，但是這一種生活的轉換却對他頗有裨益；他精神十分好，疲勞的灰暗的陰影已經從臉頰上消失。

喝咖啡的時候，他又談起開發殖民地區域的這個計劃，這似乎已經成爲了他所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對於一個以往從不曾到過非洲的人，他這次所收集到的情報，無論是地理上的，地質學上的，或是農業上的，都可以說是太豐富了。當然，我自以爲我對非洲是相當熟悉的：好幾個月之前，我曾經架着飛機飛過大部份的非洲，從空中攝取相片。可是不知怎樣地他總是有機會來得到比我所知道的更多的東西。我們討論到南突尼西亞的廣大的鹽澤，這鹽澤在很古的時代一定是個很大的內海。父親又提到起源於亞特拉斯山麓的河流，這些河流向南方流去，消失在薩哈拉大沙漠之下，變成了地下的河流。父親說：「轉導這些河流作灌溉的用途，將使我們加利福尼亞的帝國山谷顯得像一小塊白菜園那麼大！」他又說到那塊鹽澤；那裏的地要比地中海的水平線低得多，假如我們能挖掘一條運河來使這鹽澤重新變成活湖——一百五十英里長，六十英里寬，那麼，「薩哈拉幾百英里的沙漠可以變爲肥沃的土壤。」父親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薩哈拉並不祇是一堆黃沙，它事實上有使人驚訝的豐盛的活力。每一次雨後，總可以看到處處開放出各色各樣的鮮花，過了幾天之後，這些花又在强烈的陽光與過度的乾燥中枯死。小佛蘭克林和我對閃了一下眼睛：父親難得有這樣的高興，他的活躍的心靈與敏捷的想像配合在一起，活潑地工作着，而我們的腦中都在想，聰明而健全的計劃將使這塊土地有不知多大的改善與發展。

「財富！」他叫道。「帝國主義者們始終就沒有覺悟到他們究竟能做些什麼，能創造些什麼！他們從這塊大陸上搶走了不知多少萬萬元的財富，而這是因爲他們實在太近視了，始終沒有想到，與這塊土地的發展可能性相比，他們的幾萬萬元實在祇不過是幾個銅板而已。要發展這塊土地，必須使居住在這

塊土地上的人民能够享受一個更好的生活……」

那天下午，美國的各部參謀長們回到我父親那兒，報告當天與英國方面討論到的各項計劃。從這個報告中，我們知道英美雙方在很多地方都抱着相對的意見，而邱吉爾與他的參謀長們所擬定的議事日程與兩天前我父親和霍浦金斯所批閱的美國方面的議事日程竟完全不同。英國方面祇想在地中海發動小規模的戰鬥，而置攻打歐洲側面的大規模作戰計劃於不顧。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談起西西里，以及其他幾個把我帶到勝利之路的中間地點：諸似多得喀尼斯羣島，從那兒使我們進入希臘，而終於攻入山嶺連綿的巴爾幹半島。

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等二天中午的時候，第一批客人到了。他們是諾戈斯將軍，法軍駐拉巴特的司令官；巴頓將軍和威爾伯將軍。威爾伯將軍是巴頓的部下；他來的目的是想做我父親的繙譯，可是我們並不需要他，因爲我父親的法文說得十分流俐，而他可以毋須傍人的幫助，和諾戈斯直接交談。

諾戈斯和巴頓這兩位將軍相處之融洽是頗值得驚詫的，他們在不多幾個星期之前還在法屬摩洛哥的海岸上很熾烈地交戰。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兩個都是職業軍人，他們在戰場上的敵愾心是決不會擴展到戰場之外的。此外，他們二人都沒有强烈的政治觀念與見解。他們都是按照命令而行動，而幸運地，巴頓是比諾戈斯有更高的工作效率與才能的。諾戈斯接到命令要他抵抗，於是他就抵抗；後來，他又得

到命令，要他停止抵抗，於是他就停止。現在，他有了新的上司。

在我父親看來，這不過是一次禮貌上的拜訪而已。可是，這次拜訪却也有它其他一方面的意義；這位諾戈斯時常被邱吉爾所提到，說他是使他沒辦法帶戴高樂到卡薩布蘭伽來的一大阻礙。當時，諾戈斯——法國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職業軍人與殖民地管理者；對於一切事務的處理，他希望上峯能給他一道明晰而毫不含糊的命令，然後他願意不受干涉地單獨去執行——是一場熱烈的爭辯的中心。據邱吉爾告訴我們，戴高樂在倫敦堅決主張他的同胞，他的同僚諾戈斯應該作爲一個附敵的軍人而關在牢獄中，他應該先被監禁起來，然後受公審。可是這兒在法屬摩洛哥，我們都知道巴頓將軍（不久之前還是他的敵人與猛烈的交戰者）却堅決主張諾戈斯應該保留他現有的地位。後來，巴頓曾經爲諾戈斯提出一份非常公正而强硬的報告；他認爲諾戈斯在摩洛哥的蘇丹與當地土人間的聲望與勢力，在我們利用該地爲我們的基地的時期中，對我們有莫大的軍事上的幫助。

在那一個溫暖的星期日的下午，父親向那個法國人問起關於摩洛哥人民的情形以及怎麼樣改良他們的生活；對於這些問題，那個法國人瞠目不知何對。他從來就不曾動一動腦筋來探索一下這些問題的答覆，也從不曾有什麼人向他問起這些問題。可是他知道得很詳細究竟有多少財富可以從這國家搬走，而他亦知道得同樣詳細這些摩洛哥的土人們可以被榨取到什麼程度。這兒的蘇丹，巴頓告訴我們，多少年來始終是在諾戈斯的掌握之下；諾戈斯祇想維持這一種原狀，此外，他似乎並無其他企圖。這位戴高樂的死對頭和父親談了一會就跟着其他兩位將軍起身告辭。

他們走了以後，父親說：「伊利奧，你替我記下來，我預備請那位蘇丹吃一次晚飯。問一問墨非或是隨便什麼人關於請他吃飯的條文與形式。這個諾戈斯……我們可以不必去理他。」

諾戈斯和巴頓和威爾伯離開我們這兒後就去看邱吉爾；邱吉爾陪他們坐了一會兒就步行到我們的別墅來，和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們那天早晨他到碼頭那兒去看了一下那條法國戰艦傑恩，拔脫號的軀殼。

「什麼，你去看了那條法國戰艦？」父親很激動地叫道：「天呀，假如你能去看，我也能去。」

我們忍不住都大聲地笑了起來。他一下子變得像個六歲的孩子一樣：你有冰淇淋吃，我也要一點。

那天下午，馬克·克拉克將軍來看我父親。邱吉爾已經走了，走的時候他耳朵裏塞滿了我父親對戴高樂的責難。父親始終認爲邱吉爾是故意不讓戴高樂來，而祇要他願意，他可以隨時把他的「問題孩子」叫了來；父親的這一個信念一天天加强起來。現在，馬克·克拉克將軍已經來了，他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報告。因爲他親自把美國的「問題孩子」，吉倫帶到卡薩布蘭伽來了。現在我父親有一個機會可以親自見一下這位被墨非和我們國務院所極力推薦，認爲是美國所應該支持的，用來平衡被英國所捧出來的獨裁的戴高樂的勢力的唯一恰當的人物。父親感覺到相當小心却頗有興趣，最後終於很迫切地想見一見這位被任命指揮北菲法軍的吉倫將軍。

克拉克就了沒多久，看見父親已經準備接見吉倫，他就走了，預備去把吉倫帶來。我想當時整個別墅的人都感到十分興奮：這幾天來霸占住我父親的整個心靈的對邱吉爾的外交戰似乎可以自己解決了，

我們都這樣希望着：這將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棋局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步。當克拉克帶了吉倫回來的時候，畢非和麥克利大尉也來了，大家都坐下來預備作一次決定性的談話。

這次會面對於我父親眞是一個絕大的失望。

在吉倫的眼中看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存在過。他認爲目前祇有戰爭中的軍事問題。他筆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從不鬆弛一下子。祇有他的年齡使他稍爲軟化一點，渾他的牢獄生活都不會在身上留下任何顯著的痕記。當他最初的那種不安與疑懼的心情消失的時候，他的語氣中開始有了堅決的聲調。

「祇要給我們武器，」他大聲地叫道。「給我們大砲，坦克和飛機。這是我們全部的需要。」

父親對他相當客氣，可是他的問話却非常堅決。他的軍隊究竟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可以徵募殖民地的部隊，幾萬人都不成問題！」

那麼誰來訓練他們呢？

「我的指揮之下有很多軍官。這決不成問題。祇要給我們武器就行。至於其他……」

可是他所謂的「其他」却包含着許多他永遠無法洞察的嚴重的問題。邱吉爾早就指明他之遲遲不廢止原先在維琪政權下頒佈的反猶太法律是戴高樂不滿的最大原因之一——或者至少是他所聲明的原因之一。吉倫把這些問話劈開一傍，不加答覆。他祇是一心一意地反覆他自己的見解。

「我們唯一的需要是裝備。幾星期的訓練，我們馬上就可以有廣大的有力的軍隊。」

父親用他的問話來暗示吉倫，說他未免把他的工作看得太容易了。可是那位法國將軍却如此專心地聲述他自己的計劃，以致我懷疑他是否覺察我父親的否定的反應。吉倫的信念是非常堅强而沒有邊際的。可是父親却始終沒有答允他些什麼。

吉倫和其他的人們一離開他的房間，父親就用表情和手勢表示出他對吉倫的印象。

「我怕我們現在是依靠在一根非常脆弱的蘆葦上，」他說。他舉起他的雙手，短短地笑了一聲。「這就是毫非說的可以號召起法國人民的人！他是個毫不中用的行政者，也將是一個毫不中用的領導者！」

那天晚上的晚餐席上有邱吉爾，藍得士爵士，海軍上將柯銀漢，海軍上將金氏，陸軍上將蘇末維爾和哈立曼；召請這些人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可以利用晚餐的時間來討論那重要的船舶優先問題，並且找出一個雙方同意的解答。在那個時候，各部參謀長們已經聯合起來把那個緬甸作戰的題目推開窗外；大家已經開始具體地討論到盟軍下次攻擊的目標應該是西西里，目的是想保障通過地中海到達波斯灣而轉入蘇聯的交通綫。可是那時船舶還是異常缺乏，而需要又是那麼迫切。大西洋之戰，在一九四二——三的冬天，離開勝利的鵠的還遠得很。爲了要在英國屯積起必需的物資，究竟需要保留多少噸船舶？我們應該留出百分之多少的船位來預備把我們的部隊與給養從地中海撤回到英國去？我們是不是可以確定非洲的戰事能在五六月間結束？我們應該爲西西里留出多少船舶來？在英國人的心目中，保留給摩爾曼斯克和波斯灣之役的船舶噸位大可減少；而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則認爲我們應該儘量留出多數的船舶來完成這一方面重大的工作。

這個關於船舶問題的會議一直延續到夜深一時，而我在他們談論的中途就先退出了。那天夜晚，我和小佛蘭克林離開了安福營地，到幾位年青軍官們的宿舍中去玩了一晚。

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馬克·克拉克和墨非在第二天早晨又來看父親，重新和父親討論法國的政治情形：他們在一起談了有兩小時之久，小心地計劃在法國獲得眞正解放以前，美國對組織臨時法國政府所抱的政策。在我父親的目光中，我們的離局至少是相當明確的了：我們對吉倫作爲領導者的資格犯了評價過高的錯誤，我們採取了與維琪系統的法國殖民地人士合作的曖昧政策，這兩點使美國很難能够反對英國所支持的戴高樂的一人政府。墨非和克拉克走了不多久，邱吉爾來吃午飯；午飯時的談話很散漫，關於戴高樂之始終不在卡薩布蘭伽露面，父親和霍浦金斯繼續很溫和，却很明確地與邱吉爾爭論了一番。

那天下午，父親第一次得到了一個離開他住的那所別墅的機會；他由巴頓將軍和巴頓的第一裝甲兵團第三大隊司令祥生中校陪着，爬上了一座吉普車，出發去檢閱一隊派來保護安福營地的步兵隊。我在門口迎接他的歸來。

「你應該去看一下那班軍樂隊的，」他說。「裏面有一個胖傢伙差不多有三百磅重，他吹的一支笛却最多不過祇有四兩。」

各部參謀長們按照時刻在五點鐘來看我父親，他們坐了一小時半才走。七位英國方面的軍事代表和

四位美方軍事代表已經決定了攻入西西里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的暗號叫 HUSKY。在某一點上看來，我們可以說一方面剛決定退出北非，另一方面却馬上從事於西西里的作戰。這一次，美國方面的主張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橫渡英法海峽的作戰；與英國方面的主張先奪得西西里與多得喀尼斯羣島，然後通過希臘或巴爾幹侵入歐洲；由 HUSKY 這個新作戰計劃的決定而得到了妥協。顯然地，邱吉爾曾經提議放過意大利而攻擊他所謂的「歐洲柔軟的腹下部」。他始終認爲我們之攻入歐洲應該擇取一條適當的路線，使我們之與紅軍會師將在中歐一帶，這樣，英國的勢力範圍可以儘量地擴展到東歐來。當時英美兩方面都認爲 HUSKY 是這次戰爭中向前的重要的一步。爲了要把盟國的大軍調到西西里方面來作戰，並且把意大利從戰爭中消滅掉，我們認爲橫斷英法海峽的侵略戰祇有延遲到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才能進行。

那天下午，父親和邱吉爾都同意通知史大林英美雙方的新戰略。在那同一天的下午，這兩位政治家又想到要對軸心國發佈一個關於戰爭的共同聲明。

吃完了一頓很冷靜而非公式的晚餐以後，我和小佛蘭克林就到大街上去逛。我以爲父親一定已經上床而很早睡了。可是當我們在夜深二時回到別墅的時候，我們發現他的確已經上床，可却並沒有睡着。他在看一本卡夫曼——哈脫戲劇的二毛五分錢的再版本，「來吃晚飯的人客」，他一面看，一面不斷地發笑；在他的床邊是一本他剛看完的「紐約人」。他之還沒有睡是因爲想等我們回來，聽我們談談晚上的經歷；和每次一樣，他總是羨慕我們所享受的比較自由的生活與行動，而非常有興趣地聽我談說我們一路上的故事。說老實話，我們那晚出去並不好玩，而是相當乏味的；我們找了兩個海岸巡邏隊員做我

們的嚮導，在本地的市街上兜了一個圈子；可是我儘量利用我的想像把細小的事物描述得十分生動。

一月十九日，星期二。

第二天一早，我用力搖醒了我的睡眼朦朧的弟弟。佛蘭克林在那天清早要回到他的那條驅逐艦上，而他幾乎誤了時間。哈立曼和墨非很早就來和父親在一起工作了，討論和吉倫作第二次會議的準備。那位法國將軍在中午的時候到達，他的腦中還充滿着關於他的模糊的未來底軍事計劃。父親對他闡明了美國在戰時的對法政策：

臨時政府必須組織，而必須由吉倫與戴高樂二人共同負責組織。

臨時政府必須管理法國之一切行政設施，至法國獲得完全之解放爲止。

吉倫對於這個計劃並不怎樣熱心，可是他亦沒有什麼相對的意見可以提出，他沒有對什麼特殊的地方感到不同意，他所關心的祇是美國究竟能供給他的殖民地軍隊以多少軍火。

當談話在並不興奮的氣氛中行將結束的時候，霍浦金斯對我做了個手勢。

「你的父親想買些紀念品，預備帶回去送人。你願意陪我一塊兒去物色一番嗎？」他說。

「我當然願意。」

「我們恐怕要到飯後才能去。我想他們還準備拍照——你的父親和吉倫合照。」

午飯以後，巴頓將軍派了他的汽車來接我和霍浦金斯進城去。我們在大街上所看到的祇是些地氈和

一些質地頗爲低劣的摩洛哥皮貨。我們派人送了幾條地氈到別墅去，給我父親自己看看，挑選幾條合式的；我們接着就坐着汽車在海邊區域內兜了個圈子，看一看幾星期前我們的部隊所攻擊的海岸與沙灘。

回到我們的別墅的時候，我們發現邱吉爾已經來了，帶了他的兒子雷道爾夫。他的兒子那時候是義勇兵團的上尉。從前我曾經見過雷道爾夫一面，那是在阿爾及爾，聖誕節的晚上。我很希望能够和他談一下，因爲我知道他除了是義勇兵團的一位軍官外，同時亦是英國國會的一位議員。可是我在沒和他談話之前的希望是如此地高，而談話後的失望却又如此地大。我發現在阿爾及爾的那個聖誕節的晚上，年青的雷道爾夫對談話有一個獨特的觀念，他認爲談話似乎應該是單方面的演講。

這一次我看到年青的邱吉爾在我父親的別墅裏，我心裏暗暗地想看一下，他在他父親和我父親的面前，是否能像在我的面前一樣，那麼沒有顧忌而明確地發表他的言論。我最初以爲他或許會有點胆怯，可是却沒想到他居然還是那樣的饒舌，並且對他所提到的任何題目都帶着他獨斷的，決定性的見解。他在場的短短的五十分鐘之間，我們祇聽到他一個人在講話，他解釋錯綜複雜的巴爾幹的戰爭與政治，他向在場的政治家們說明一種最簡易的方法，可以使他們保持英國人在地中海的領導權，而同時却無形中使世界戰爭延長數年，他暴露出聯合參謀總部爲總理大臣與大總統所擬定的作戰計劃中的錯誤與失策的地方，他輕淡地爲這同一的總理大臣與大總統解決了那使他們甚感苦惱的微妙的法國政治問題。那眞是一番十分出色的表演，抓住了他的聽衆們的興趣——觀衆們之默然傾聽，並非是由於五日來之疲乏，而是覺得他的作風甚爲有趣，可以藉此分散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說不定我應當在這裏把雷道爾夫的父

親除外，可是我所記的確是我當時的反應，也是我父親的反應，他在年青的雷道爾夫走以前，始終忍着他的笑。）

他們走了以後，就剩下了我和父親兩個人。不多幾分鐘以後，巴頓將軍的汽車來接我們到他的總部，瑪司別墅去吃晚飯。那天晚上的晚餐桌上有海軍少將柯克；巴頓的代理，陸軍少將凱司；陸軍準將魏特邁；陸軍準將威爾伯；陸軍準將赫爾；和陸軍上校蓋氏。這些軍官們大部份是第一裝甲兵團中帶兵的指揮官，而他們都顯然地在等待一個機會想向美國的大總統聲述坦克與裝甲部隊在一般現代戰爭中之無比的優越的地位。在這個合唱中，巴頓担任了主要的男高音的角色，而其他的人則很合禮地加入合唱，配成和聲的部份。飛機？步兵？

「裝甲！」巴頓叫道。「現代戰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今後的戰鬥，雖不能說是全部，却至少可以說是大部份，將由坦克與裝甲機動車所担任。至於步兵？步兵能幹些什麼呢？除了担任掃蕩的工作與保守坦克所佔領的陣地。」

我相信那天晚上是我提到了飛機這個題目。

巴頓很有禮貌地加以反駁。

「當然，飛機也有它的用處。我絕對不會說飛機是毫無價值的。我始終認爲飛機對於掩護裝甲部隊的地面作戰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我是一個空軍，爲了表示對空軍的忠心起見，我提到了一下飛機這個題目，此外，我便始終謹慎地

一語不發。至於我父親，他祇自顧自吃他的晚飯，鬆懈一下他的精神，而儘量享受那個夜會。他是絕對不會讓他自己被牽涉到任何軍隊內部的爭論中的。因此巴頓將軍那晚得以隨心所欲地發表他的言論。（在一個多月以後，他奉命指揮突尼西亞南部戰場的作戰，我頗有趣味地回憶到他的那段談話，當我聽到我們的非洲總司令部的軍事廣播中不斷地發出巴頓將軍的請求，要我們作更多的空中偵察，供給更多的空中支援——不是在背後掩護，而是要我們在他的裝甲部隊之前領導攻擊。）

巴頓將軍在卡薩布蘭伽的總司令部實在像是一個陳列的場所。在我們攻下這城市以前，他的這所別墅是納粹派到法屬摩洛哥的代表團的本部；當敵人退走的時候，他們匆促離去，沒有時間來取下屋中的任何華貴而值錢的裝飾。巴頓將軍高興得像個小孩子一樣，領着我們參觀屋內各處的華麗的擺設與裝飾物。

父親和我在十一點鐘過後就回到我們住的那所別墅中來。回家的途中，大部份時間他都在和我開玩笑，講起方才的裝甲部隊對空軍的論說。他好像覺得很高興，很得意的樣子，而在他的談話中他表示他的這種心情。我們到家後不到五分鐘，邱吉爾就來了，他和我父親一起喝了杯酒，談談關於吉倫與戴高樂的問題。邱吉爾很間接地又重新提出他的主張，說法國臨時政府的組織最好還是交給戴高樂一個人去負責辦理；他已經知道父親對吉倫的能力感到相當的不滿。可是那天晚上父親好像沒心情來和邱吉爾再辦論這一點；他很乾脆地拒絕討論這個問題。或許他是太疲倦了，他並沒有很週到而機巧地講明爲什麼他不喜歡再多談這個問題。因此霍浦金斯和我不得不配合起來，小心地儘量把談話的中心扯到其他無關

緊要的題目上去。夜深一時，邱吉爾起身告辭，而霍浦金斯也跟着就上樓回到他的臥室中去。

我送我的父親到他的臥室中去。父親說，「現在邱吉爾是當眞開始感覺到有些不安了。今天晚上，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來。」

那天晚上我所能看到的祇是邱吉爾很明顯地想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而父親則顯明地拒絕討論它。我當時認爲我父親已經疲倦，不願意多談。事實上那却是他的一種戰略，而顯然地兩方面都知道對方的用意。

「再過兩三天你就可以明白這個故事了，」父親說，現在他的樣子突然變得高興起來。「今天是不是星期二？我可以和你打個小賭，邱吉爾在星期五之前一定會乖乖地告訴我們他有辦法叫戴高樂到卡薩布蘭伽來。」

我們談到了巴頓將軍，父親說，「眞是一位非常愉快，使人喜歡的人物，你說是不是，伊利奧？」我們又談到年青的雷道爾夫。邱吉爾，父親的批評是：「像他這樣大胆而沒有疑懼的人物大概很少有的吧！」後來我們又談到那天下午我和霍浦金斯所看到的那些地氈。父親有些担心英美雙方的參謀長們所作的最後軍事決定可能引起史大林與蘇聯人民的重大反響。「假如史老頭子能够自己來就好了，他可以親眼看到我們的船舶的困難與生產問題……」

父親那天晚上相當疲乏。我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生產與給養的問題是第二天議事程序中的第一個項目。蘇末維爾很早就來和霍浦金斯一起吃早飯，我在八點半下樓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工作好半天了。霍浦金斯當時是優先委員會的主任；關於美國戰時生產的情形，他是唯一知道得最詳細的一個人，他知道當時美國的生產量還微少得可憐。

我的上司，史巴茲少將在十點鐘左右來看我父親。他是前一天到達卡薩布蘭伽的，父親希望能和他當面談一談。史巴茲那時是美國駐非空軍總司令，同時他又指揮西北非的空軍部隊，後者是屬於盟國聯合航空作戰部的。父親認爲這機構聽來似乎有些複雜。史巴茲點頭表示同感。

「它的確是相當複雜的，總統先生，」他說。「聯合指揮並沒有使它更爲簡易化。泰德恐怕可以說是再理想沒有的人物了。」——空軍上將泰德的階級比史巴茲高，他是非洲盟國空軍的最高統帥——「可是我們雖然相處得十分好，有好多困難還是免不了的。」

「究竟是些什麼困難呢？」

「是這麼一回事，總統先生：在這個戰場之內，所用的飛機差不多全是美國的。戰術與戰略也是美國的。一切的作戰也完全是美國的。可是最高的統帥權却在英國人手裏。」

我插了一句嘴。「事實上，爸，史巴茲將軍是在負責一切空中的戰鬥，可是在泰德的指揮之下。」

「總統先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史巴茲接下去說，「我們的合作不圓滿。事實上，我們相處得都很好。我所描述的困難，我相信，是一切盟國，一切聯合指揮所共有的困難。聯合指揮最容易引起問

題的時候是當這個聯合指揮部所指揮和管理的祇是屬於一個盟國的人員與物資。」

父親點了點頭。史巴茲又繼續談到他的司令部所遭遇到的其他問題：在那個時候主要的問題是怎麼樣得到充份的飛機的補充以及怎麼樣建築足够應用的硬地機場。我們在非洲的機場是很難能使我們滿意的，在一場大雨之後，我們時常不得不取消一切預定的作戰計劃，有時候是幾小時，有時候甚至是在幾天之內我們完全無法活動。

與美國的高級將領作這一類的談話對我父親有重大的幫助與補益。當時與英國聯盟作戰的政治情形是這樣的：英國人因爲答允了給一個美國將領來做最高統帥，堅持要由英國將領來担任比最高統帥略次一級的職位，這種要求也說不定是相當正當的。因此海軍總司令便由一個英國人（柯銀漢）來充任，而空軍總司令也是一個英國人（泰德）。在地中海一帶，由英國人來指揮一切海軍作戰活動可以說是很恰當的。可是在空軍作戰中便有些不同了；史巴茲得負全責來指揮一切空戰的活動，而同時却必須服從一個英國皇家空軍將領的命令，固然這位將領是一個非常有才幹而使人有好感的軍人，可是在實際上，史巴茲還是不免感到許多不便與困難。

墨非，像個油滑的伸縮玩具，那天早晨又探進頭來看我父親和霍浦金斯。他們討論怎麼樣使戴高樂的支持者，英國政府，能够覺悟到我們是的的確確地主張法國的任何臨時政府必須包羅戴高樂以外的勢力。他們還在談論着的時候，邱吉爾和他的顧問麥克美倫來吃午飯；匆忙地我在花園內的餐桌上添了幾個位子，而他們繼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把戴高樂帶到卡薩布蘭伽來是不是探明他反對這計劃中的臨時政府的眞眞理由的最好的辦法？是不是應該馬上就叫他來？爲了要叫他到這兒來，使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頭痛的問題，邱吉爾以爲我們應該做何種的讓步？美國方面是否能够確定在將來的政治舞台上是弄吉倫不可的？除開了主觀上的衝突，是否尙有其他的不和阻礙這兩個人到達一個圓滿的政治上的聯盟？

談論到最後，邱吉爾突然把椅子朝後一推，站了起來，說他準備再去見一下吉倫。我偷偷地看了一下父親，可是他臉上的表情祇透露出一種友好的關心。即使他還是在懷疑邱吉爾的動作完全是一種做作和政治上的策略，他是決對不會在外表上表示出來的。

快近傍晚的時候，邱吉爾又走進了父親的別墅中的起居室，後而跟着吉倫。這一次我留在外面和父親的密探們以及偶而的來客們閒撩，沒有進去聽他們的談話。在屋子裏，父親與邱吉爾以吉倫和他的侍從文官波尼亞托斯基爲對象，仔細地研究戴高樂所提出的各項問題；正確地算計怎麼樣可以使得他們這一次的聯盟不致於完全是動搖性的；儘量地從單方面來溝通這兩位主觀甚强的法國軍事領袖間的主觀上的不和。這些是我屢次聽他們在反覆談論的話題。父親和邱吉爾一定會和我一樣地感到厭煩了，可是我終究比他們好得多，因爲至少我是可以毋須抓住這個問題不放的。

當他們走了以後，我回到我父親的身邊，腦中在想着今天晚上該在邱吉爾的住所晚餐，而說不定在晚餐席上他們又得討論起這同一的問題。父親正在批閱一堆剛從華盛頓送來的公文，看見我走進房門，他抬起頭來，說了句使我放心的話：

「伊利奧，我們已經決定今晚不再談公事。」

在邱吉爾的別墅中的那一個晚餐會的確是十分歡樂而愉快的。作爲英國的戰時內閣總理大臣，邱吉爾老是堅持着要隨身帶着大英帝國的作戰計劃。他的侍從們爲他佈置了一間壯麗的戰爭室，到處鋪着，貼着各個戰場的地圖。他非常高興而得意地指點給我們看；假如戰爭是一種遊戲，而不是那種血腥的，混亂的，乏味的，消耗元氣的勾當，我相信這些地圖實在是一切遊戲中最好玩的了。每一張地圖上都插滿了小針，可以拔出來又插到其他的地位上去。而最迷人的可以說是那張北大西洋的大海圖，上面以各色各樣的記號指示出納粹的潛艇活動，每一個滑動的小型潛艇代表一個納粹的潛艇集團：很多的納粹潛艇靜伏在羅列翁和布勒斯特，又有很多潛艇指向西方，針對着我們航向英國本土的船舶集團，一部份潛艇埋伏在阿連爾羣島的海中，又有一部份在冰島海外，或是指向北方，監視着摩爾曼斯克的海航線。每天邱吉爾看他們在這張大地圖上登記關於船舶動態的最近情報；每一次都懷着重大的不安的心情，担心着這一批船舶是否可以平安無事地完成它們的旅程？那一批船舶中有多少噸的重要物資將爆炸，散失，而沉到海底？英國的海岸巡邏隊是否有一個機會來狠狠地炸掉幾支這些豺狼似的潛艇？那一年冬天，北大西洋的海戰將要到達一個最高潮的階段；這張大海圖上的小針與小型潛艇所產生的不安的心情正代表着全世界的不安與關心，它的解決包含了世界史課題的解答。

那晚我們回來得比較早；父親一回家就上床了，因爲第二天將是一個漫長而忙碌的日子。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我還沒下樓，他就已經起身，吃完早飯，出門去了。與他同去的有霍浦金斯，哈立曼，海軍提督麥金泰，和羅非；克拉克將軍是他們那天的主人。從卡薩布蘭伽他們乘車向北到拉巴特，在那兒我父親去檢閱第二裝甲兵團，步兵第三師與步兵第九師。他們一批人形成一個相當可觀的行列：領頭的是一隊憲兵機器脚踏車隊，一部吉普車，一部偵察車，接着是我父親的橋車，隨後的是侍從他的一行人衆，坐着軍車，再後的是兩部重卡車，載滿了全付武裝的士兵，兩部偵察車，又是一隊機器脚踏車隊殿後。我父親的密探頭邁克甚至還準備了一隊戰鬥機，在高空保護他們一路沿着海岸線向北，然後保護他們回來。

八小時以後他回來了。

「好玩嗎？」

「好極了！眞是再好沒有的一個生活的變換……」

「可以暫時忘掉一下吉倫和戴高樂，是不是？」

「事實上，今天早晨去的時候，我們在路上看到幾隊法國摩洛哥的步兵與騎兵隊在操練。我沒說什麼，但是我想可能是吉倫故意叫他們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操練，使我可以看到他屢次所說的……」

「你坐了一天的汽車？」

「不。他們爲我準備了一架吉普車來檢閱第二裝甲兵團和步兵第三師。我得說，一進吉普車，我坐上好半天才下來。」

「你忙不忙，是不是還有傍的事要做？假如你……」

「我沒事。晚飯以前沒人來找我。你坐下來。我要告訴你一天的經過。我希望你能看到那個步兵師團中有幾個人的臉上的表情。你可以聽到他們驚異地說：咦，是老頭子親自來啦！」說到這兒，父親哈哈地笑了起來。

「你在那兒吃午飯的，爸？」

「在檢閱場上露天吃的。和克拉克，巴頓在一起吃的。當然，還有霍浦金斯。」他向樓上喊道：「喂，哈萊！你說今天在檢閱場上吃的那頓午飯好吃不好吃？」

霍浦金斯正在樓上洗澡間裏洗熱水浴，他大聲地回答：「午飯時的音樂眞是再好沒有了。」

「對了，」父親說。「他們奏却塔諾加、巧、巧，阿歷山大的爵士銅樂曲，還有一只關於德克薩斯的曲子，一邊奏着一邊拍手的，你總知道的……」

「是不是那支叫做在德克薩斯的中心的曲子？」

「就是那支。此外他們還奏了幾只華爾茲舞。伊利奧，你告訴我。除開了美國軍隊，還有什麼傍的國家的軍隊能够有騎隊的軍樂隊奏那一類的樂曲，而他們的大元帥則正在一傍吃着火腿，洋山芋和青豈？」他伸了一個懶腰。「啊，我今天累了。午飯以後我又檢閱了步兵第九師，然後我們坐着汽車一直開到勞烏梯港口。」

「你看到碼頭上那些船嗎？」

「我們炸沉的那些船嗎？當然我看到了。」

「我不曉得你計劃着要到勞烏梯海港去的。」

「那兒有我們的一所公墓，」父親提醒我。「公墓裏躺着八十八個美國的勇士。我們留了一個花圈在那兒……也留了一個在法國公墓裏……」

「不湊巧今天天氣不大好。」

「雨是四點半以後才下的。……這些軍隊，伊利奧。他們個個都精神抖擻，隨時隨地都可以應戰似的。一個個都那麼壯，晒得黑黑地，微笑着，並且……並且裝備整齊。」

「嗨，你這是什麼？」

「什麼？喔，這個。這是我今天吃午飯的飯盒。他們送了給我。我預備把它帶回國去做一個紀念品。」

「說實話，爸，你又在胡亂收集東西了。……你得知道一個海陸空的大元帥就是在國內要檢一個飯盒也不難呀！」

「一點不錯。可是這只飯盒是我親自用來吃午飯的，在拉巴特，在我檢閱參加這次艱苦的戰爭的三帥美國兵的那一天。這是一個很好的紀念品。我一定要把它帶回去。」

他已經快回到他臥室門口，預備去換衣服了，突然聞我們聽到客廳裏有人走動。那是邱吉爾，他跳了進來，滿臉的笑容。

「我坐一分鐘就走，」他叫道。「我來告訴一點最近的消息。而且是好消息！」

「總司令部來的消息？」父親問。「是什麼消息？」

「倫敦來的消息，」邱吉爾笑容滿面地說。「戴高樂。看來好像是我們已經有辦法勸他到這兒來參加我們的會談了。」

沉默了一下子，父親簡短地說：「很好。」他慢慢地向臥室移動。「恭喜你，邱吉爾。我始終，」他說，相當尖銳地，「我始終知道你是有辦法的。」

那天晚上，父親九點半就睡了。那是他到北非以後睡得最長的一晚。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第二天快近中午的時分，通訊兵團派人來爲父親與邱吉爾拍幾張正式的像片，全體參謀長們也參加一起攝影。陽光照耀着，大家都坐在父親的別墅外面的庭院中；大家高聲地談笑着，空氣十分和諧而隨便。會議中艱重的工作已經快近結束的階段。關於怎麼樣使戴高樂與吉倫結合起來的一個微妙的談判固然還沒有完成，但是談判的基礎却已經奠定了。不論是好是壞，軍事方面的決定大致已經通過，而唯一還沒有開始的工作是草擬一份向全世界公佈的聯合聲明，闡明卡薩布蘭伽會議以及它的立場。

攝影完了以後，父親和馬歇爾將軍兩人一起進午餐，午餐以後，他們倆人又在父親的起居室談了很久。在他們談話的時候，我靜靜地坐在門口的扶梯階段上，等候父親的使喚。我可以聽得到他們的談

話：馬歇爾解釋美國參謀總長們在提出一九四三年侵入歐洲這個議案時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可是現在雙方終算決定了在地中海的作戰計劃；他約略地敍述他們怎麼樣壓服了英國方面進攻緬甸的野心；他又報告說英美雙方同意在盟軍順利地侵入西西里的場合，對於意大利的攻擊務須以不擴大範圍爲原則。馬歇爾走了以後，那天下午父親便沒有什麼其他的約會了，他和我談起聯合參謀長會議不知經歷了多少險峻的道路才到達了侵略西西里的這一個計劃；他帶着哲學風味地批判英國方面之堅持不願從西方，而想從南方來攻入歐洲的計劃：他很担心史大林的態度，當後者聽到我們又要延遲橫渡英法海峽的作戰的時候；他說：「戰爭是變化不定的事件。要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與一個盟國維持很困難的團結，而同時却顯然地把另一個盟國置於不利的地位。要想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被迫採取一種戰術上的妥協，這妥協必然地要得罪蘇聯，而使我們將來不得不採取另一種妥協，而這另一種妥協又必然地將得罪英國。總而言之，戰爭的迫切的需要主宰了一條艱難的道路。」

「可是遲早我們要得到勝利的……」我開始申述我的意見了。

他的回答是：「我們爲戰爭而形成的團結決不是我們爲建設和平而形成的團結，兩者的距離相差太遠了。戰爭終結以後——我們馬上可以聽到一種呼聲，說我們的團結是可以不必要的了。那個時候才是我們的工作眞眞地開始的時候。」

那天晚上，晚餐以前沒有鷄尾酒，晚餐的時候沒有葡萄酒，也沒有豬肉。蘇丹，回教的「天父之

子」是我們的貴賓。

他來了，帶着繼承他王位的年青的兒子，他的大宰相，他的文書大臣，全都披着華貴的飄動的白綢袍，並且還帶了禮物：一對金鐲子和一座高高的婦人頭上戴的冠冕，是送給我母親的。一看見那座冠冕，父親直着臉對我斜看了一眼，接着很莊嚴地閃了一下他的眼睛。當時在我們倆人的心目中有着同一的思想：想到我母親在白宮裏主持一個正式的宴會，頭髮上高聳着那一座又高又大的威嚴的冠冕。

蘇丹坐在我父親的右邊，邱吉爾坐在父親的左邊，於是晚餐開始了。開頭的時候邱吉爾好像興緻十分好——他告訴我們，戴高樂在那天中午時候已經到達，並且已經和吉倫一起吃過午飯，去拜訪過邱吉爾。可是在談話的進行中，邱吉爾的臉色却變得愈來愈難看了。使他不高興的原因是父親和蘇丹非常融洽地談到法屬摩洛哥的廣大的天然富源，以及開發它的豐富的可能性。他們倆個談得十分高興，他們的法文——並不是邱吉爾的最强的語文——使他們很容易地談論到許多問題，諸似怎麼樣提高摩洛哥人的生活標準，以及怎麼樣應該保留摩洛哥的大部份國富在它的國境之內，以求達到這一個目的。

蘇丹表示他是萬分願意能够得到外界的最大幫助，使他的國土中可以獲得普遍的近代教育與近代衛生的水準。

父親爲他指明說，要達到這一個目的，蘇丹不應該讓外國的勢力在他的國內得到特權，這種特權將使他的國富外溢，以致乾涸。

邱吉爾想改換他們的談話題目。

蘇丹，又提起了方才被邱吉爾切斷的談話線索，問我父親關於法國政府的將來有什麼意見。

父親，把他的叉子放平穩了，很高興地說，戰後的情景與戰前的情景將有明顯的不同，尤其是關於殖民地問題。

邱吉爾乾咳了一聲，立刻講起其他的事情，想把話題扯開去。

很有禮貌地，蘇丹進一步問我父親，他所說的「顯然的不同」究竟是什麼意思？

父親，開始敍述到英法兩國金融家之間的以往的關係，說他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祇顧一已生命延續的財團組合，而以榨取殖民地的財富爲目的，最後他又說到法屬摩洛哥可能有很大的藏油量。

蘇丹很熱心地抓住這個題目；聲明他是絕對贊成任何這些富源的開發，並且保留那方面的收入；接着他又很憂愁地搖了搖頭，悲嘆他的國內缺乏有訓練的科學家與工程師，缺乏那些可以毋須外來的幫助而能自己開發這些資源的技術人員。

邱吉爾非常不安地在他的椅子上移動着。

父親很溫和地提議摩洛哥可以派遣人士到國外，譬如說，美國的有名的大學去受教育，訓練成工程師或是科學家。

蘇丹點了點頭。假如不是禮貌所限止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會當場拿出紙筆，來記下這些大學的名稱與地址的。

父親繼續發表他關於這一點的意見，手裏玩弄着他面前的玻璃杯。他說蘇丹很可以和幾家美國的大

公司訂立合同，委託他們來實行他所談到的開發計劃，祇要送給這些訂約的公司以一筆酬勞或是以百分比來分配利益。這一種方式，他說，對摩洛哥有很大的利益，可以使法屬摩洛哥的自主的政府保留它自己的富源的大部份的管理與支配權，獲得從這些富源產生的任何收入的大部份，並且，在最後，還可以把它們收回來，完全自己管理。

邱吉爾鼻子裏哼了一聲，假裝做沒聽見。

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晚餐會，全體賓主——有一個人除外——可以說是盡歡而散。當我們吃完了，全體站起來的時候，蘇丹向我父親保證他在戰爭終結以後，將立刻請求美國政府來幫助開發他的國家。他滿臉紅光，快樂地叫道：「我的國家有了一個新的未來！」

皺緊了眉頭，咬住根大雪茄，那位英國的總理大臣跟在蘇丹的後面走出了飯廳。

戴高樂在那一天的到達好像是夏天的閃電一樣的突然，可是却澄清了那鬱結的空氣。蘇丹在飯後顯然地還想多坐一會兒，以便更詳盡地討論我父親在餐桌上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可是我父親當晚的工作使他無法留他多坐。父親向麥克利上尉做了個手勢，叫他留下來做紀錄，又對墨非和霍浦金斯做了同樣的手勢，最後叫我也留下，以便有什麼特別的使喚——而其他的人則都起身告辭。於是，什麼都準備好了，祇待戴高樂的登場。

他是在人們走了以後十分鐘來的。進門的時候，頭高高地舉着，滿臉是陰沉的氣色，樣子十分難

看。他和父親談了近三十分鐘，父親的態度非常客氣，戴高樂則始終是那麼冷淡而曖昧。下面是一段他們典型的談話：

父親：「我確信我們能夠幫助你的偉大的國家走上復興的大道。」

戴高樂：（嘴裏哼了一聲，一言不發。）

父親：「同時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國家能參加這一件偉大的工作實在感到萬分榮幸。」

戴高樂：（咕噥了一聲）「你太客氣了。」

那一段苦澀無味的談話終算告了一個段落，橱硬地坐在椅子上的那個法國人筆直地站了起來，好像開正步似地向門口走去，頭也不回。

幾分鐘以後，邱吉爾又來了，他的後面跟着麥克美倫。他們又化了一小時互相報告並且討論各人和戴高樂談話的經過。戴高樂對我父親的那種傲慢而陰沉的態度並沒有使我父親感到氣惱；我想他早就猜想到戴高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墨非先說話，接着是邱吉爾，接着是霍浦金斯，接着我聽到我父親的聲音，接着又輪到邱吉爾。我自己則在想：現在在法國的那些人民怎麼樣？那些在抵抗德國的法國人民又怎麼樣？他們擁護那一個？戴高樂？還是吉倫？擁護他們之中的一個？還是兩個都擁護？怎麼樣可以試驗得出來呢？誰是對的？

最後，我聽到我父親的安靜的聲浪：「過去的已經過去，沒法子再挽回。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個個人：他們將以同等的地位，同等的責任來建立起法國的臨時議會。在這一步辦到

以後，法國的民主政權已經走上了再生的道路。當臨時議會開始執行它的任務的時候，法國的民主就向前跨出了它的第一步。不久，法國的民主政權就可以自己來決定戴高樂的命運和吉倫的命運。這將不再是我們的事情了。」

邱吉爾和其他的人們走了以後，父親在他的臥室內和我談起法國和法國的前途。

「前幾天我們已經談到，」他說，「怎麼樣將法國的行政權逐步地交給一個戴高樂與吉倫的聯合政府，在法國解放的過程中由他們來担任這一方面的責任。這過渡時期的行政權一直延續到法國可以舉行自由普選的時候爲止。這看來似乎是一個唯一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可是戴高樂一定還是要作對的！

「他認爲他自己必須是唯一的獨裁者來判斷誰應該參加，誰不應該參加任何的法國臨時政府。這一個觀念在他的腦中已經是絕對地固定的了。」

「他不是還說到法國的殖民地嗎？」我補充地說。「我從廚房裏走進來的時候聽到……」

「一點也不錯。他很明確地說他希望盟國在法國獲得解放以後立刻將法國全部的殖民地交還給法國管理。你知道，盟國必須在北非這兒的法國殖民地內維持軍政管理，這時期可能是幾個月，也可能是幾年；這先不去說它，我現在還絕對不敢斷定我們之將殖民地歸還給法國是正當的；至少我們必須先得到法國的保證，聲明它對於每一個殖民地的關於行政設施的確定的計劃。」

「嗨，你聽我說，爸。這一點我不明白。我知道殖民地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論怎樣，這些殖民地終究是屬於法國的。……我們又怎麼能不還給法國呢？」

他對我看了一眼。「它們怎麼會是屬於法國的？爲什麼摩洛哥，住民全是摩洛哥人，反而是屬於法國的？再拿安南來說。日本人現在在統治那個殖民地。爲什麼日本人那麼容易地就征服了那塊土地？安南的土人在法國人的統治之下是那麼樣地被踐踏，被虐待，以致他們都認爲誰來都可以，總比生活在法國的殖民地統治之下要好得多。爲什麼這些土地會是屬於法國的？有什麼邏輯？有什麼習慣？有什麼歷史的法則能做根據？」

「是的，可是……」

「我是在講另一個戰爭，伊利奧，」父親叫道，他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我是在講假如在這次戰爭以後，我們再允許千百萬人民重又回到舊日的半奴隸狀態中去，這世界又將變成個什麼樣子！」

「我們是應該有權利來說話的。是我們使法國獲得自由解放的。」我提出了這一點。

「伊利奧，你該知道，假如不是爲了法國，英國以及荷蘭的那種近視的貪婪，我們美國人是絕不會今夜死在太平洋之中的。我們是不是應該讓他們這些國家再像從前那樣地胡作妄爲呢？再過十五年或是二十年，你的兒子該又到達當兵的年齡了。」

「聯合國的組織成立以後，他們可以來接收這些殖民地。在委託管理的制度下保管一定的年份。」

「我再說一句話，伊利奧。說完了我就得請你滾蛋。我疲倦了。這句話就是：『在我們獲得了勝利以後，我將要盡我全部的力量使我們美國不致於重蹈故轍，接受任何足以伸長法國帝國主義野心的計劃，或是任何足以教唆英國施展其帝國主義野心的方案。』」

他指了指門傍的電燈開關，沒留神把他的大姆指在門邊上碰痛了。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父親第二天起身得比較遲，在他沒起床的時候，由霍浦金斯接待許多來看他的人物。安諾德將軍先來，哈立曼也跟着到來，最後到的是巴頓將軍。我並沒有什麼事可做，於是我在我們的那位不相識的法國女主人的圖書室內消磨了一個多小時。這位女主人的讀書的嗜好偏重在輕鬆的小說——諸似戈萊脫的作品等等——可是最後我終於發現了一本使我注目的書。那是一本紙封面的平裝本；我把它從書架上拿下來，挾着它走進我父親的臥室，他剛吃完了他的一頓很遲的早餐。

「看過這本書沒有？」我問，把那本書擲在他的懷裏。

那是安得萊．莫理斯爲他寫的一本傳記。他非常歡喜地翻閱了一下。

「給我支筆，伊利奧。那兒……在那只梳粧台上。」

於是他用他非常華麗的法文語體在那本書上簽了個字，寫上一段紀念詞贈給那位女主人，對於我們之得以在她的別墅內過了很多愉快的時間表示謝意。在寫這一段紀念詞的時候，我父親使用了一切他所能想得到的最得體的，最花巧的法文詞藻。

「現在給我把這本書放回原處，伊利奧。不過我敢打賭她是決不會再把這本書抽出來看的。眞是太壞了；我倒眞想看看假如她再翻到這本書的時候她臉上的表情。」

「我倒想看看書店老闆的臉上的表情，假如他將來無意中居然收買到這本書的時候。」

「別胡思亂想了，」他大聲地笑了起來。於是我把那本書放回到原先的書架中。

那天一起吃午飯的祇有霍浦金斯，邱吉爾，我父親和我。「無條件投降」這個名詞就是在那天的午餐桌上產生的。不論那名詞有沒有什麼獨特的價值，那可以說是我父親先創造出來的名詞，霍浦金斯聽了立刻就十分喜歡它；邱吉爾一面慢慢地嚼着他嘴裏的東西，想了一下，皺了皺眉頭，又想了一下，最後臉上泛出微笑，終於說話了。「眞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名詞！而我現在可以看得到戈培爾和他的黨羽們聽到這個名詞後將怎麼樣地狂叫起來！」

事實上「戈培爾和他的黨羽們」這兩三天來已經開始在不安地叫了；我們的食堂隔壁的那一間小廚房是我們的密探們時常坐着閑談的地方，那裏安置着一架短波無線電；我們時常在那裏聽他們的英語廣播：他們在惱怒地猜測究竟有什麼大事在卡薩布蘭伽進行，而他們已經一步步地接近了事實的眞相。

父親，在他的新名詞被傍人贊同了以後，就開始思索它在其他方面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當然囉，這正是蘇聯所希望的。這對他們是再好沒有了。無條件投降，」他又重複了一遍，舌頭舐吸着他的牙齒。「說不定史大林自己早就想到了這個名詞。」

霍浦金斯說：「一吃完飯，我們得即刻爲那個聯合公報做一份草稿。」

「新聞記者們明天就到，」父親說。

「我知道的。五點半鐘雙方參謀長們來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它準備好。」

那天下午，羅非與麥克美倫來了兩次，坐的時間很短，好像頗有些神經質地。父親決定在第二天同時召見戴高樂與吉倫。快近傍晚的時候，雙方的參謀長們都到了，他們陪着父親和邱吉爾剛着食堂中的那張大餐桌坐着。那是最後一次的大規模會議；雙方之間的最細微的衝突都已經被解決；發動 HUSKY 作戰的日子也都初步地確定了；邱吉爾聲明他希望能够不直接攻入意大利，以便繞巴爾幹半島大規模地侵入歐洲；很遺憾地，一九四三年橫渡英法海峽的 ROUNDUP 這個作戰計劃不得不被擱在一邊，以便將來實行一九四四年的另一個計劃 OVERLORD；雙方又擬定了一部詳細的計劃，預備在西西里的戰事一結束後，即刻將部隊及物資撤退至英國集中（而北非戰事也將加以結束）。這次會議到八點鐘左右才散會，每個人都對會議的成果感到滿意和歡喜。

聯合公報的第一道草稿在大家面前宣讀了一次，有的部份需要改動，而其他的部份當須另行起草。卡薩布蘭伽會議已經接近結束的階段。人們都預備開始收拾行李，回到各自的防地。

晚飯時並沒有什麼客人；祇有霍浦金斯，他的兒子鮑勃（他一兩三天之前滿身污髒，頭髮散亂地從最前綫他的戰鬥攝影部隊飛來的），父親和我四個人。晚飯時談的都是些正經的公事。

晚飯以後，直到夜深，父親，邱吉爾和霍浦金斯一起草擬那個行將發表的聯合公報的最後文稿，以及給史大林的電文稿。羅非和麥克美倫也來坐了一會兒，提供了一些意見，補充那個聯合公報中關於法國政局的一部份。他們在鐘打過兩點的時候退出；兩點半的時候邱吉爾舉起他的不離手的酒杯。

「無條件投降。」語氣中並無驚嘆號，祇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大家都乾杯。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吉倫將軍來了，父親立刻就和他開始工作。

「將軍，你必須向我們保證你願意和戴高樂在一起……」

「戴高樂這傢伙！他是個利己主義者。」

「讓我告訴你，我對於你的某一方面的疑懼很有同感，而也就因爲如此，我才勸你……」

「他是一個沒多大用的將軍。我所需要的祇是軍隊的給養與援助，我可以召集起……」

「……必須和他一起合作，爲你們的國家共同草定一個組織過渡時期的臨時政府的計劃。像你們這兩位人物，將軍……」

三十分鐘以後。終於：

「我懂得了，總統先生。我懂得了。」

他們還在談話的時候，戴高樂來了，站在外面客廳裏。焦躁而氣惱地等着。他與吉倫兩個人在門口擦肩而過。戴高樂走了進去。

路已經鋪平了，可是重要的主角却需再三的催促才肯登台。戴高樂活像是故事中的女孩子，倔强地不肯輕易就範。父親一步步地進迫，由利誘的請求而轉爲誠懇的勸導，由催促而終於採用直接的命令。在他採用了最後的這一個步驟的時候，他向我點了點頭；我輕輕地走出門外，向吉倫做了個手勢，和他

一起走回到房中。

兩位將軍死板地面對面瞧着。使他們言歸於好，父親叫他們倆人握手，來肯定他們各人在我父親面前所應承的聯盟的誓言。像兩條狗，這兩位法國人差不多開始互相兜撲了起來，而終於交換了一次短短的，甚爲勉强的握手。邱吉爾在這時候走了進來。父親滿臉都是笑容。他並沒有說：「告訴這個人……講呀，告訴他你在我面前怎麼說的，」可是這些話却全在他表情中流露出來了。

「我們倆人已經同意，」戴高樂簡短地對邱吉爾說，「我們已經同意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來草定一部圓滿的計劃」——他停頓了一下——「一起行動。」

吉倫點了點頭，表示肯定。

「來呀，」父親叫道。「拍照！」於是他們四個人都到後面院子裏去攝影。當攝影機的開關「喀嚓」響了一聲，而活動的鏡頭轉過來對着他們的時候，這兩位將軍又握了一次手。父親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早就聚在外面等待着的記者們與攝影記者們在剛打過十二點的時候被請到草地上，圍着父親和邱吉爾坐下。父親和邱吉爾並排地坐着，談說會議的經過情形。在强烈的陽光下，祇有父親眼睛下面的凹進的眼圈，他的黑領帶與他袖子上的黑紗（那時候他還帶着祖媽的孝）是沒有色彩的。邱吉爾的銅盆帽很威風地頂在他的頭上，他的雪茄從右邊轉到左邊，一下子又從左邊轉到右邊；他滿臉都是歡樂的神情。

「無條件投降」：記者們飛快地用鉛筆在紙上記了下來。

這一次的記者會議並不很長；在結束的時候，父親和邱吉爾輪流和每個人握手。「你們這一小堆人大概可以說是記者的精華了，」父親喃喃地說。「在白宮中的每次記者例會中，出席記者之多是使我無法和他們一個個握手的。」

我陪着他回到屋裏，向他告辭，因爲在幾分鐘之內我就要出發回到我的部隊裏去。

「怎麼樣？」

「怎麼樣？」

「OK，爸，……現在什麼都OK了！」

「是的……我們完成了不少的事。相當值得的。」

「我想這一次暫時的生活與工作的變換對你一定有很大的好處的。」

「伊利奧，我還想和你交換一個印象。祇有一件事我很想要弄明白。」

「什麼事？」

「我很迫切地想知道……」他突然停止不說，想了一會，又開始了。「你知道，多少世紀以來，英國人始終在歷史上反覆着同一的勾當。他們總是非常聰明地，非常正確地選擇他們的同盟國。他們經歷過很多次的戰爭，可是在他們所參加的每一次戰爭中，他們都有辦法勝利地爬了起來，繼續以他們同一的反動的手掌把握住世界的人民與世界的市場。」

「是的……」

「這一次，我們是英國的同盟國。我相信我們是應該做它的同盟國的。可是……最初在沃根基，其後在華盛頓，現在在卡薩布蘭伽……我極力地想使邱吉爾——和其他的人們——明白我們雖然是他們的同盟國，預備和他們並肩走向勝利，可是他們絕對不能再以爲我們之與他們聯盟是單單地爲了要幫助他們堅持他們的古老的，中世紀的帝國觀念。」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遲慢地說。「我想他們也該明白這一點。」

「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他們能夠覺悟到他們並不是這個同盟的主宰；他們應該明白在勝利以後，我們決不會坐在一邊，袖手傍觀他們的反動的制度壓制住亞洲每一個國家以及歐洲半數的國家的成長與發展……」

「英國已經在大西洋憲章上簽了字。我希望他們能夠覺悟到美國政府是確實地要他們履行這部憲章上所規定的任務的。」

霍浦金斯從門口探進他的頭來。「諾戈斯在這兒，他是來送行的。還有密乞里也在。」

「密乞里？」

「法國北非艦隊的總司令。」

「噢，對了。我馬上就出來……現在，孩子？」

「再會，爸！」

「再會。」

「代我向母親問好，帶我的吻給他，希望你保重你的身體。」

「……別忘記你自己也得多多珍重你的身體。你才是容易受傷的一個。」

二十分鐘以後，在一隊汽車行列的護送之下，他出發了。我也接着出發向阿爾及爾，回到戰爭的懷抱中。

五 卡薩布蘭伽到開羅

史大林格勒的消息對於我們在阿爾及爾的人們是一貼最好沒有的興奮劑。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我的部隊的工作也實在够繁重的了，因此我們也的確很需要這些時時刻刻傳來的興奮劑。我們當時的工作是提供給「戰術」空軍隊以空襲意大利時所需要的一切情報，另一方面則爲「戰略」空軍隊監視納粹部隊的行動以及爲我們的非洲地上部隊作空中掩護，好像這些工作還不够多似地，我們後來又担任起 HUSKY（侵入西西里）作戰中的空中攝影偵察的任務。關於空中攝影，我得在這裏加添一點小小的說明：從空中測畫地上的目標，飛機必須保持直線飛行與一定的高度，使你拍攝的照片能够有統一的大小比例的標準；執行這種任務時所架駛的飛機是赤裸裸地沒有任何自衛的武器裝備的；而飛行員也無法像普通飛行似地作迂迴式的躲避飛行的；總括起來說，這種攝影偵察飛行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的飛機喪失率是每月百分之二十。在我們到達北非後的九十天之內，我的部隊中最初的九十四個飛機駕駛員祇剩下了十個都不到。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作戰，我的處境十分艱難，而我的工作也差不多像牛馬推磨似地忙個不停，通過整個的春天一直到初夏，我都不曾有輕鬆的日子。有一兩次我曾經被邀請到總司令部去和艾森豪威爾以

及他的陸海軍侍從武官，德克斯、李和哈萊、勃乞打橋牌。（輪到我和艾森豪威爾合夥的時候，我總是贏的；否則，我祇有聽憑我的運氣了。）

最後的那一次橋牌會正是我們開始攻擊西西里的前幾天。那天晚上我覺得特別高興，因爲我的部隊在佔領潘脫萊利亞島的要塞時的輝煌的表現——這一個要塞島完全是由空軍佔領的。由於那次意外的成就而感到得意，我未免有些「來吧，你們這些納粹們——來多少我們幹掉你多少」的那種神氣。艾森豪威爾將軍以那種穩定的，估計的眼光對我看了一眼。

「潘脫萊利亞，是不是？」

「這是歷史中第一次地上部隊向空軍全體投降，」我驕傲地說。「現在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進入歐洲的任何一個地方了。」

「當我們進入歐洲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將軍很清醒地說，「我們必須有如此優勢的物資與火力使誰都沒辦法能來阻擋我們的進路。並且，」他又添了一句，「在我們還沒有這種準備以前，我們決不進入歐洲。唯一的問題是，」他突然帶着沉思的神情說，「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也許還會被阻擋住的。」

大家都沉默了，想起法國的海岸，多少人被殺死，多少飛機被擊落，多少船舶被打沉。

「歐洲還遠得很，離開我們不知有多少哩，多少月，」艾森豪威爾說，他好像是在大聲地說出他的思想。「我們應該一步步地做，而目前西西里是我們第一個目標。」

我知道艾森豪威爾曾經主張在一九四二年開闢一個第二戰場，可是他的計劃却被英國方面所否決了。我知道他與我們的聯合參謀總部同意在一九四三年必須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雖然英國方面是可以更容易地再度勸止我們，因爲我們大部份的軍力已經放到地中海戰區去了。現在，在一九四三年的初夏聽到他的這個清醒而謙遜的估計，我對於他，我們的參軍總司令，有了更高的敬意——由於他對他部下人員的關切與愛護，他之堅持以最大限的美國生產品撥給我們的軍隊。我可以猜得到即使是在一九四四年，當我已經確信侵入西歐的戰爭一定要發動了，艾森豪威爾將軍——雖然已經捧獻出整個的心靈——還是以最謙順，最小心的態度來處理這一件偉大的任務的。

不久 HUSKY 這個作戰便正式發動了；而我們的部隊所圓滿完成的初步工作使我們都感到十分高興。七月的下旬，當我們的部隊正在西西里肅清殘餘的最後一批納粹的時候，我的高級司令官接到陸軍部的一道命令，叫我即刻回到美國，協商整頓偵察作戰中的許多問題。同時，太平洋戰區也派了個卡爾·波立夫加上校去，他在那兒一向做着與我同樣性質的工作。這個命令將使我在華盛頓停留兩個月——八月和九月；我一方面因爲要離開我的部隊，覺得十分遺憾；另一方面則很想看看我的父親和母親，以及其他沒有派在海外工作的家屬。

我在潘太剛的工作是必須我專心一意地去做的，並且與我們的未來的偵察作戰有十分重大的關係，可是很幸運地，這工作並沒有阻礙了我時常與我父親見面談話的機會。

他的健康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好；與六個月以前卡薩布蘭伽的時候相比，他已經顯得老多了，那

一年夏天，他的靜脈竇的病又重發了；可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好。他對於戰爭的軍事前途流露出非常沉着的自信。我去看他的時候，多半是在早晨他吃完早餐以後，九十點鐘的時候，或是在晚上十一點鐘左右，當他的最後一位訪客已經離去的時候。在他的心目中，戰爭的策略已經發展到一個他可以看到最後勝利的階段，而他甚至可以斷定那個勝利的日期。九月中的某一晚，他提到那個日期。

「歐洲的戰事可以在一九四四年的年底結束。」

我吹了聲口哨。

「瞧紅軍在中部，猛烈的攻勢……」

「一九四四年的年底!?」

「當然毫無問題，假如我們對法國的攻擊能够有力而迅速。」

「法國？」我狡猾地問。

他的神色絲毫沒有變動。「我不知道。攻擊法國應該是相當合乎邏輯的。也很容易地可能是歐洲的下部。或是德國。或是挪威。我不知道。」他臉上充沛着率直的神情。

「日本呢？這種從一個島打倒另一個島的戰術——是相當費時間的……恐怕要到一九四六年的年底才打得完罷？」

「不會的。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結束了。最遲是一九四六年的年初。你想一想，當希特勒被打倒了以後，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對付日本——全部的力量，我說——他們還能受得了嗎？」

「那麼英國呢？蘇聯呢？他們會不會繼續協助我們？或者祇是蹲在一傍，想舐癒它們自己的創口呢？」

「你知道我們在卡薩布蘭伽的聲明。邱吉爾完全同意這個聲明，而後來史大林也表示同意的。」

「據我所知道的，英國人在打敗希特勒以後，將不再對戰爭發生興趣，他們已經厭倦了戰爭。而我們又是否能信任蘇聯呢？」

「我們現在是信任蘇聯的，是不是？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明天不信任它呢？總之——我希望在最近能够親自見到史大林。」

「什麼？眞的嗎？」

他點了點頭。「在目前，我們還是在談判中。他要我們到他的國土中去和他會面。他還是很小心地向我們說明他是在親自指揮着紅軍作戰。而我必須說句公平話，祇要紅軍能像目前這樣地繼續向前推進，傍人是很難能够作任何足以延遲他們行動的提議的。」

「我猜想他也或許有些怕罷。」

「怕？怕什麼？」

「怕你和邱吉爾倆人會做個圈套，把他套住。諸如此類的玩意兒。」

父親笑了一下。「我懷疑他的人民對我與邱吉爾的所謂『友好』關係是知道得相當詳細的，」他頗爲神秘地說。

不多幾天以後，父親和一批顧問們坐火車出發向北，到魁北克去會見邱吉爾和英美雙方的參謀長們，舉行又一次的軍事會議。這個會議的暗號叫 QUADRANT。我因爲工作上的關係，無法以任何資格去參加。在八月中，我離開華盛頓到加利福尼亞去了三四次，參觀各地的飛機工廠以及墨洛克乾湖的飛機場，研究空軍偵察部門中的各項特殊性的問題。父親在沒出發以前就曾經和我談起過這次會議，因此雖不詳盡，我却多少知道一些這次會議中的議事內容。在八月下旬，父親從魁北克回來的時候，我就問起他會議中「大辯論」的經過。

他說：「辯論的階段看來好像是已經快結束了。英國方面完成了一部橫渡海峽的作戰計劃——聽馬歇爾講起這個計劃，似乎問題還多得很——可是至少這部計劃是完成了的。並且，它已經被雙方所贊同。」他頗爲憂鬱地微笑了一下。「邱吉爾堅持着要我們贊同這部計劃——至少要我們『在原則上』贊同。這樣，他們可以留一個後退的餘地。」

我當時說了幾句話，意思是祇要他能設法和史大林也會面一次，那麼他祇少可以有一個人能幫他向英國方面說明開闢西戰場之迫切的需要。

一個多星期以後，這個問題。又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被談論到。父親向我表示雖然他對於戰爭中的軍事方面有絕大的把握，可是政治方面却依然還有很多值得顧慮的問題。關於和平機構的方案在他的腦中

已經更進一步地具體化了，爲了要商榷這個方案起見，他更迫切地想會晤其他的世界領導者們。

「所謂『聯合國』……它們還沒有完全到達這一個階段，可是它們是在朝這一個方向走，而我們可以推動它們走得更快一點，更遠一點的。在目前……！」

「怎麼啦？我覺得目前的情形並不壞呀……至少我們是在同一的方向之下並肩合作呀。」

他把桌上的一堆文件推向一邊（我們是在他的書房內，白宮的三樓；時間已經快近午夜）開始用筆在拍紙本上胡亂地劃着。「問題是，」他說，「我們事實上並沒有在同一的方向之下前進，除開表面的行動而外。拿蔣介石來講。他固然有他的許多困難，可是他憑什麼理由叫他的軍隊不打日本人。

「戰爭的政治性是實在太濃厚了。在一個國家還沒有走上眞正的絕路以前，它總是採取一種結局對它的政治大爲有利的方式來推行戰爭，而不願儘量迅速地來結束戰爭的。」

「你是在說誰，爸？中國？還是英國？」

他點了點頭。「就是我們與英國的聯盟，」他繼續說，「也有一種容易使中國與蘇聯誤會我們是在國際政治上完全支持英國方針的危險性。……」他集中精神在紙上劃寫着：它寫的是一個很花巧的「4」字。「美國將必須領導，」他說，「領導……並且以我們中間人的立場去調解和幫助解決其他國家之間的不和與爭論；幫助解決中英，中蘇在遠東方面的爭端。我們有力量可以辦到這一點，」他繼續說，「因爲我們現在是個強大而自足的國家。英國是在走向衰落的道路，中國則依然停留在十八世紀之中。蘇聯——懷疑我們，並且也使我們懷疑它。美國是在世界亂局中足以建立和平的唯一的強國。

「這是一個巨大而艱辛的責任。而使我們能够圓滿地達成這一個責任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先和這些巨頭們面對面地談一下。」

「這一方面的進行有什麼結果沒有？收到史大林的回信嗎？」

「史大林有回信來。他說祇要我和邱吉爾能够到莫斯科去，他總是歡迎的。」

那時是九月中間，四巨頭會議的希望還是和正月中一樣地渺茫。

當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父親的時候，我得設法引他說話。那時他剛吃完早飯；還在床上沒有起身；窗外正下着九月的雨，又寒冷，又潮濕；而他的精神也就不如往常那麼好。最初他儘量叫我說話，詢問我關於我的工作情形，似乎對它很感興趣似地。他想知道夜間偵察的情況：在西西里的作戰中，那些最初的，實驗性的夜間偵察飛行完全是我個人所担任的，因此我告訴他我們所發明的偵察網粹夜間部隊行動的新方法；我告訴他我們怎麼樣使用新式的照明炸彈，以三十秒鐘的間隔向地面投下，這些炸彈在飛機與地面之間三分之二的地方爆炸，照耀的面積達一平方英里，使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拍攝敵人移動的照片。最後，我很巧妙地把這個談話的題目逐漸轉移，說我希望戰爭中的軍事行動可以很快地結束，接着就問他戰爭中的政治前線最近有什麼好的進展。

「我前幾次和你談起的會議大概可以有希望實現了，伊利奧，」他說。「我們已經大致決定把這個會議分兩次舉行，先和蔣介石會晤，然後再與史大林。這兩個人不能見面，因爲在史大林的西伯利亞國

境上正集結着日本的大軍，頗有隨時準備行動的樣子——而在另一方面，蘇聯還始終沒有對日本宣過戰。」

我問他目前是否有辦法在一個中間地帶會見史大林。

「我相信並不是不可能的。假如這個會議成爲事實……」

「那麼？」

「那麼，這會議的地點大概不會離你的防地太遠的。」

這就是我所最最希望知道的。假如父親的話成爲事實，那麼我或許又能得到一個機會被派做我父親的貼身侍從。在這樣一個興奮的消息鼓舞之下，我在九月底回到前方，向我父親說「再會」的時候也就並不覺得怎麼難受，因爲我希望在幾個月以內，能够在地中海一帶又見到他。

回到我的防地以後，我們立刻計劃把我們的司令部從突尼斯附近的拉馬薩村向前推進至意大利脚部的最南端。在十一月中，我們已經在聖塞凡羅建立起我們的基地，一方面排除敵人頑强的防衛，另一方面則咒咀着那難得給我們一個從空中攻擊敵人的機會的壞天氣。意大利之被迫退出戰爭與整個夏天與秋天間納粹在俄國大草原上所受的打擊使敵人的士氣大爲衰落，可是在另一面，盟軍的士氣却也並不見得怎樣高揚，因爲在意大利我們的機械化部隊的推進已經逐漸地停滯下來，而我們的地面部隊則隨時隨地都有被納粹散佈在整個意大利山道中的八十八式鋼砲正面射擊的威脅。

十一月裏溫度突然降低，而天氣也變得很壞。所謂「陽光的意大利」這句名言已經變成了我們誰都

不願意聽的大笑話。而我開始想到父親和我談起的三巨頭或是四巨頭會議，不知道他的這個希望怎麼樣了。而就在這個時期中，我突然從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史密斯將軍接到一道祕密命令。我必須立刻出發到阿蘭去會見一個「重要人物」。那一定是我期待中的會議變成事實了。

十一月十九日的下午，我飛過地中海，到達阿蘭，即刻坐着汽車被送到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臨時司令部。在那兒我看到我的弟弟小佛蘭克林，他是暫時離開他的驅逐艦請事假來的；我差不多有一年沒見他了。這一次父親並沒有坐飛機，他是坐那條最新型的大戰艦伊奧瓦號來的；當我在阿蘭與小佛蘭克林舒適地對飲一杯威士忌酒的時候，我想他的戰艦大概正航過直布羅陀的岩岸。

當時還有很多的重要將領在我們的週圍：除了艾森豪威爾將軍，還有英國的海軍上將柯銀漢，我們的海軍中將海威脫，以及雙方的大型陸軍準將與海軍上校們——此外還有我們的老朋友，善良的邁克，他是在這次旅行中比大總統先一步出發到達，以便能警戒和保護大總統的安全的。我相信他即使對他自己的祖母也會帶着些懷疑的眼光來打量一番的；他永遠是那麼赤胆忠心地執行他保護大總統安全這一件重要的職務。

星期六的早上我們都起身得很早。那是一個明朗晴麗的早晨，在細雨迷濛的星期五之後，能够有這樣的好天氣，我們大家都覺得有一種感激的心情。八點半的時候我們已經站在阿蘭的海軍基地，美薩爾凱維的船塢上；從我們的望遠鏡中，我們看到有人從伊奧瓦的大船被降落到船傍的小汽艇中。

二十分鐘以後，我們看到了我父親。他向我們揮手，大聲地喊了一聲「哈囉」，健康而染着海洋色

的臉上泛起了微笑。「羅斯福天氣！」他叫道。

我們接着都坐進了艾森豪威爾的汽車——父親，艾森豪威爾將軍，小佛蘭克林和我四個人——向五十英哩外的拉西尼亞機場出發，一路上全是迂迴曲折的險峻的山路。這一次海航對我父親的健康很有益處；他的氣色很好；而他很興奮地期待會議的日子趕快到來。先到開羅，他對我們說，然後再到德黑蘭。與蔣會晤之後，他再和史大林會面。他一肚子都是計劃。

「戰爭——以及和平，」他說，他的聲調中帶着感激的情緒。「你能不能等一等，艾森豪威爾？」

「您請便，總統先生。」

於是佛蘭克林和我爭着問起他我們家中的情形，關於母親以及安娜（羅斯福總統之女——譯者註）的消息。他告訴我們，他隨身又帶了好些國內的報紙；晚上有時間的話，我們又可以在一起翻閱一陣了。他的隨員中有很多是舊時的熟人，可是也有些新人：除了霍浦金斯之外，華生將軍，勃朗海軍少將，麥金泰海軍中將，李海海軍上將也都來參加這次會議。除了偶而談到幾句我們一路上所見的風景以及家中的情形，父親祇顧談着行將到來的會議的日子，而無心作其他的談話。在不知不覺之間，我們似乎很快地就到了拉西尼亞；父親立刻坐上了他C-54式的飛機，奧梯斯·勃拉恩少校這一次又是他的駕駛員；小佛蘭克林，霍浦金斯，和其他的將領們與他同機；他們毫不躭擱地立時起飛向突尼斯。

我自己另外有飛機停在拉西尼亞機場，是一架B-25式的夜間攝影偵察機；我的一個中隊指揮官，里昂·格萊少校陪我同飛。發動的時候，有一只引擎似乎發生了故障，轉動得不甚靈活，這可使我們着

急了好幾分鐘，可是最後，在那架總統的飛機起飛了三十分鐘以後，我們終算無事地在空中了；我們開足了引擎追上前去，最後比他們先到達埃爾亞依納。

艾森豪威爾將軍，小佛蘭克林，和我從那兒又陪着父親坐汽車出發，向在卡太基爲他準備好的別墅去（又是一次巧合：這個別墅的名稱也叫「白宮」）。我們的汽車在路上要經過卡太基的古代競技場的廢墟；父親以前從沒有到過這兒；因之我們不得不在中途停車，領他觀光一番這古代的廢墟。

父親的別墅就在突尼斯灣的海岸上，地點與建築都十分優美，父親在裏面覺得十分寬適。當我們通過卡太基的時候，我就想到我的部隊的後方司令部就在附近的拉馬薩，我部隊中差不多半數的人員就以那個地方爲基地。這實在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我決不能輕易放過。

「你肯不肯，爸？」

「幹什麼？」

「去檢閱我在拉馬薩的部隊？」

「當然可以！什麼時候去？可以不可以在下午遲一點去？五點鐘行不行？」

我大聲地笑了起來。「我倒希望我能在五點鐘之前把一切都準備好。我試一試看。」於是我急急忙忙地趕到我的司令部去，把人員臨時召集起來，預備檢閱。那個時候，我指揮着西北菲攝影偵察混合縱隊，全體有六千盟軍，——其中二千八百人駐在這兒，其餘的則都在意大利。里昂・格萊，佛蘭克鄧（我的副指揮）與我匆匆忙忙地儘量把一切整頓得有條有理，而父親則正在卡太基批閱一批剛從華盛頓

送到的文件。

五點半的時候，我的部隊整齊地排起隊形，全體看來是相當威風，這我自己也得承認。父親坐在一輛吉普車上檢閱全軍。

「看到那些制服沒有，爸？我們這兒倒可以開聯合國大會了。」

「美國兵，這我當然認得。法國兵，英國兵，加拿大兵……穿那種制服的是什麼地方的部隊？」

「南菲部隊。此外還有新西蘭與澳洲的部隊。」

「倒眞是一個相當不差的隊伍，伊利奧。你該覺得很光榮。」

「別爲我担心。我是覺得十分光榮的。」

晚餐可以說是一個讌會。點綴當晚餐桌的有蘇末斯貝，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司機，和南茜·蓋基，海軍上將蓋基的女兒，她那時在北菲担任紅十字會的工作。父親想第二天一早就離開突尼斯，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馬上就表示反對。

「星期日晚上夜間飛行要比較好得多，總統先生。星期一早上就可以到達開羅。」

「夜間飛行？爲什麼？我特別想在飛行途中看一看從埃爾阿拉美起的戰爭所經的路線。」

「白晝飛行太冒險了，總統先生。我們不希望一路上都派戰鬥機保護；這等於是自找麻煩。除此而外，夜間飛行還可以平穩得多。」

「可是……。」

「夜間飛行是SOP，總統先生。」

「SOP就是作戰上必要的步驟，爸，」我向他解釋。

「謝謝你，」父親很週密地說，「有一些軍隊的俗語我做大元帥的也多少知道一點。」接着，他回過頭去對艾森豪威爾說，「好吧。現在你是我的上司。我祇好聽你的話。可是你另外得答允我一件事作爲補償的條件。」

「什麼事，總統先生？」

「假如你要我在卡太基消磨一整個的星期日，那麼你必須親自帶我去觀察一下卡太基的戰場——古代的以及近代的戰場。」

「這簡直是在討價還價，總統先生。」

我在拉馬薩的工作使我第二天無法陪我父親去參觀那些古今戰場，可是小佛蘭克林却陪艾森豪威爾將軍與我父親去了，他坐在他們前面，司機傍的坐位上；那天晚上回來，他告訴我白天的經歷。父親很嚴密地把艾森豪威爾將軍考驗了一下，他不僅問起他盟軍在梅傑士埃爾巴布以及推勃巴的突破戰，並且還考問他古代卡太基人所發動的幾次戰爭。艾森豪威爾關於古今每一次戰役的詳盡與豐富的智識使我父親感到十二萬分的滿意：這正表示艾森豪威爾像我父親一樣，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並且有極强的求知慾。小佛蘭克林告訴我他們回到別墅門口的時候，父親滿面都是笑容。當艾森豪威爾正要下車的時候，父親伸出手來把他拉住。

「你知道，艾森豪威爾——我怕我或許要做一件你所不喜歡的事。」

小佛蘭克林尖起了他的耳朵。究竟是什麼事？罷免他這個戰區的指揮權？還是一句反面的話——當場晉升他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地位？

「我知道你是十二萬分看重哈萊·勃乞的，」父親說。艾森豪威爾點了點頭。「雖然他差不多是你的左右手，可是我恐怕不得不把他從你那兒調走。」

艾森豪威爾的臉上泛起了一絲淺淺的陰影。「那麼，總統先生……」

「事情是這樣的，埃爾麥，戴維斯又提出了辭呈。假如我調勃乞去做他的後任，你的意見如何？」

「那麼，總統先生，我得承認這對我倒是一件難事。可是假如你需要他，假如你說一句話，那麼，我的答覆祇有四個字：悉聽尊便。」

父親不響了，據小佛蘭克林告訴我，他臉上的神情表露出十二萬分的滿足。這正是他所喜歡的答覆，而這使他不得不對艾森豪威爾有更進一步的好感，尤其是他知道這位將軍是怎麼樣不願意放勃乞走的。

「我想再考慮一下。或許這種調動是不必要的。我決定了再通知你。假如你對勃乞談起這件事，你可以對他說，他是足以繼承戴維斯的工作的唯一最理想的人物。總之，這件事要到正月裏才能有最後的決定。」

我敢確定勃乞準感到萬分高興，當他在兩個月以後聽到了當局決定挽留戴維斯的消息的時候。

那天晚上，晚飯以前，我回到父親的別墅的時候，他正在滔滔不絕地談着。他痛罵那些故意使美國不能傾其全力來推行戰爭的美國議員們。那天晚上在華盛頓，我相信一定有好幾對耳朵在燒紅了，這些人中當然包含着范登堡，泰夫脫，奧但尼爾以及哈姆，菲許。他談話的另一個題目則是關於他富天的白晝旅行的。他看見移動中的阿剌伯人和駱駝商隊；他看見遺棄在不久前的戰場上的許多燒燬了的坦克與卡車；他看見那有名的六〇九山崗，在那塊平凡的小丘上，我們很多的士兵倒下來，戰死在那兒。

當晚一起吃晚飯的有峻嚴而沉默的海軍上將李海，父親的陸海軍武官，華生與勃朗，海軍提督麥金泰，小佛蘭克林和我。小佛蘭克林和我都知道我們是無法陪父親一同到開羅去的：佛蘭克林的假期已滿，必須立刻趕回到他的艦上去，而我則在拉馬薩還有許多未了的公事。可是我們依然坐了車到埃爾阿奧納去送我父親和他的隨員們出發。霍浦金斯已經在機場等我的父親；飛機上已經爲他和我父親特別訂了兩個坐位。

在飛機起飛之前，父親又和小佛蘭克林開始了星期六那天的辯論：爲什麼小佛蘭克林不肯和他即時一起到開羅去？可是我的弟弟祇是微笑着，向父親揮手說了聲「再見」，目送那架巨大的 C-54 式飛機離地起飛。在我們回到卡太基的途中，佛蘭克林告訴我那場辯論的經過：他的驅逐艦，梅朗號，在派萊莫被炸傷了；幾架德國的轟炸機居然難得地炸中了那條驅逐艦，兩顆炸彈就掉在驅逐艦的左傍，一顆炸彈掉在艦上；現在梅朗號預備在兩三天內開出直布羅陀海峽，經歷一段漫長而危險的航程回到美國邊岸的船塢去修理。而小佛蘭克林絕不願意接受任何建議，使他作爲一個艦上的執行官，無法親自參加那

一次對艦上的其他船員有很大的危險的海航。

我在我後方司令部的工作在一天一夜之間就處理完畢；星期二的晚上我向艾森豪威爾將軍報到，就坐着他的飛機向東飛向開羅。飛機中，除我而外，還有艾森豪威爾將軍，他的六七位參謀，以及我的妹夫，約翰·鮑梯格少校。鮑梯格少校本來被派在意大利盟國軍事政府中工作，這次他是專門請假來的。我們的那架 C-54 飛機在天黑了以後離開突尼斯；黎明的時候我們到達埃及國境；清晨，我們的飛機已經圍着開羅的空運總部的機場繞圈子，預備降落。

我立刻就要開始我第三次的戰時會議了。

六 開羅會議(一)

那天晚上，當我們飛過那廣闊的沙漠，從突尼斯到開羅的途中，我可以聽到我的妹夫和艾森豪威爾談話的聲浪，他以溫和的不滿的語調，討論到軍事政府的軍官們在意大利所遭逢到的許多困難。聽着聽着我就睡過去了，醒來的時候，我們的飛機已經快臨近開羅了。

那是一個偉麗的夜。從機窗中可以看到數百哩廣泛的沙漠，形成一片單純的棕黃色。於是，突然地而出乎意料之外地，我們看到了一塊最綠的綠色，亮得使人幾乎睜不開眼來。這就是尼羅河所灌溉的細長的地帶，從北方漫延到南方的一長條豐富的土壤。我們伸長着我們的頸子看了一下基瑞的金字塔，大家爭着問：「獅身人頭像在那裏？那個是不是？」而接着我們的飛機就輕快地降低，斜飛過濁藍色的尼羅河，降落在沛恩機場；這個機場是屬於我們的空運總部的，在城的東南角上。機場上有軍車等待着我們，把我們又載過尼羅河，通過開羅的擁擠的大街，開向城西的曼納郊外。那兒就是我們的會議場所；會議已經舉行了兩天。

像在卡薩布蘭伽的佈置一樣，邁克在會議地點的四週都裝上了鐵絲網。大部份參加會議的人都住在曼納大廈，從大廈的外表看來，這一定是一個中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師所設計的。父親住在我們的柯

克大使的別墅裏；比我父親早到一晚的邱吉爾和蔣氏夫婦也分別住在附近的別墅中。我猜想在開羅會議的時期中，邁克並沒有因爲週圍的嚴密的鐵絲網而減輕了他的担憂；他認爲開羅城裏不知有多少人被政治的狂熱病所驅使，而很可能企圖暗殺居住在曼納附近的那些大人物之中的任何一個，或甚至全部。

在柯克大使的別墅的門口，我跳下軍車，趕忙走進去給我父親說早安。那時還沒到十點半；他正在床上一個人吃早餐。他精神很好，似乎已經得到了充份的休息。我問他這兩天來發生些什麼事情。

「事情？很多，很多。」

「是些什麼事呢？」

「啊！——我見到了蔣委員長，出外看了一下金字塔，接到一封史大林的電報……」

「電報裏說什麼？」

「說他準定在二十八日到達德黑蘭。那就是下星期日。」

「那麼這個會議是確定的了。」

「大概是確定了吧，」他叉了些雞蛋送進他的口中，向我擠了擠眼。

「你對蔣委員長的印象如何？」

他聳了聳肩膊。「我想他與我所想像的差不多。他和蔣夫人昨晚在這兒吃晚飯——到十一點左右才走。他知道他需要些什麼東西，而同時他也知道他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可是我們多少總可以想個辦法出來的。」他推開他的早餐盤。「扶我一下，伊利奧。」他坐到床邊，開始穿起衣服來。他一面穿

着衣服，一面和我繼續談話，而我則趁這個時候，從盤裏偷了些土司碎末，塞在嘴裏，又爲我自己斟了杯咖啡。

「到現在一共開了兩次全體會議。全部參謀長都參加了。可是在那些會議中……我猜想他們是太公式化了。在中國，在緬甸，在印度的事態眞相始終不會在會議中吐露出來。從昨晚和蔣氏夫婦的談話中，我倒知道了很多關於中國的事情，遠勝過那四小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

「你知道了些什麼呢？」

「關於那陷入停滯狀態的戰爭，以及爲什麼蔣介石的軍隊不打日本人——雖然他們還是在報紙上登載許多戰事的消息。他說他的部隊沒有訓練，沒有裝備——這一點我倒很容易相信他。可是這却決不能解釋他爲什麼極力阻擋史迪威將軍訓練中國軍隊。而這也不能解釋他爲什麼把他大部最精銳的軍隊屯在西北——紅色中國的邊境上。」

父親的貼身侍役，亞瑟·潑利梯曼，走進門來，拿走床邊的早餐盤，又回進來幫我父親穿衣服。

父親繼續他的談話。他談到給養的困難，以及英國方面之始終反對建築雷多公路的計劃……談到英國方面之不願意通過緬甸的叢林採取任何攻勢……談到與越過希瑪拉雅山的空中運輸相關聯的許多問題，以及那件特別合乎邏輯的工作底悲劇性的代價與犧牲。我曾經和好多熟悉中國，緬甸，印度戰場的空運總部的飛行員們談過話，知道他們都有一肚子的牢騷，而我照實地把這種情形告訴我父親。父親一面聽着，一面不斷地點頭。

「派到那邊去工作倒眞是件苦事，」他說。「我曾聽人家說太平洋戰區是個被忘掉了的戰區。可是與中緬印戰區相比，太平洋戰區眞不知好了多少。我絕不羨慕派到那兒工作的任何一個人，從史迪威起直到最末的一個士兵。他們得儘他們的能力來擴展那兒的戰爭，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的給養却等於零。我們絕不能怪他們，說他們藐視目前的主要戰爭在歐洲，而當歐洲的戰爭一旦結束，我們即刻把重心轉移到日本與菲律賓方面來的這一個事實。戰爭的重心永遠不會轉到他們那個方面去，可是我們却怎麼能責難他們對這一個方向的努力呢？

「前晚在參謀長會議中我見到史迪威。我叫他爲我留出些時間來，讓我可以和他二人私下談一談。要是沒有他，我眞不敢想像中國局勢的發展會變得怎麼樣。」

「事實上，在中國的工作祇有一個要點：我們必須使中國能够繼續抗戰，以牽制日本的軍隊。」

我問起英國方面在中緬印戰區的動向。「我想祇要蒙巴頓到那兒去了以後，一定會開始什麼大規模的舉動。」

父親微笑了一下。「我相信蒙巴頓自己也是那麼想，」他說。「他目前迫切地想獲得足够的登陸艇，預備從水陸兩方面來攻擊安達曼羣島。」

「安達曼羣島在那兒？」

「聽邱吉爾那種說法，你會以爲安達曼一定是他所寵愛的巴爾幹半島這一邊的戰術上最重要的地點。可是，安達曼却在孟加拉灣，緬甸南部的海中。從安達曼羣島，他們認爲他們可以攻擊仰光。」

「我認爲一切能使用的登陸艇現在都被保留起來預備在明年春天開闢第二戰場時使用的。」

「不知道你信不信，伊利奧，關於那個西戰場，英國方面現在又表示懷疑，提出了許許多多新的問題。」

「關於 OVERLORD 這個作戰計劃？可是我以爲這個問題在魁北克會議中早就有了最後的決定！」

「我們全都這麼想。事實上也是如此。那是早就決定了的。可是邱吉爾不斷地向每個人表明他的懷疑。」

「他說明什麼理由沒有？」

「他還是始終不肯放棄他通過巴爾幹實施攻擊的那個觀念。『與蘇聯的共同戰線』，諸如此類的主張。馬歇爾將軍是……非常耐心，非常有禮貌，非常堅定。我相信邱吉爾已經開始不十分歡迎馬歇爾了。他發現不論他採取何種方法，哄騙也好，講理也好，發脾氣也好，馬歇爾還是始終堅持他的正面給希特勒一拳的戰術。」

「和邱吉爾對面辦交涉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差使；誰去辦都行，我是絕不羨慕的。」

「可是我却可以告訴你一個人，」父親說。「有一個人却有辦法和他相處得很好，而憑這一點他眞該得一個勳章。這個人就是艾森豪威爾。」

「喂！」我叫道。「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父親說。「快講，因爲我在十一點鐘要去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有五分鐘我就得走

了。」

「你是不是當眞要給艾森豪威爾一個勳章？」

「當然是呀。可是他却不肯接受。當我頒發給麥克阿瑟榮譽勳章的時候，我也給了他一個同樣的勳章，可是他却把勳章退回來了。他說這個勳章是發給英勇的人們的，而他並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英勇的事。」

「一個多月以前，」我說，「我和比台爾•史密斯談起這個問題。他說有一個勳章艾森豪威爾很想能够得到。這勳章就是美德勳章。他說有一次艾森豪威爾告訴他這是他所希望獲得而始終沒有得到的唯一的勳章。史密斯說，他之所以喜歡這個勳章是因爲這是一個任何人都有資格獲得的勳章，即使是一個很好的伙夫也可以得到它。可是艾森豪威爾却始終沒有得到過。」

父親想了一下，微笑道：「你能不能爲我保守這個秘密？」

「爲什麼不可以呢。」

「好極了。假如你能馬上拍一個電報給史密斯，叫他草擬一道獎狀——關於北非戰役，西西里戰役等等——而假如他能够在我們出發到德黑蘭之前得到這個勳章，我將親自爲他佩在他的軍服上。」

「我馬上就去辦，」我說。

父親去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時候，我跑上樓去，走進預先爲我準備好的房間裏，漱洗了一下，就

開始享受一頓道地的早餐。早餐是在柯克大使的別墅的屋頂平台上吃的，那是一個環境優美，陽光極好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遠處的金字塔。這裏的奢侈使我想到開羅的情形將與卡薩布蘭伽大不相同。海軍當局爲了這次會議專門派來了八個頭等西崽和頭等廚子，他們都有高超的本事，能够把軍糧飪烹成精美的盛宴，並且對於每個人的招呼都非常週到。因此，這一次我就無須再留心爲每一個想喝酒的訪問者斟酒了。同時，我雖然依舊是我父親的貼身侍從，我可以不必每一秒鐘都在場聽候使喚，或是參加每一個約會了。我可以有一個比較自由的時間，有的時候甚至可以離開別墅，到傍的地方去觀光一下。

那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一個人坐在平台上，在完全休息與鬆弛的狀態中，懶懶地眺望着遠處的金字塔，回憶到——我相信任何人在這種環境中都有同樣的回憶——流動與不朽的時間，疾掃過這些墳墓的戰爭，來來去去的將軍們，埃及的國王們，羅馬的帝王們，大元帥們以及帶兵的將領們。

麥金泰提督，父親的醫藥顧問，突然地跑來，擾亂了我喝最後一杯咖啡時的白日夢。他對於我父親飛行到德黑蘭的計劃，頗爲擔憂。

「在這樣明朗的陽光下有什麼可以擔憂的，麥克？」

「我不是和你說着玩的，伊利奧。我認爲他祇應該飛行到巴士拉，然後從那兒轉乘火車。伊朗的那些山高得很，飛機必須飛得很高。而在那種高度……」

「飛過幾座高山恐怕總是免不了的吧。」

「即使如此……你今天是不是和他一起吃午飯？」

「我想大概是吧。」

「他是聽你的話的。你能不能告訴他你認爲他後半部旅程中必須坐火車。這是正經事，別以爲我是在說着玩的。」

「你和他的飛行師勃拉恩少校談起這件事沒有？」

「沒有。」

「爲什麼不叫我去和他商量呢？叫他小心不要檢太高的山峯飛。父親究竟能飛多高才不致於有什麼危險？」

「決不能超過七千五百呎。這是最高的限度。」

「好吧。我會告訴勃拉恩的。他爲父親駕駛過好多次飛機，因此他懂得什麼樣對付這一類的問題的。你可以不必担心，麥克。我會好好地招顧他的。」

樓下的會議到下午一時才結束。我跑下樓去和邱吉爾與霍浦金斯寒喧一番，並且看一看自從卡薩布蘭伽會議以後就不曾再會過面的其他的人們——馬歇爾將軍，安諾德 軍，金海軍上將，蘇末維爾將軍，以及英國方面的參謀長們。進去吃午飯以前，我抓到了一個機會和父親談了幾句話。我問他關於OVERLORD這部作戰計劃有什麼新發展。

「很困難，」他微笑着說。「至少英國方面的見解是如此。但是，在魁北克所草擬的計劃還依然是目前的計劃。」他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他們提議把它轉變爲一個小規模的攻擊，或許以擄獲爲攻

擊的對象，而把戰事的重心依舊放在地中海方面。可是這新的計劃還沒有決定。」他向馬歇爾所站的地方點了點頭，以頗有意義的眼光朝那個方向望了一下。「馬歇爾將軍，」他說，「依然是會議席上的儐相。在他的心目中，目前所應該討論的問題祇有一個：誰來指揮我們從西方發動的侵入戰？」

霍浦金斯與鮑梯格這時候從另外一堆人羣中走了過來，父親和他們一起走出屋子，到花園中去坐着等候午餐時刻的到來，吃午飯的時候，大家很少談到公事；霍浦金斯提醒父親說當天下午蔣氏夫婦舉行一個鷄尾酒會，問他去不去。

「對了。我是恐怕沒辦法去的。伊利奧……你代表我去吧。怎麼樣？」

「蔣氏夫婦的鷄尾酒會？我當然願意去的，假如你不需要我做什麼傍的事。」

「今天下午，」父親說，「除了幾個公式訪問以外，沒有什麼傍的事。客人來的時候你在外面先好好地招呼他們一下，到約定的時刻你再把他們引進來。四點半左右你就可以離開，坐汽車到蔣氏夫婦的別墅去。」

「去了我怎麼講呢？」

「關於我的不出席嗎？你可以說五點鐘的時候我要接見勞倫斯·斯坦因哈脫。」

斯坦因哈脫那時候是我們的駐土耳其大使，當我們在開羅的時候，外邊正流傳着很多關於土耳其加入盟國作戰的謠言。我問我父親關於這件事我們是否已經有了什麼決定。

「雙方並無什麼最後的決定，」父親說。「可是我自己的主意却打定了。」

霍浦金斯在傍邊微笑着。你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他們在事前已經討論過，而一定有其他的第三方面對我們的最後決定表示不同意。我不難猜到這第三方面一定就是邱吉爾。

「你的關於土耳其問題的決定在這兒是不是一個機密，爸？」

他笑了起來。「我恐怕對每個人都談到過這個問題了，」他說。「土耳其參戰的條件是要我們給它大批租借物資來配備它的軍隊。它要這些物資幹什麼呢？想因此可以在戰後成爲一個强國？邱吉爾認爲我們應該給土耳其它所需要的物資，使它可以即刻參加戰爭。爲什麼呢？他明知道租借物資分配給土耳其以後，分配給我們進攻西歐的物資將因此減少；我眞不懂爲什麼他還要那麼主張呢？」

「說不定土耳其之參加到我們這邊來會增强他從地中海攻打希特勒的論調的。」

「這也很難說，」父親帶着譏嘲的口吻說。

午飯以後，父親所說的「公式的訪問」開始了，而柯克大使的別墅頓時變得像紐約的中央火車站那樣地熱鬧。我們在前廳招待來客，領他們走進起居間，拿出香煙來招待他們，和他們應酬一陣，然後在約定的時刻，得到裏面的暗示，把他們帶到花園裏父親的跟前，有時候霍浦金斯在一傍陪着，有的時候是我，或是父親的陸軍武官華生。從二點十五分到四點半之間，來訪的客人，按照先後到達的次序來算，一共有：亞謨·默罕摩特，哈賽奈恩爵士，埃及的皇室元老；墨斯達發·納哈斯，埃及的內閣總理兼外務大臣（他代表埃及的國王發洛克一世向我父親致歉意，說國王因爲不久前乘車失事受傷，未能親來拜訪）；希臘的國王喬治（父親對他的評語是：「蠻漂亮的人物，可是頭腦却是空洞洞的」）；埃邁

處限。曹台洛，當時希臘流亡政府的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希倫爵士，英國駐埃及大使；南斯拉夫的國王彼得（我問父親他對彼得的印象如何，因爲彼得顯然地已經請求美國給予他直接的援助以挽回他行將失去的王位；父親對於我的發問，覺得有些驚訝，他似乎想不到居然會有人對彼得的意見當眞發生興趣。「人家該怎麼想呢？他還是個小孩子。如果說他有什麼意見，那全是傍人給他想出來的。」）；波利基，當時南斯拉夫的總理兼外務大臣；亨利・梅脫蘭・威爾遜將軍，駐中東英軍總司令與勞逸斯將軍，中東的美軍總司令；空軍上將道格拉斯，中東英國皇家空軍總司令；亞爾格農・威立斯海軍元帥，駐萊望脫的英國海軍司令；以及史東將軍，駐埃及英軍總司令。

當來客比較稀少的時候，我找了個和霍浦金斯談幾句話的機會。

「我看父親和邱吉爾之間好像又有些什麼糾紛，」我說。

霍浦金斯聳了聳肩膊。「這一次有一點不同，」他說。「事實上，可以說是有兩點不同。第一，我們現在已經能夠大量地生產。坦克。船舶。大砲。這是與上次不同的地方。今後的戰爭大部份都要使用美國製造的裝備，美國出生的士兵。而這一點也是與上次不同的。」

「你說得很對。」

「誰應該來主宰這一次會議呢？」他帶着思索的神情對我看了一會兒。「可是，同時邱吉爾知道這一次會議是在大英帝國的土地上舉行的。這就使事態又有些細微的不同了。此外，這一次會議中所討論的議事又與前幾次完全相異。這一次會議的中心是遠東與中東的局勢——所討論的一切人物與問題對於

美國人，甚至是你的父親，都是比較陌生而不熟悉的。邱吉爾與艾登——他們從初級學校時代起就開始埋頭研究中東與遠東問題了。他們對於這些問題可以說是老門檻了；這兩個地區形成了他們帝國的核心。」

「那麼，現在究竟是誰在主宰這個會議呢？」

「這你可以不必担心，」霍浦金斯安慰我。「你父親還始終居於領導的地位。不過他還需要一點時間。他小心地看，仔細地聽。他是在學習。可是他始終是大老闆。」

我在四點半鐘的時候離開了我作爲嚮導的崗位而出去担任一件新的任務：代我父親出席蔣氏夫婦的鷄尾酒會。他們的別墅離我們的住所約一二里遠，當我走進門的時候，我發現邱吉爾的女兒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樣的角色。可是我沒有機會和她談話；蔣夫人走到我的身傍，毫不停留地把我帶到兩張並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覺得她像一位頗爲老練的演員。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她生動地，有風趣地，熟心地談着——而她老是設法把我來作爲我們談話的中心。這種恭維與魅惑的功夫之熟練到家是多少年我難得碰到的。她談到她的國家，可是所談的範圍祇是限於勸我在戰後移居到那兒去。她問我是否對畜牧農場發生興趣。那麼中國的西北對我簡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爲我描畫出一個有能力，有決心的人從中國苦力的勞作中所能集積起的財富的金色的畫面以後，她把身子靠向前來，閃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視着我，同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的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膝蓋上。在最初的幾分鐘內，我極力地對自己說：這位夫人祇是對我們之間的談話感到濃厚的興趣，而在她的心中絕無其他任何動機。可是在她的神態之

中却有一種與絕對的直摯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歡愉的光采。我絕對不會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以致她認爲必須將我征服，使我很快地變成她的好友，爲了任何將來的其他的目的。不過我却相信蔣夫人多少年來始終是以一種征服人的魅惑與假裝對她的談話對方發生興趣的方式來應付人們——尤其是男人——以致現在這變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發作；說實話，那會嚇壞了我。

當她離開了我去招呼其他的客人，我趕忙爲我自己斟了一大杯酒，一口氣喝了個乾淨，於是我在四週走動一下，和我所認得的人隨便談談。屋子裏充滿了許多高級的將領；除了我父親與邱吉爾以外，三國代表團差不多每一個人都來了；空氣中震盪着談話的聲浪。我得到了一個機會被介紹去見蔣委員長，他不會說英文；我們通過了一個繙譯交換了三四句隨便而客氣的寒暄話。一個多鐘頭以後，我告辭出來，回到我父親的別墅中。我回去的時候他還在和斯坦因哈脫在談話；喬治，亞倫也在，他是我們國務院中的近東問題專家。當他們快要談完的時候，我參加了進去。

「今天的鷄尾酒會怎樣？」父親問我。

「不壞，」我回答。斯坦因哈脫和亞倫又坐了一會兒，和父親約定他從德黑蘭回到開羅後第二次會面的時日，並且討論到由於父親對土耳其參戰的態度，他們是否應該把伊斯梅脫，依諾奴，土耳其的總統，帶到開羅來見一下父親。他們走了以後，我問父親：

「我猜想他們的意見與你相同，認爲土耳其不該在這個時候參戰。」

他點了點頭，接着就回到那個鷄尾酒會的話題上去。他想知道我對蔣氏夫婦的印象，我特別告訴他

我對蔣夫人的看法。他皺着眉頭，帶着思索的神情聽我講完，然後批評說：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像你那樣激烈的看法的。毫無問題地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而我決不想在她的國內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個敵人。可是目前在中國有誰能替代蔣的地位呢？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領袖。蔣氏夫婦固然有很多短處，可是我們却不得不依靠他們。」

我告訴他在方才的鷄尾酒會中我碰到勞逸斯將軍，他約我今晚去吃晚飯，飯後在開羅玩一晚。我請求他的許可。

「今晚上反正沒有什麼要緊的事。祇有霍浦金斯，李海，華生和麥克在這裏。不記得誰提議打紙牌玩。你去你的好了。痛快地玩一晚。」

因此，那天晚上我和勞逸斯將軍以及其他幾位到一家開羅的夜總會去；當我在十二點鐘以後回到我父親的別墅的時候，他的客人們正在起身告辭。我陪他一起到他的臥室去。他想知道我是怎麼樣消磨我的一晚的，而我則急於想知道他是否已經聽到關於當天參謀長聯席會議中的討論經過。白天我每次經過曼納大廈的時候，我都看到許多高級將領們在陽台上曬日光，顯然地他們是在繼續他們的會議而同時則設法想得到一些空氣與陽光。

父親說根據李海的報告，會議略有進展，可是却還沒有什麼最後的決定。英國的代表還是以相當堅決的態度（父親認爲這是起源於邱吉爾的）指摘這部在夏天草成，在秋天修正過的 OVERLORD 作戰計劃中眞實的與幻想的弱點。美國的代表則以更堅決的態度（我認爲這是起源於父親與馬歇爾將軍的）

堅持這是一部聰明的作戰計劃，而反對在挪威或是地中海的小規模的戰鬥。

「我猜，」父親說，「馬歇爾和金氏看到這部兩次被雙方同意的計劃又得從頭來討論過，一定感到很灰心。而我得承認，我能夠了解他們的這種心情。」

顯然地，中國，緬甸，印度戰區中的英美將領之間的摩擦多少增强了一些英國方面反對西歐作戰計劃的頑固的態度。摩擦的原因是英國方面始終認爲中國的軍隊是無法可以組織成任何戰鬥機構的，這正和史迪威的未經證實的努力相反；同時，英國在緬甸的戰術是「慢打，小打」，而我們的戰術則是「快打，大打」。我對我父親說：假如我們考慮到英國的帝國的責任，則他們的這種軍事方面的方略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當然是有道理的，」父親爆發地說。「可是他們的帝國觀念雖不能說是十七世紀，或是十八世紀的，至多也不過是十九世紀的吧了。而我們的戰爭則是二十世紀的戰爭。多謝上帝的保佑，戰爭的局勢終算多少有些好轉；現在已經不再是我們求生存的戰爭了；可是畢竟是險得很，而差一點我們就會失敗的；戰爭之所以如此艱難就是因爲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的『不朽的帝國』這一個觀念。

「我告訴邱吉爾我們對付菲律賓的例子——我們怎麼樣堅持着推廣教育的初步計劃，我們怎樣努力把統治菲律賓的責任從我們的肩上轉移到他們自己的身上……」

「邱吉爾怎麼說呢？」我問。

「你猜他怎麼說？他說菲律賓人是一種不同的種族，他們的天性比較富於獨立自主的自信心，並且

能够担負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不理解印度人，緬甸人，或是爪哇人……甚至中國人！」

父親那晚並不像平時那樣緊張，第二天並不是一個十分忙碌的日子，因此他覺得很閑散，想多談談。我們各人又點上了一支香煙，散漫地隨便捺天。我們猜測德黑蘭會議的情形與可能的成果，我們猜測史老伯伯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物（當我們倆個單獨談話的時候，他老是稱呼史大林爲史老伯伯的）。

「有一點我是有把握的，」他微笑着說，「關於我們從西方攻擊歐洲的主張，我可以得到一個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實，在明年春天，假如蘇聯方面的戰事還是像現在那麼神速而順利，說不定根本就沒有開闢第二戰場的必要了！」那時候紅軍正在神速地越過大平原，逐漸接近波蘭的國境，最初還差一百哩，後來是六十哩，而現在祇剩下五十哩了。基輔已經被克服。我們都覺得很高興：我們似乎已經可以看到戰爭的結束；我對我父親提起他上次關於德國將於十二個月內戰敗的預言，並且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這預言似乎並不是不可能兌現的。

「不一定十二個月，伊利奧，最多十三個月就够了，」他說。接着，他趕忙說，「我還是說十四個月吧，我不要十三個月。」

「可是也說不定會是十三個月呀。」

「不。要不是十二個月，就是十四個月，好像是華盛頓廣場的母親的公寓大廈，你還記得嗎？那座大廈是沒有十三樓的，十二樓上面就是十四樓。」

「已經打過十二點了，是不是？現在可以算是星期四了。我祝你過一個快樂的謝恩節。」

「對了。今年的確有好多事是值得我們感謝的。」

一點半的時候，我把一本偵探小說放在他的床頭，離開他回到我自己的臥室中。

第二天早晨，霍浦金斯與曹德幹來看我父親，他們走了以後，父親批閱了一小時由外交郵包從華盛頓送來的信件。中午的時候，邱吉爾和蔣氏夫婦來了，帶着他們陸海軍參謀部的將領；於是大夥兒都到外邊花園裏去攝影。午餐的時候，大家又討論到給養的問題，藍得士爵士與魏納脫大使和我們的道格拉斯與陸次麥克洛埃交換着關於這一方面的意見。當我們離開餐桌的時候，我接到了勃拉恩少校到達的消息；前幾天我們請他和邁克一同坐飛機到德黑蘭去看看，再回來告訴我們那兒的山崗是否高得使我們非接受麥金泰的建議不可。當勃拉恩少校看到我的時候，他舉起他的大姆指與食指，形成一個表示贊可的圓圈。「完全OK」，他報告說。「假如氣候不太惡劣，我們可以很舒服地飛行，最高的高度也決不會離七千呎太遠的。」

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又興奮，又歡喜；他是絕不願意乘火車在那兒炎熱的天氣中遲慢地完成他的後半段旅程的。

當天下午，在別墅的寬大的豐富的廚房中，大家正在忙着籌備一個盛大的謝恩節的讌會，可是蔣氏夫婦却有事，無法來參加這個盛會。不過蔣委員長和他的夫人在下午來和我父親一起喝茶；我們四個人坐在花園裏的樹蔭下。大部份是蔣夫人一個人在說話：她很動聽地談說她預備在戰後掃除中國文盲的計

劃，利用一種新的「基本中文」的文體，將中國文字減少到和我們的「基本英語」中所用的字數差不多——一千二百字與一千五百字之間。她同時還講到其他改革中國的將來的計劃，父親一向對中國的人民有崇高的敬意，並且對他們的問題以及開發他們資源的可能性有很濃厚的興趣，所以在蔣夫人滔滔不絕地談話的時候，他很熟心地聽着。想到昨天他所說的中國目前沒有其他足以使中國繼續抗戰的領袖，我懷疑他是不是也在考慮蔣夫人所描畫的這些改革似乎不一定要等待傍人來替代蔣氏以後才能推行。

他們走以前，蔣夫人爲她的丈夫翻譯，提到他與我父親已經雙方同意的關於增强國內團結的初步協定，特別是關於中國共產黨這一點。我尖起我的耳朵，可是他們並沒有對這個話題加以任何討論；顯然地他們早就比較詳細地討論過這個問題了。蔣與我父親似乎是對這一種團結的努力是完全協調的。

謝恩節的晚餐是一個再歡樂沒有的讌會了。第一，這個讌會正碰上了一個好時候。正如我和父親在昨晚所談到的，蘇聯的軍隊正在順利而神速地推進；一連串的會議快接近大家所希望的一個圓滿的結束的階段；另一個——恐怕是最重要而最多事的——會議馬上就可以開始；盟國的團結，雖然不斷地有着許多阻難，似乎目前已經到達了最緊密的地步，而不久四巨頭中的第四位也將個人與我們見面；我們的部隊以重大犧牲越過了塔拉瓦與瑪金島，而吉爾貝特羣島也早被我們收服；在歐洲的上空，我們巨大的空軍機隊一天天地在增强其威力，以壓倒的陣容襲擊柏林。

因此，當我們在那一個謝恩節的晚上在柯克的別墅中圍着那張又大又長的餐桌坐下的時候，我們都懷着一種慶祝的心情。父親的火鷄是他自己從國內帶來的——這些火鷄是當時副國務卿史退汀紐斯和阿

拉拔瑪地方的一個叫做喬・卡脫的人送的。「你們能想像得到喬將感到怎樣的驚奇，假如他知道他的火鷄是先飛了多遠的路程才被殺了給我們吃？」父親一面親自切着一隻火鷄，一面問我們？他親自用刀來切開火鷄，一份份地分給全體賓客：邱吉爾，他的女兒撒拉，艾登，海軍中校湯姆生，摩朗爵士，李海，魏納脫，哈立曼，霍浦金斯和他的兒子鮑勃，華生，麥金泰，勃朗，史坦因哈脫，我們別墅的主人柯克，鮑梯格和我。飯廳外面，在我們吃着的時候，一班從嚇克斯推普營地（我們在開羅附近的兵營）來的管弦樂隊演奏着跳舞的音樂。

晚餐快要完畢的時候，父親舉起了一杯酒，提議乾杯。他很簡短地談到謝恩節的風俗，以及這風俗的由來；很有感情地描述今晚在全世界，美國的士兵與水手正把這美國的傳統介紹到十多個異國的土地中。接着，他說：

「講到這裏，當然使我想到我自己，能夠很榮幸地與大英帝國的總理大臣一起分享這一頓謝恩節的晚餐。」

邱吉爾已經站了起來預備致答詞，可是父親還沒有說完。

「大家庭，」父親說，「一般地是比小家庭更爲密切地團結着的……因此，今年，有全英國的人民參加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形成了一個大家庭，而比以前團結得更鞏固了。我提議爲這一個團結而乾杯，並且希望它長久延續！」

邱吉爾站起來致答詞；他的卽席演講的本領眞使人驚佩之至。他也極力地贊頌我們戰時的團結，並

且保證它將不斷地鞏固起來。

父親唯一能够與史迪威將軍作單獨談話的時間是那天晚上晚餐以後。這位高高的，堅執的軍人在十點鐘左右到達，而在十點半的時候，他已經和我父親倆個人並肩坐在起居室中的那張大沙發上，親近地在談論着。我和我的妹夫鮑梯格和霍浦金斯坐在一起，離他們不到幾尺遠——我們三個人偶而談幾句，不過大部份的時間則在聽他們說話。

史迪威將軍很流暢地，直率地，安靜地談着。他從不提高聲浪，而也很少發什麼牢騷，雖然我們不難想像他是的確有理由可以那樣做。從頭到底都是難關，這似乎是他的命運。他敘述他與蔣及蔣的總長何應欽將軍之間的困難；而回答我父親的詢問，他很乾脆地判斷他是有辦法來處理與對付這些困難的。他說他的處境可以容易得多，假如他能有權來分配更多的租借物資，而同時他說他也了解我父親之無法增加其分配數量的理由。父親問起雷多公路，他想知道關於那件巨大的工程的許多問題以及成功的希望。英國方面，父親聽說，以瘧疾及氣候等等爲理由，不肯接受建築這條公路。可是那時候，在曼納大廈的會議中，美國方面的意見居於支配的地位，而史迪威很安靜地，有條有理地和我父親辯說關於這一條公路的問題。在開羅，英國方面企圖修正在魁北克所決定了的分配給中國，緬甸，印度戰場的物資噸位數量，而他們所謂的修正是把最最需要這些物資的國家的分配量減少，而把並不最需要這些物資的國家的分配量增加，史迪威對這種修正表示不同意，他說假如在魁北克所決定的分配量要修正，那麼祇可以是向增多方面的修正，而絕不可以是減少。

關於中國軍隊是否可以訓練成很好的戰士這一點，史迪威將軍無須和我父親辯論，因爲我父親對於這一點與他有相同的見解。可是我父親却很想知道史迪威之訓練中國軍隊已經有了什麼成績；史迪威告訴他目前已經有兩師美國訓練的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正式作戰。「他們還沒有發揮他們眞正的戰鬥力。」史迪威多少帶着些苦澀味承認說。「說老實話，我是眞想立刻就回到我那兒的防地去，幫助他們克服他們最初的恐慌的情緒。我相信這不過是一般的上場慌，雖然不幸地英國方面知道了他們第一次在敵人砲火下的不很成功的試練，而大大地加以宣傳。」可是他有極大的把握，相信最後終可以用事實來證明中國的戰鬥力的；正如一切良將的判斷一樣，我們今天很高興地知道他的見解畢竟完全是正確的。

很明顯地，父親對史迪威有很大的好感；他留他坐在他的傍邊談了一個多鐘頭；最後當他辭去的時候，父親對他在遠東方面所面臨的荊棘的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

當我在臨睡以前陪着父親在他的臥室裏一起吸着最後的一支捲煙的時候，他又談到那條遠東方面的荊棘的道路。他先告訴我說英國方面甚至對我們在太平洋中所取的戰術都表示反對。

「他們不贊成我們的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的戰術，」他說。「而他們也不同意我們預備將菲律賓作爲我們將來對日作戰基地的看法。」他略爲酸苦地微笑了一下。「或許他們認爲菲律賓人是不會集結在我們的旗幟下的；正因爲他們自己是很難期盼他們的殖民地人民會集結在他們的旗幟之下。」

「總而言之，」他繼續說，「他們認爲我們應該立刻放棄從一個島跳到另一個島的這種戰術，而開始集中我們的力量來肅清馬來半島，然後我們可以爬向中國海岸，在那兒建立起一個將來對日作戰的基

地。」

我也曾經聽到我們自己的海軍軍官們談到在中國海岸登陸的問題。

「當然，」父親說。「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基地移到比英國人所主張的更北的地方，這是更爲合理而容易實行的。再說，我們自己的情報與英國方面所提供給我們的完全不同。英國人說中國的海岸上密密地都佈滿了日本軍隊，可是我們却很充份地知道大部份中國海岸是在中國游擊隊手中。」

我問我父親這些游擊隊是不是中國的共產軍，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

「蔣偏偏又想使我們相信中國的共產黨對日本軍隊並無任何敵對的舉動。可是不幸地，我們所知道的却與他所說的完全不同。」

據我自己從其他的地方得來的情報，我知道我們一切關於中國土地的空中攝影偵察以及空中測圖，我們的第十四航空隊作戰上所必需的照片等等，都是絕對機密，不能對英國方面公開的，而我把這種情形告訴我父親。他早就知道了這一點。

「很久以前我們就和中國互相協定這一點了，」他說。「中國政府迫切地要我們同意不把我們的空中測圖給英國方面看到——事實上，他們是要我們先答允了這一點才容許我們開始這一方面的工作的。我們不難探知他們堅持這一點的原因。他們知道英國方面很想看看這些測圖，爲了商業上的目的……商業上的，戰後的目的。

「事實上，不多幾天以前，我和蔣在一起吃晚飯的時候還談起了這一問題。他很希望能夠得到我們的支持，來反對英國人帶着他們戰前所享受的那種治外法權回到香港，上海與廣州。」

我問父親我們是否預備給中國以這一方面的支持。

「自給是不會的，」父親回答。「在我們正式商討這個問題以前，我對蔣的政府的性質表示不滿。我告訴他這種政府決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我告訴他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期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組織一個民主的政府，祇要我們能夠保證蘇聯答允尊重滿洲的邊境。關於蘇聯這一點預備在德黑蘭會議中就加以討論。」

「那麼，祇要你能和史大林把這一點解決了，蔣就同意組織一個比較民主化的中國政府。而在我們這一方面……」

「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將支持他不使英國或其他國家在香港，上海與廣州享受特殊的帝國的權利。這是應該的。」

這可以說是一件交易，可能有很好的收穫。

「我特別覺得高興，當我聽到蔣委員長願意在普選之前邀請共產黨參加組織政府，」父親說。「事實上，他所關心的焦點祇是希望我們能夠履行我們的諾言，不使英國的軍艦在日本戰敗以後開進中國的港口。祇許美國的軍艦開進中國。我已經給了他我個人的諾言，說這一切將正如他所期望的一樣。」

「叫邱吉爾答允這一點恐怕是要費相當的口舌，而不會是件容易事，」我說。

「關於這一點，他無法與我爭辯的，因爲打敗日本的物資與兵力百分之九十九全是美國的，」父親很嚴厲地說。「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將採取一個新的方向，使英國，法國和荷蘭覺悟到我們管理菲律賓的方法是他們管理他們殖民地的唯一的方法。」他向我指出大部份的中國人認爲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要比英法荷的殖民地政策要高明得多。

父親與蔣委員長所討論的不僅是關於中國的將來。他們還談到馬來聯邦，緬甸，安南，印度等等問題。而顯然地，父親對於這些殖民地問題的態度使蔣大爲興奮。因爲父親對他說，英國在印度應該滿足於它的特惠的經濟地位，而必須允許印度人民以政治的獨立，在另一方面，法國在戰後也沒有任何權利回到安南，以安南曾經是它的殖民地的這一個理由來要求收回這塊富沃的土地的主權。他對蔣說，法國政府最多祇能獲得它殖民地的委託統治權，向聯合國組織負責，在聯合國認爲這些殖民地能夠自己管理它們的行政的時候，法國就應該交還它們的獨立的宗主權。這是他差不多一年之前所發表的同樣的意見，時間並沒有變更他的信仰，相反地，是使他的信仰更爲堅强了。

第二天上午，他有許多約會，接見了藍狄斯，哈立曼，蒙巴頓（他關於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的戰爭有他自己的獨特的報告），蔣夫人，李海提督與魏納脫大使，最後我總算找到了一點時間單獨地告訴他他所需要的美德勳章已經送到了。

「好極了！」他叫道。那眞是他所最最期盼的一個好消息。「趕快通知艾森豪威爾，叫他在午飯以

後從曼納大廈到這兒來一次。」

於是在兩點三十分左右，當艾森豪威爾將軍和馬歇爾將軍一同走進我父親的屋子的時候，父親宣佈他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他們。艾森豪威爾以立正的姿勢站着，當父親叫華生宣讀預先準備好的獎狀。獎狀宣讀完畢以後，父親做了個手勢，叫艾森豪威爾走前一步；而當艾將軍彎下他的身子的時候，父親拿出勳章，親自爲他扣在他的軍服上。

「你所應該得到的事實上還不祇是這個，艾森豪威爾。」父親說。

艾森豪威爾的眼中洋溢着淚珠，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總統先生。我對於這一個勳章的感謝超過你所給我的其他一切。」

當天下午開最後一次政治會議。蔣氏夫婦，邱吉爾，哈立曼，艾登與賈德幹在花園中和父親討論了差不多兩小時之久，草擬那預定在德黑蘭會議結束後向全世界公佈的聲明，並且決定怎麼樣措詞，使全世界知道滿洲，臺灣以及澎湖羣島將在戰後歸還中國，而朝鮮在亡國多年後將重新獲得自由。

在一頓很安靜的晚餐後，父親很早就上床睡了，因爲他與他的隨員們第二天一早五點鐘就得起身，假如他們要在當天下午到達德黑蘭的話。氣象的報告很好；全程飛行的計劃得以實行。我不預備和他們同行；格萊少校已經駕駛了我的飛機到達開羅，我預備坐我自己的飛機到德黑蘭，因爲我不知道我將在伊朗停留多久，而我必須隨時都得準備離開那兒回到我的防地。此外，我已經接受了艾森豪威爾的邀

請，到南部的勒克啥去遊覽一天。

因此，在第二天下午，當父親與他的一羣出發了以後，格萊和我和我的飛機乘員中的一員，克萊姆上士到尼羅河的下流和艾森豪威爾以及他的幾位參謀會合。我們在星期六的晚上到達那兒，在勒克啥旅社中找到了幾間房間過夜。我們在那旅館中所找到的不僅是房間，在大客廳的附近的一間房間中我們發現了一架鋼琴。克萊姆上士歡呼了一聲，立刻跑到鋼琴前坐下。在戰爭以前和平的日子中，他於凱·加沙樂隊中當琴師，他以熟練的技巧開始彈了起來。晚餐以後，他爲艾森豪威爾和我們彈了兩小時之久，我們則靜靜地坐在一傍聽。假如你閉上你的眼睛，你會覺得你又回到了故鄉，而戰爭已經結束。

第二天，埃及帝王的墳墓，郊外的一頓野餐，卡納克雄偉的廟宇——我們消磨了和平，安息，悠閑的一日。我們一行人中唯一覺得不安的是艾森豪威爾將軍，他不斷地擔憂這次開羅與德黑蘭會議的成果，與侵入西歐作戰的最後討論中，將決定由馬歇爾將軍來担任最後一次的盟軍總攻擊中的總指揮，而艾森豪威爾他自己將被調回到華盛頓總部去做辦公廳的工作。在那天下午他接連三四次提到了他關於這一點的擔憂；我不知道他之如此做是否因爲有一位大元帥的兒子在他的近傍；不論怎麼樣，關於這一類事，我卽使覺得我應該幫他一下忙，我也還是不能有所作爲的。我當時祇能安慰他：「盟國的聯合參謀總部在作任何最後的決定之前是一定會先和你商量的，將軍。」卽使關於這一點，事實上，我也是毫無把握的。

格萊，克萊姆上士和我計劃在第二天起飛赴德黑蘭，可是我們的飛機發生了故障，因此我們不得不

化了些時間來修理。最後，在二十九日，星期一的傍晚，我們出發，計劃着飛過阿剌伯的沙漠，清晨四點鐘在中途哈伯那耶降落加油。

星期二早上九點半我們在德黑蘭的機場降落，發現我們成爲了許多人關心與騷亂的主因。那兒的通訊本來就十分不便，因此我們無法使父親知道我們在勒克啥被阻，多躭擱了一天，因此使大家都認爲我們一定在阿剌伯沙漠中被迫降落。他們正準備派人出發搜尋。假如我們眞的是被迫降落，那倒不是好玩的，因爲我們知道得很詳細，沙地阿剌伯的遊牧民族是十分兇悍而蠻橫的。我們的到達使父親大爲安心。事實上，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七 德黑蘭會議

到德黑蘭去的七十七個美國人首先從空中看到這個都市——一座使人驚訝的近代化的都市，它的建築物與車站密集在一連串小山的脚下。這些山崗，與橫貫西南的山脈連繫起來，形成一個廣大的盆地，包圍住千百哩的沙漠，稀稀落落的幾所村莊，一兩條寂寞的鐵路軌道以及德黑蘭這個城市。三巨頭之在這兒會晤無非是爲了妥協起見，而我相信他們三人之中，誰也不會滿意這個密會的場所的。史大林，因爲必須親自指揮他的軍隊，堅決主張會晤的地點離莫斯科決不可以超過一天的飛行；結果，他們便選擇了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友好的中立國的首都，參加聯合國的一個國家，除開這兩點而外，便沒有什麼傍的值得我們介紹的了。

不便的地方却十分多。第一，不久以前，德黑蘭曾是納粹在中東一切間諜活動的大本營；而邁克與蘇聯方面的密探們都確信在數千個從歐洲逃入這個都市的難民中，不管我們警戒得怎樣地嚴密，還依然混雜着好幾十個納粹間諜與有納粹傾向的人物。第二，這兒的健康與衛生的問題恐怕是全世界中最困難的了。德黑蘭的飲水是通過毫無遮蓋的溝渠從山頂流到城市中來的；假如你住在城市的高處，那麼你是幸福的，因爲你可以優先使用溝中的飲水；可是你也說不定會是缺乏公德心的，因爲你得利用這流過你

住所的溝渠，同時作爲你取得飲水的來源與排洩污水的去處；因此，假如你不幸地住在城市的中部或是低處，那麼你所得到的飲水將是你居住在高處的隣居們所傾倒下來的污水。這樣一來，假如你不生瘧疾或是痢疾，那才是怪事。爲什麼一個比較現代化的都市，有廣闊平坦的道路，相當近代化的醫院，一所大學，博物院，足够應用的發電廠——甚至還有電話的設備——反而沒有那最最重要的，正當的供給飲水與排除污水的設備，這可以說是我們難以理解的小小神祕之一。

雖然德黑蘭看來似乎是一個現代化的，繁榮的都市，我們很快地就可以發現到伊朗的經濟是旣非現代化，又非繁榮的。伊朗有一個首都，而圍繞着這個首都則是廣大的土地——遊牧部落所寄生的草原，這些人民所知道的祇是最最卑賤的貧窮，在北方說不定情形比較略爲好一點，因爲那兒有較好的耕地，而生活也不致太困苦。在南部是油田，那時是英國的租借地，帶給了一小部份波蘭的上流人物以及政府官吏以巨大的財富，可是對於其他一般的居民則並無絲毫的補益與貢獻。

好像這一切還不够壞似地，戰爭又把連續性的惡性通貨膨脹帶了來：一包麵粉的代價超過一般非公務員的伊朗平民的一年總收入；歐洲的難民必須付出與五塊美金同等的代價來買一包美國香煙，二千美金一只汽車胎，八千美金一只無線電，一千五百美金一只瑞士製的手錶。

面對着這高漲的物價，伊朗政府的官員們祇是舉一舉雙手，表示毫無辦法，此外則並不採取任何有効的措置。

這一切情形，當然是我們到達這個首都數天之後才知道的。我們到達的那一個早晨，化了差不多整

整一小時設法找一部軍車到機場來接我們，一方面則懶洋洋地觀察我們飛機所降落的那個機場——機場上停留着好幾排租借法案所交付的P—39式飛機，上面新漆着鮮豔的紅星——軍車來了以後，我們又化了整整一小時在德黑蘭城內找尋我父親的住所。我去的第一個地方當然是美國公使館，可是到了那兒，他們却告訴我父親是住在蘇聯大使館內。父親之不住在美國公使館而住在蘇聯大使館，我後來知道，是有充份的理由的。最初，我父親拒絕了史大林私人的邀請，他拒絕的理由是：他認爲假如不受任何人的招待，他可以比較自由自主一點，同時，他事先已經拒絕了英國方面的邀請，假如他突然接受了蘇聯的邀請，他怕會因此得罪英國方面的。可是因爲許多便利上的以及安全上的關係，使他不得不最後接受了史大林的招待。美國公使館離開蘇聯大使館與英國大使館都十分遠；英蘇兩國大使館之間的距離却祇隔一條街。這個城市中毫無疑問地是密佈着軸心國的間諜——蘇聯的密探後來宣佈他們捕獲了好多個企圖行刺這三位巨頭的人犯——住居的安全因此是必須被考慮到的。哈立曼極力向父親指明，假如英蘇的官員或是將領們在到美國公使館的途中發生了什麼意外，父親自己也會感覺到多少有點責任的。

蘇聯方面的確想盡了辦法使父親能十分舒適地住在他們的大使館內：史大林自己退居到大使館內次要的屋子裏去住，把那座主要的大廈讓給我父親；美國海軍的優秀的廚子與侍役也全班跟了來，像在開羅一樣招顧我父親的伙食。此外，住在那兒也的確有眞正的便利，我父親住的那一套房間開出門來 就是大使館的會議室，一切的全體會議都在那兒舉行。

那個星期一的早晨，我到十一點以後才終算見到了父親——而第一次知道他在爲我的遲遲不到而担

憂。

「難道你煩心的事還不够多嗎？還要會見史大林，還要開會，又何苦爲我的飛機的遲到而担憂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打了個長途電話到巴力斯坦去……」

最初艾森豪威爾是提議到巴力斯坦去遊覽兩天的；父親走了以後，他才臨時決定改變計劃，到勒夏哈去。

「我眞覺得非常抱歉。假如我們當時有辦法能打個電報給你……」

「尤其是當英國方面告訴我許多被迫降落在阿剌伯境內的人們的遭遇以後，我特別覺得担心，」父親說。

我問他是不是很忙，我可以暫時離開，以後再回來和他談。

「祇有華盛頓來的一些信要我批閱，此外就沒有什麼傍的事了，」他說。「坐下來談幾分鐘吧。」

我們是坐在他樓下的起居室中，房間樸素，舒適，佈置得很大方。窗外是美麗的花園。我陪他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昨晚的夜間飛行使我很疲倦，可是我却同時覺得興奮，急於想知道一些會議的情形：這個父親辛辛苦苦費了一年多時間所籌劃的會議現在終算實現了。

「他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爸？你見了他沒有？」

「史老伯伯？當然，我已經和他見了面。星期六晚上我要請他來吃晚飯，可是他送了個信來說他實

在太疲倦了，不能來。當昨天我搬來的時候，他來看了我一下。那是昨天下午的事。」

「就在這兒嗎？」

他笑了起來。「就在這張沙發上，伊利奧。史大林元帥就坐在你現在所坐的地方。」

「邱吉爾呢？」

「這是第一次會面，祇有史老伯伯和我。當然，還有他的翻譯，柏甫洛夫。」

我問他我們國務院的蘇聯通，却爾斯，鮑倫是否在場。

「人家是要我那麼做的，」父親微笑着說。「可是我的看法却不同，假如祇有他的翻譯在場，那眞表示我對他有絕對的信任，並且沒有絲毫懷疑。而事實上，這樣倒省了很多事。至少節省了時間。」

我點頭表示同意。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即使史大林對英美毫無懷疑。我們應該把一切放在非公式化的友誼與親密的基礎上。

「你們談了些什麼？」我問。「是不是機密的國家大事？」

「絕對不是，」父親說。「我們所談的祇是『您喜歡不喜歡這個住所呀？』『多謝您把這所大房子讓出來給我住』，『東戰場有什麼新的消息沒有？』（東戰場消息非常好；史大林是高興得不得了；他希望紅軍能够在我們回去以前越過波蘭國境。）儘談些這一類的應酬話。很有禮貌的寒喧。我不願意一見面馬上就開始談正經事。」

「先互相較量一下對方的尺寸，是不是？」

他皺起了眉頭。「我不願意這麼說。」

「我是開玩笑的。」

「我們是開始互相認識。我們想先看一下我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那麼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

「啊……他聲如洪鐘，說話沉着，似乎富於自信心，而對於自己有十分的把握，行動遲緩而穩健——總之，我得說他處處給人以威嚴的印象。」

「你喜歡他？」

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史大林那次坐了沒幾分鐘就走了，接着莫洛托夫來作公式的訪問，而在四點鐘三巨頭舉行他們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這一次，英國方面的代表又佔了最多數——一共是八位，由邱吉爾領頭；我們美國方面的代表是七位——父親，霍浦金斯，李海，金氏，提恩少將（我們的駐莫斯科武官），勞逸爾上尉與鮑倫；蘇聯方面的代表數最少——祇有史大林，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一位祕書，以及史大林的翻譯，柏甫洛夫。

「並且，」父親微笑着說，「我們把OVERLORD作戰計劃的副本給史大林看了。他看了一下，提出了一兩個問題，就接着問：『什麼時候？』」

我批評說這一次會議該是一次相當道地的會議，並且問馬歇爾和安諾德在會議中到那兒去了。父親告訴我說他們把信號攪亂了，而他們正在德黑蘭的城中。

「我相信我們可以合作下去，史大林和我，」父親說。「在今後的幾天中，以往的許多誤解與相互間的猜疑可以一掃而光——我希望因此可以一勞永逸。至於史大林和邱吉爾倆個人之間，則……」

「不很和諧，是不是？」

「我必須把我的工作分開，分頭來應付這倆個人。他們太不相同了。觀念，脾氣……」

父親告訴我前一天晚上他招待史大林，邱吉爾和他們高級外交顧問們的晚餐會，以及在晚餐以後，他們怎麼樣一起坐到十一點鐘，慢慢地討論政治，試探各人的意見；我父親認爲語言的隔膜祇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障礙，而史大林與邱吉爾之間的絕對相反的見解却是最大的障礙。邱吉爾對史大林的有一個頗富於人性的反應使我父親覺得十分有趣——邱吉爾在卡薩布蘭伽時經常穿一套藍色的服裝，而在開羅時則普通穿白色的衣服，可是這一次在德黑蘭，因爲看到史大林的軍服，他便也換上他自己的軍裝：高級皇家空軍將官的服裝。

我很想知道他們討論些怎麼樣的政治。

「討論一切我們所能想到的，」父親說。他們談到戰後的世界和平，足以維持這和平的三國的機構，並且同意任何的和平基礎必須建築在這三個國家的密切團結上，這三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國的相反的意見可以否決整個的重要議案。父親說關於這個單獨否決權還必須徹底討論，不過他表示他個人在大體上是擁護這個原則的，因爲他感覺到這三個國家在將來實在有繼續密切團結的必要。「並且我們還同意在必要的場合，我們可以用武力來維持和平，」他又說。「我們的主要的工作是在戰後的世界中，爲我

們之中的每一個國家劃定一個普遍安全區的疆域，這工作還必須我們去完成，但是我們已經開始動手做了。」

父親的祕書，李格頓中尉，從門口探進頭來，提醒我父親說華盛頓送來的信件必須早一點批閱好，於是我站起來預備退出。父親忽然把我叫了回來。

「喂，」他帶着勝利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你大概還沒有聽到星期六的運動比賽吧？」

「運動比賽？」我完全摸不着頭腦地問。

「陸軍對海軍。你當然參加陸軍那一方面的，是不是？請你交給我十塊錢。贏了配十三倍。」他向我伸出他的手來。

「我勸你還是多化些心機在國家大事上吧，」我說，一面把錢繳了出來。

在大廳的那一頭，我聽到說話的聲音從大使館的會議室中傳出來：美國，英國與蘇聯的參謀長官們在裏面熱烈地開會。我走出了屋子，想看一看院子裏的情形。院子裏到處全是蘇聯的衛兵，他們大部份是軍官，個個全是又高又大的漢子。起碼都有六尺二寸高。我兜了一個圈子，發現蘇聯大使館與英國大使館事實上由衛兵圍圍壁併合成一塊很大的圈地，週圍佈滿了警戒的人們，從他們的便服，我看出大部份是蘇聯的密探。他們每個人的衣服裏都偵得懷疑地鼓起一大塊；顯然地他們全都帶着重武器：史大林對於保護他的各人們的安全似乎是十分週密，一些不肯疏忽。

午餐以後，父親召見美國的參謀長們，聽他們報告當天上午會議的經過。他們的報告很簡短，很

零碎：在短短的十五分鐘之內，李海，馬歇爾和其他的幾位敍述當天上午的談話，主要地是關於OVERLORD的作戰的，它的時間，它的規模，與它的指揮。

當他們退出去和英蘇雙方的代表們繼續會談後，我回到我父親的跟前，很興奮地等待史大林與莫洛托夫按照約定的時刻來看我父親。蘇聯的代表們準時來到，一分鐘也不差。父親介紹我與他們認識。我們把椅子拉到父親的大沙發前面，我自己則退到後面坐下。

雖然事先人家告訴我史大林的身材很矮，我看到他還是不免覺得有些驚訝。我同時也覺得很高興，因爲他很和藹地招呼我，並且眼中閃耀着慈愛的光彩，使我不由自主地對他微笑。在他說話的時候——他先敬我父親與我各人一支俄國香煙，一頭是强烈的，濃黑的煙草，另一頭是兩吋長的硬紙捲成的煙咀——我對他有了一點新的發現：他的聲音固然安靜，深沉而有度量，他的身材固然矮小，可是他好像有一種强大無比的動力；在他的內心中似乎貯滿着廣大的忍耐力與剛毅的自信心。坐在他傍邊的是他的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灰色而沒有色彩，使我回憶起我的伯父梯奧陀、羅斯福。聽史大林的安靜的語句，看他的很快的，一下子掠過的微笑，我感覺到他的名字的意義中所包括的那種堅定性：鋼鐵。

在那次四十五分鐘的談話中，大部份是父親和他在說話。最初，我以全部的精神注意我們這位訪問者——留心察看他的紗製的軍服，剪裁縫衩得非常合式。可是過了不多久，我便開始聽他們的談話了：他們在討論遠東和中國，父親與蔣委員長已經討論過的一些問題。父親向他解釋蔣非常關切地想廢除英國在香港，上海與廣州的治外法權，蔣對於滿洲的關切，並且渴望蘇聯能夠尊重滿洲的國境。史大林說

明他的基本原則是要全世界承認蘇維埃聯邦的宗主權，而另一方面，他也是絕對尊重其他一切大小國家的宗主權的。父親又告訴史大林，他與蔣的關於其他問題的談話，說蔣答允在全國普選之前容納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而在戰爭勝利之後，蔣預備立刻實行全國普選。當父親的話被譯成俄文的時候，史大林一面聽一面不斷地點頭，他看來似乎是表示完全同意。

這次談話中他們所討論到的政策祇是這一點。其他的時間，他們祇是非常隨便而非公式地談着，一直到三點半，華生從門口探進頭來，報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站了起來，一起走進會議室。

他們所準備的是一個正式的贈獻典禮：邱吉爾將代表他的國王與英國的人民，贈獻給史大林一柄巨大的雙鋒的劍，向保衛史大林格勒的英勇的蘇聯男女公民表示敬意，因爲在那兒納粹攻勢的後背被他們永遠擊破，而納粹不可征服的這一個謊言被永遠地揭破了。

會議室中充滿了人：紅軍的軍官與英國的士兵所組成的榮譽禁衛隊，紅軍的樂隊，以及在對納粹作戰的這三個大國的陸海軍首腦們。當父親和我走進去的時候，史大林與邱吉爾已經在座：紅軍樂隊先奏蘇聯的國歌，然後奏英國的國歌。樂聲充塞在會議室中，從開着的窗戶中傳佈到外邊去；每個人的臉色都十分莊嚴。邱吉爾起立致詞：

「英國的國王喬治六世命令我把這柄榮譽的劍獻給你，轉贈給史大林格勒的城市，這柄劍的圖樣設計是英皇陛下所親自選定與認可了的。這柄榮譽的劍是英國的工匠們所鑄的，他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從事於鑄劍的技藝。這柄劍的劍身上刻着下列的詞句：『英皇喬治六世敬獻給史大林格勒的英勇而剛毅的市

民，以表達大英帝國人民之最深沉之敬意。』」

一位英國的低級軍官把那柄巨大的劍傳給邱吉爾。他接了過來，轉過身子，遞給史大林。在他的後面，紅軍的禁衛們沉靜地站着，可是他們却不是完全沒有表情的。他們的盒子砲橫在他們的胸前，他們看他們的大元帥把劍從邱吉爾手上接過來，看了一下，然後舉到唇邊，吻了一下劍柄。他很艱重地嚥了一口吐沫。他的答覆由翻譯譯成英文：

「我代表史大林格勒的市民，對英皇喬治六世的這一件禮物表示深切的感謝。史大林格勒的市民將十分寶重這件禮物，我請求你，總理大臣先生，把他們的謝意轉達給英王陛下。」

沉默了一會兒，史大林很莊重地繞着桌子走到我父親所坐的位子前面，把劍交給我父親看。邱吉爾拿住劍鞘，父親從容地拔出這五十英寸長的鋼劍。他把劍朝天舉直，我正站在父親的後面，劍鋒的光芒照耀住我的眼睛。他的雙手和巨大的劍柄相比，顯得甚爲微小。這個劍柄之長足够四只手抱住。從一個帝國，一個國王由他的保守派的總理大臣送來一件英國的工匠們所鍛鑄的禮物，這些工匠們，從他們的技藝來講，也可以算是封建的貴族，從事於一種貴族式的，中世紀的職業。現在這件禮物却是送給一個皮鞋匠的兒子，一個共產黨員，普羅階級的獨裁政權的領袖——他站在一傍毫無表情地看這位世界上最大的兵工生產國家的領袖把這柄劍直舉起來。

「他們的確是有着鋼鐵一般的心，」父親喃喃地說。

他把劍插進了劍鞘。展示他們最大的團結的時刻已經過去，而邱吉爾與史大林退出會議室，走到大

使館的門前，在那兒和我父親一起攝影。

他們坐在安放在門口六根大柱中間的椅子上。在他們的後面圍着他們的部長，大使，將軍與元帥。在他們的前面，有的攝影師跪着，有的蹲着，有的俯伏在活動攝影機的三脚架上，或是跑前跑後地想找一個較好的角度。主要的代表們又聚攏了合照一張集體照，邱吉爾的女兒穿着她的女空軍隊員的制服也夾在裏面。當她被介紹與史大林見面的時候，攝影的工作暫時停止，而史大林禮貌十足地站了起來，彎下身子吻她的手。十五分鐘之內，攝影的工作很快地完成。他們又走進屋子繼續他們的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美方代表十二人，英方代表十一人，而蘇聯的代表祇有五人。他們討論了一共有三個多鐘頭。從五點直到七點，我在父親的房內等他回來，而利用等待的時間，我十分舒適地睡了一覺。終於在七點一刻的時候，父親回到他的房中，把我搖醒，這時候他自己也覺得十分疲倦了。

「我得馬上換衣服去吃晚飯，」他發着牢騷。「我眞想在去以前能睡一覺，休息一下。」

「那麼你爲什麼不睡呢？」

「你知道我固然十分疲倦了，但是我的精神却依然十分緊張。」

「喝杯酒能好一點嗎？」

「現在不喝，謝謝你。我想等一等，或許在換衣服以前我想喝一杯鷄尾酒。現在我祇想能躺一躺。」他又添了一句，「今天晚上是史大林做主人；那就是說我們得吃一頓俄國式的晚餐；而假如我們的國務院給我的情報並沒有錯誤，那麼晚餐時候眞不知要有多少次的乾杯！」

他閉上他的眼睛，可却沒有睡；一會兒他舉起他的雙手摩擦他的眼睛，把眼鏡推了上去；接着他就嘆了一口氣，伸手拿了我的一支香煙點上。

「他眞是有能力辦事的，那個人。他永遠不放鬆他的目標。」父親遲慢地，帶着思索的神情講。「和他一起工作是件快事。他絕不往叉路走。他先提出他所要討論的題目的輪廓，然後抓緊了這個題目不放。」

「是不是OVERLORD的作戰計劃？」

「那就是他討論到的。也就是我們所討論的。」

「英國方面還始終表示異議，是不是？」

「這……現在邱吉爾提議在同時從兩方面發動作戰。我猜他已經明白現在是沒法再反對這西歐的侵入戰了。馬歇爾現在每逢邱吉爾反對這個作戰計劃的時候，總是瞪着兩個眼睛望着他，表示不信任他自己的耳朵似的。」父親大聲地笑了起來，追想着當時的情景。「假如說有一個美國的將軍使邱吉爾覺得沒法應付的話，那就是馬歇爾了。而這當然是因爲馬歇爾是始終對的。我希望有一天每一個美國人都能覺悟到他應該怎麼樣地來謝謝馬歇爾。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沒有一個人！」

「邱吉爾所說的兩方面作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爸？」

「一方面從西歐攻擊，而另一方面你猜是那兒？」

「巴爾幹？」

「對了。」他笑了一下，當他又回想到當天下午的會議。他用一支手臂支起他的上半身，一面望着我，一面說：「你知道，伊利奧，從某一個觀點看來，這些全體會議直是奧妙得很。當邱吉爾爲他的巴爾幹侵入戰辯護的時候，屋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明白他的眞正的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切入中歐，使紅軍無法進入奧大利和羅馬尼亞，假如可能的話，甚至匈牙利也不讓紅軍進入。史大林知道這一點，我知道這一點，而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而他自己決不會講出來？」

「當然不會講的。而史老伯伯，當他辯說從西方侵入歐洲的許多有利的地方，以及把我們的部隊分散在兩方面的許多不利——我相信他也一定是在想到許多政治上的意義。當然，他是決不會親口說出來的。」

「我想不見得……」我開始遲疑地說。

「什麼？」

「我的意思是，邱吉爾……他不是……」

「你在懷疑他的意見或許是正確的？而我們或許是應該攻打巴爾幹的？」

「這……」

「伊利奧，我們的參謀長們祇有一個信念。他們相信以最小的犧牲來殲滅最多的敵人的唯一的辦法是發動一個大規模的侵入戰，然後以我們全部的力量撲過去。我覺得這辦法很有道理。而史大林也是如

此想。我們的全體將領也都有同樣的感覺，我相信從戰爭的開始起，甚至在戰爭開始以前，他們都始終是這麼想的。自從我們的作戰企劃局開始研究我們的作戰計劃的時候，這意見便存在了。紅軍的將領也認爲這是個好辦法。這是結束戰爭，獲得勝利的最敏捷的辦法。

「問題是在邱吉爾太關心戰後的世界與英國的地位了。他怕蘇聯變得太强大。

「蘇聯可能在歐洲變得很强大。不過這究竟有什麼壞處是必須看其他的許多因素來決定的。

「我所相信的祇有一點：假如減少美國士兵犧牲與迅速獲得勝利的唯一的辦法是從西歐，單獨從西歐發動攻勢，而無須再在巴爾幹的山地消耗登陸艇，人員與物資，而假如我們的參謀長們也認爲這是唯一的辦法，那麼，我沒有什麼話好講，我祇有表示完全贊同！」他微笑了一下，不過頗帶着一些峻嚴的神情。「我覺得我們並無理由來多犧牲些美國兵的性命去保護大英帝國在歐洲大陸上的眞正的與假想的利益。我們是在戰爭中，我們的唯一的工作是避免冒險的行爲，以最快的方法來爭取勝利。我想——我希望——他知道我們的意思是這一次勝利將是最後的，永久的勝利。」他又閉上他的眼睛，而四圍是一片寂靜，祇有的達的鐘聲，這鐘聲使我想到時間已經不早了。

「去洗個澡吧，爸？」

「是不是時間到了？哦，天呀！……請你給我叫亞瑟進來。並且爲我調製一杯你方才提到的鷄尾酒……」

「照老方法做？」

「不過要做得淡一點，伊利奧。別忘了晚飯時我還得要對付那許多次乾杯呀！」

那天晚上的晚餐會在與會議室相連通的餐廳內舉行。史大林元帥除父親與邱吉爾之外，邀請了艾登，莫洛托夫，哈立曼，霍浦金斯，卡爾以及担任翻譯任務的鮑倫，貝萊茲霍甫，與勃斯少校。我並沒有被邀請，可是在上第一道菜的時候，站在史大林背後的一位密探窺見我從一座側門傍走過，他低下頭來在史大林的耳傍低低地說了幾句話。我可以看到史大林抬起頭來，朝我的方向看，我迅速而有些狼狽地往後退下去；可是他立刻站了起來，親自跑到我的身邊。用種種的手勢，他明顯地表示他希望我也能參加這一個宴會；一位翻譯跟上來用英語說明他的誠意的邀請，向我解釋史大林並不知道他的祕書忘了請我。他很堅決地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進了餐廳，而在艾登與哈立曼之間他們為我安排出一個位置。

我不得不坐下來，參加我第一次的俄國風味的盛讌。而下面的一切故事當然是絕對眞實的。

酒當然是喝的伏特加酒，不過幸而此外還有一種白澄的葡萄酒，淡而乾澀，以及一種俄國香檳酒，我覺這味道還不壞。我之所以用「幸而」這兩個字是因為在晚餐時說一句話都得喝一杯酒；這說來似乎有些語病。事實上，我們唯一的談話的方法是通過乾杯的形式。這種談話的方式似乎是頗為麻煩，但是假如你的酒量很好的話，那會變得很有趣，很好玩的。因此，假如你想談到關於天氣這樣一個乏味的題目，你得說：

「我提議為這美麗而晴朗的天氣而乾杯！」於是你得站起來把杯子舉起來，而每個人都得照樣站起

來，大家把杯中的酒一氣喝完。這簡直成了一種公式的制度。而這種方式也同樣可以適用到政治方面：「我提議乾杯，」一個俄國人會這麼叫道，「爲你們將來租借物資的交付，而我們相信這些物資在將來也一定會如期交付，絕不遲到，正如往常一樣！」大家都站起來，喝乾杯中的酒，又坐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伏特加可能變成你最壞的朋友；可是我注意到史大林在晚餐時間始終喝着伏特加，他每次從他傍邊的自己獨用的瓶子中把酒滿滿地斟在他的杯子裏。瓶子裏的絕不是水；因爲有一次他拿着那瓶子走到我的面前，爲我斟酒。任何一種酒都行，祇要它的火酒含有量不超過一百標準度，可是這種强烈的伏特加我却無論如何不敢領教。那天晚上，我始終祇喝香檳酒，感覺到美國的榮譽已經受到威脅了。

菜一道接一道地上來，多得無從計數。關於俄國的晚餐中菜目之繁多我有我獨特的原理：菜多的原因是因爲你根本沒有時間來吃菜；你差不多每分鐘都得站起來，說幾句……不，我的意思是：乾杯。晚飯吃到一半的時候，霍浦金斯站起來向主人道歉，先行退席，他在晚餐開始的時候就覺得有些不舒適，屢次的乾杯以後，更覺得支持不住了。這是美國方面的第一次脫退。嚴肅地——而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有了些歡樂的神情——我們其餘的人們留在我們酒杯傍的崗位上。

在晚餐快要完畢的時候，史大林站起來提議他的不知第幾次的乾杯——最初我預備計算一下乾杯的次數，可是後來乾杯之多使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了——乾杯的題目是關於納粹的戰犯。他所講的詳細的字句我是沒法記得了，不過大體的意思是：

「我提議大家乾杯，爲了我們將來對付納粹戰犯的最迅速的裁判——在槍決隊之前的裁判。我希望

我們以一致的行動把我們俘虜來的戰犯儘快地集中起來，然後把他們一起槍決，而他們的數目最少必須湊足五萬人。」

閃電一樣快地邱吉爾站了起來。（邱吉爾那天晚上始終以他心愛的白蘭地酒來乾杯的；他的每晚不斷的喝白蘭地酒當補品的習慣應該使他很適合於這種俄國式的談話；可是那天晚上即使是像他那樣驚人的大酒鬼也不免覺得說話時舌頭有些大了。）他的臉與他的頸子全紅了。

「這一類的態度，」他叫道，「是完全違反我們英國人的裁判觀念的！英國人永遠不會贊成這種大規模的屠殺。我借這個機會來聲明我堅決地主張任何一個人，不論是納粹與否，我們絕不能以對付全體的方法在槍決隊之前把他處決，即使這個人有許多對他不利的既知的事實與確實的證據，我們還是必須通過合法的公審制度來裁判他！」

我看了史大林一眼：他似乎覺得有些忍不住要笑出來，可是他的臉色還是保持着莊重的神情；祇不過是他的眼睛中閃耀着靈活的光彩，當他接受邱吉爾的挑釁，以邱吉爾爲對象，很溫和地刺戳他的論點，好像是絲毫不在乎邱吉爾是已經完全在冒火了。最後，史大林回過頭來問我父親的意見。父親，始終忍住他的微笑，可是這時候也覺得雙方惡感的成份已在開始强調起來，而他認爲必須以一些詼諧與幽默來緩和一下這緊張的空氣。

「像往常一樣，」他說，「這一次的爭辯似乎又應該由我來仲裁。很明顯地，在你，史大林先生，與我的好朋友邱吉爾先生之間必須找出一種妥協的方法來。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與其是總括地槍決五

萬個納粹戰犯，我們不如把數目減少一點。說四萬九千五百個好不好？」

美國人和俄國人都笑了。英國人，模倣他們的開始狂怒的總理大臣，都一言不發地板起臉孔坐着。史大林，似乎估了上風，以我父親提出的妥協的數目爲主題，追問其他每個人的意見以及他們認爲可以同意的新數目。英國人都很小心：他們說，這個題目應該，並且值得好好地研究一番。在另一方面，美國人則採取比較詼諧與輕鬆的態度：管他呢，幹了再說——我們離開德國與納粹的征服還不知有多遠，有多久呢。我希望史大林能夠滿足於這些早先的答覆，而在輪到我以前改變一下他的話題，可是他是一個固執的，有始有終的人。他終於問到我的頭上了。多少有些勉强而不穩定地，我站了起來。

「這個，」我說，深深地呼一口氣，想通過香檳酒的泡沫敏速地運用我的思想。「這個問題整個兒就有些太像學院中的論調了，瞧，當我們的軍隊開始從西方推進，而你們的軍隊從東方壓過來，在我們的夾攻之下，這整個的問題不就自然解決了嗎？俄國，美國與英國的士兵將在戰場上把這五萬人的問題給解決個乾淨，而我希望不僅是這五萬個戰犯，還有成千成萬的其他納粹們也將遭遇到同樣的命運。」於是我預備坐下。

可是史大林滿面都是快樂的笑容。他繞着桌子走了過來，伸出他的手臂來抱住我的肩膀。這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回答！應該乾杯祝我健康！我心裏充滿着歡喜，預備喝乾我杯中　酒（按照俄國的習慣，當傍人提議爲某一個人的健康而乾杯的時候，這個人自己也該陪着喝酒），忽然間我看見有人伸出他憤怒的手指，就在我鼻前揮動着。

「你是不是想破壞盟國間的關係？你知道你自己在說些什麼？你怎麼居然敢說出這種話來？」那是邱吉爾——他滿臉都是怒氣，一些兒也不假。突然間發現邱吉爾與史大林倆個人就在我頭傍爭吵起來，我不免感到有些恐慌，覺得自己活像是在一個慶祝茶會中被海脫與三月兔所包圍住的奇鄉漫遊記中的阿麗思。我坐了下來，一語不發，僵直在不安與担憂的心情中。

幸而這個晚餐會不多一會兒就散了，我跟着我父親走回到他的臥室中，向他謝罪。總之，我破壞了盟國之間的關係！

父親大聲地笑了起來。「不準再去想這個問題了，」他堅持着說。「你一點也沒有說錯話。你並且說得很好。因爲每個人都不願意認眞地討論這個問題，所以邱吉爾發起脾氣來了。史老伯伯……祇是一味地刺他，挖苦他，因此無論誰說什麼話都會使他不快，得罪他，尤其是假如誰說的話使史大林喜歡。用不着担心的，伊利奧。」

「因爲你知道……我是絕對不願意……」

「不要再去想到這個問題了，」父親說，他又大聲地笑了起來。「邱吉爾明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就會忘掉這一切的。」

可是我並不覺得他後來忘記這一件事。當我後來駐紮在英國的這許多個月中，他就從不會再請我到他的別墅中去住一夜。顯然地邱吉爾先生是永遠不肯忘記的。

而在那一個事件以後，我更佩服我父親的能力了，他居然能始終設法使這兩個人的思想湊合在一個

建設性的，大致相同的方向之中。他的這種工作我是永遠不敢希冀的。

第二天是邱吉爾的誕辰——他的六十九歲的誕辰——晚上英國大使館要爲他舉行一個盛大的讌會來慶祝。因此，父親一早就在查看那些爲他的便利送到蘇聯大使館來的許多交易的商品，預備挑選出一兩件適當的禮物送給邱吉爾。我們的波斯灣總司令孔諾萊少將設法弄來了一大堆波斯的土產品，從許多刀，劍與地毯裏父親檢了一個頗有古董價值的古碗。接着他就回到他的住室中去接見穆罕默特·萊爾·派萊維，年青的波斯王，他是來作公式的訪問的。陪他一起來的是他的總理大臣，他的外務大臣與胡賽思·阿拉，他的皇室樞密大臣。我聽說這位年青的國王是個很愛玩的青年；可是這一次他却顯得非常懇切，嚴肅而熱誠。他帶來了一件禮物，由父親代我母親收下，是一條非常漂亮的地毯。不久，他們就拋棄這些公文上的禮節，坐下來很隨便地談了起來。

每逢這種場合，父親總是很有興趣地想多知道一些關於這個國家的事情，刺探一些足以幫助解決這個國家中許多問題的見解。他與這些伊朗的大臣們討論形成這國家大部份領土的荒瘠的沙漠；他們告訴他，在好多世紀以前，他們的國土中是怎麼樣密佈着樹木，而後來怎麼樣變成了一片沙土的盆地。這是我父親的一個熟悉的問題；他帶着感情很熱烈地談到一個巨大的植林計劃；接着又把談話的中心轉移到這個國土中大多數的人民的貧苦的境況；他又把這兩個話題結合在一起；而最後由他的客人們向他指明英國在伊朗的油井與礦藏方面所掌握的經濟權。父親很同情地點頭，並且同意必須採取新的步驟來保護

伊朗的天然富源。而當他們走了以後，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跟前。

「我想請你爲我辦一件事，伊利奧。你給我去找赫爾利來，並且告訴他開始草擬一部備忘錄的底稿，保障伊朗的獨立與關於它經濟權益的自決權。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接見他，不過你留心着，給我找出個時間來，看我閑着的時候，把他帶進來見我。關於這個問題我要和他多談談。」

我沒法在午飯以前找到赫爾利將軍，午飯的時候，父親是主人，招待史大林，邱吉爾以及他們各自的翻譯，可是當他們走了以後，我把赫爾利帶進我父親的房間，談了幾分鐘。父親向他解釋他需要的是什麼；赫爾利簡短地說他已經懂得他的意思就走了。

「我們十分需要像他這樣的人，」當他走了以後，父親批評說。「我希望你能在他傍邊多幫他一點忙。草擬一份英蘇協定，保障伊朗的宗主權與政治獨立……這正可以表示我們究竟能幹些什麼，而可以作爲將來的一個好例子。我希望我能多有一些像赫爾利這樣的人物，我可以放心把事情交給他們辦理。國務院裏的那些傢伙，那些所謂職業外交家們……我差不多時常都在懷疑他們究竟靠得住，還是靠不住。」

美國，英國和蘇聯的參謀長們的最後一次會議定在當天下午四點鐘舉行，父親，邱吉爾與史大林都出席。當他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在外面陽台上站了幾分鐘，從這個陽台上，可以看到那間中間放着大圓桌的會議室，在陽台的週圍，俄國的禁衛軍官們不斷地來回巡視着，沉靜而富於警戒心。下面，在我的眼前，是我們的團結的努力與集體的力量的明證：參加上次全體會議的那同樣的十二個美國人，十一個

英國人與五個俄國人在安靜而有力地談着，承力使他們各人的論點能够接近，以求獲得最後的協定。

當他們在六點十五分散會以後，我又回到我父親的眼前，他預備在去參加邱吉爾的誕辰讌會以前，略爲休憩一下。

「終算有了最後的決定，」父親很快樂地說。「並且，」他又很苦澀地加了一句，「這可以說是第四次了。現在侵入西歐的計劃終算確定了。連日期也定了。」

「明年春天？」我問他。

「五月一號。這對於俄國人是一個好日子：那是他們的大日子，你知道。」父親現在覺得完全放心了，因爲他所希望的與所計劃的最後決定已經達到，而盟國的集體總攻擊的規模與時間也終於決定了。祇有總指揮人選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可是父親與邱吉爾答允史　林這一項最後的細目也將在最近的將來決定——他們的意思是說在兩星期之內，可能的話，將在他們第二次離開開羅之前決定。

「同時，我們亦同意從地中海方面發動一個攻擊戰，」父親說。

「結果還是要通過巴爾幹？」我詫異地問。

「不。通過法國的南部。各方面的攻擊都要同時發動——從西方，從南方，而蘇聯則從東方。我還是認爲在一九四四年的年底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戰爭的結束。假如我們從各方面同時配合着來一個總攻擊，我們誰都不相信納粹能够抵擋得住的，最多九個月之內他們是非垮台不可的。」

八點過後不久，父親穿起夜禮服，手裏拿着那只預備送給邱吉爾作誕辰禮物的波斯古碗，從蘇聯大使館到英國大使館去，夜晚的空氣十分涼爽，在白着頭巾的印度士兵的保衛之下，我們繞過滿滿着百合花瓣的水池。這次的讌會是我們在德黑蘭時期內最盛大的一次社交集會，地點是在英國大使館的接待室內。在一大堆顯赫的人物之中，我發現雷道爾夫·邱吉爾也出現在他父親的侍從之中。我們向邱吉爾道賀他的誕辰；他那晚一臉是興高彩烈的神氣，閃耀着快樂的光輝，不斷地微笑，抽着他的雪茄。父親贈給他那只古碗，並且向他說：「願我們長久在一起。」空氣中震盪着盛滿鷄尾酒的玻璃杯相碰的響聲以及友好的談話聲。不久史大林到了，和他一起來的是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羅夫，在後面則跟着他的翻譯貝萊茲珂夫；他喝了兩杯鷄尾酒後我們就全體走進餐廳，開始晚餐——跟在邱吉爾，父親與史大林後面的一共是三十位元帥，將軍，海軍提督，大使，部長，外交家以及次要的官員——還有那次議會中唯一的貴婦人，撒拉·奧利佛。

關於昨晚的晚餐會，父親後來曾經帶着玩笑的口吻說晚餐時大家一共乾杯了三百六十五次——爲一年中的每一天乾杯一次。在邱吉爾的誕辰讌會中，大家又採用俄國的習慣——每個人爲其他一個人乾杯，乾杯次數之多又使我無法作正確之統計。不過我記得晚餐中大部份時間我們是站着的；我記得史大林的與每一個被乾杯的人碰杯的快樂的習慣；我記得好幾次乾杯的祝詞。

史大林：「爲我的戰友邱吉爾！」接着是，「爲我的戰友羅斯福！」

邱吉爾：「偉大的史大林！」與「羅斯福大總統——我的好友！」

而父親：「爲我們的團結——戰爭與和平！」

每次乾杯我們都得站起來，而有幾次我們站起來以後，乾脆就不坐下去了，站着與傍邊的人談話；我記得有一次在兩次乾杯之間，我聽雷道爾夫·邱吉爾發表他的高論，內容似乎是非常重要，可是我記不起他說些什麼。最後，當友誼與歡樂之神在向我們點首的時候，勃魯克將軍突然地站了起來，敍述英國人民怎麼樣在戰爭中比其他的人民遭受到更大的苦難，更多的犧牲，他們對戰爭以及勝利也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貢獻；這時候我看到一絲憤怒的陰影掠過史大林的臉上。我覺得似乎就在這個時候，史大林被激怒了，當勃魯克將軍講完了，他差不多跟着就站了起來。

「我要告訴你們，從蘇聯的觀點，大總統與美國對戰爭與勝利的偉大的貢獻。在這次戰爭中最最重要的是機器。美國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它能夠每月生產從八千到一萬架飛機。英國每個月祇能生產三千架，而主要的祇是重轟炸機。因此，美國是一個機器的國家。假如沒有租借法案使我們能運用這些機器，我們是會失敗的。」

父親站起來，對巨大的紅軍表示敬意，說他們運用了這些機器，並且，當我吃這頓晚飯的時候，他們正在一步步地把納粹的機器趕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土中。

我決定在第二天離開德黑蘭，飛回我在突尼斯的防地。在我離開之前，我和父親與赫爾利在一起躭了一會兒，校閱赫爾利——在我的無關緊要的幫助之下——所草擬的一部關於伊朗的三國宣言。假如英

蘇兩國對於裏面的條件能够協調，這個協定將於當天的下午簽字。父親研究了一下這協定的草稿，點頭表示贊可，然後抬起頭來望着赫爾利。

「你的還有一顆星呢？」他說。

「總統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赫爾利驚訝地問。

「你的另外一顆星，」父親重複地說。「你已經晉級了。國會已經通過。難道還沒有人通知你嗎？你現在是少將了！」

在午飯以前，我向父親道別。他原先計劃在德黑蘭住到星期五，但是據氣象專家們的報告，目前正有一股寒流通過開羅，而這寒流很可能在星期五左右漫佈到這一帶的山岳中。因此父親要求英蘇兩國改動他們的會議計劃，使他們能够當天晚上就走。假如可能的話，他希望在他回到開羅之前能够至少訪問兩個我們在伊朗的軍事營地。他告訴我當天午飯之後他得與邱吉爾和史大林作差不多整整十小時的政治討論。那將是一件十分艱重的工作，尤其是在二十一天的旅行與會議之後，他已經流露出疲乏的徵象。

「我不知道我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在開羅再會到你，爸，」我說。「或許即使我想來看你，也辦不到了。」

「想辦法到開羅去一下，即使是一兩天也行。」

「假如我不去的話，我恐怕可以在你歸國的途中在突尼斯見到你。那麼這不過是暫時的分別。希望

馬上就可以再看到你。」

格萊與克萊姆上士在機場等着我。當天晚上我們到達開羅，第二天晚上回到了突尼斯。

大總統旅行日誌中的記載：

父親在他所預言的整整十個小時的討論之後，於星期三晚上十點三十分離開德黑蘭，到埃爾勃魯士山脚下我們在阿密拉巴特的營地去過夜。第二天，對當地軍醫院中的病兵與營地中的工作人員作下列的即席講演：

「在以往的四天之內，我和史大林元帥與邱吉爾總理舉行多次會議——非常成功的會議——我們議定了三國軍事合作的計劃，希望儘量迅速地獲得最後勝利，而我相信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

「會議的另一個目的是討論戰時的世界局勢——爲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計劃一個新的世界，使戰爭不再是必要的。在這一方面我們也有了很大的進展……

「因此我現在是在歸國的途中。我希望我能够把你們全體都帶回去……」

他的飛機在巴格達低飛繞了個圈子。星期四下午三點以後他回到開羅柯克大使的別墅中。那天早晨，關於第一次開羅會議的政府公報正式發表。

八　開羅會議（二）

使我離開德黑蘭回到突尼斯去的任務是結束我們在拉瑪薩的後方司令部，而向北遷移到意大利去。我的部隊中二千八百人的最後一批在週末動身出發，因此我得以分出身子來再度飛回開羅作一次簡短的訪問。我知道聯合參謀長會議於四五天前我父親從德黑蘭回來以後即刻重新舉行。而我也知道父親和邱吉爾計劃邀請土耳其的總統，伊斯墨脫，伊諾奴到開羅來商談。

在突尼斯，我得到了一個與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簡短談話的機會；他還是在扭憂着他可能被派回到潘太剛去担任辦公廳的工作；關於 OVERLORD 的總指揮人選的最後決定他和傍人一樣地無知。OVERLORD 這部作戰計劃是確實地被決定了，而蘇聯方面已經與我們採取同一步驟，反對在地中海戰區推動新的戰事，並且也不贊成把土耳其牽入戰爭，關於這兩點我當時能够比較有把握地告訴他。

十二月五日，星期天的早晨，我起飛向開羅出發，格萊與我同行，在當天傍晚我們又降落在開羅空軍總部的機場上。我知道我父親一定還是住在老地方，因此下機後我立刻駕車到柯克大使的別墅。一進門我便碰到鮑梯格。他告訴我邱吉爾與父親之間有過一度很有趣的外交上的競爭；他們倆個人都派了飛機到土耳其的亞達納去接伊諾奴總統到開羅來；鮑梯格是我父親的專使，而他勝利了。土耳其總統之不

坐英國飛機，而坐美國軍用飛機到開羅來究竟有什麼重要性似乎沒人能講得出來，但是鮑梯格却因此感覺到十分得意而歡喜。

我去看我父親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看偵探小說。他忙碌了一整天，他先參加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然後與伊諾奴，邱吉爾與他們的顧問們作兩小時的談話，最後又出席美國聯合參謀長的會議。前一晚他爲伊諾奴舉行了一個晚餐會；那個星期日晚上，邱吉爾也預備舉行一個同樣的讌會，而父親也將去參加。現在他正在休息，可是看我去了以後，他把書放下來和我談天。他告訴我他原先計劃在星期日深夜離開開羅的，可是還有許多未了的公事，使他不得不在開羅住到星期二上午。

「我眞想回家了，」他說，大聲地笑了起來。「離開家還祇不到一個月！我眞應該爲那些自從珍珠港事件後就不曾回過家的士兵們想一想。」

「可是看來眞不像是祇有一個月。」

「是的，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最後的一個星期。」

我問起他在德黑蘭最後一天的事情。

「你看到我們三方同意的那張公報沒有？」他問我，我搖頭表示後有看過，於是他向桌子上的一堆紙指了一指。最上面的幾張是那公報的副本，我拿起來很快地讀了一遍，後來父親陸續發表他的意見。我則重新慢慢地瀏覽着。他說那裏面主要地是他所說的話，而他故意不採用那些通常的，拘謹的外交的字句；「……驅逐戰爭，使我們好多代不再受它的威脅，」我一面用手指着紙上的這些字句，一面大聲

地讀出來。「好多代，」我說。「爲什麼不用『永久』這兩個字呢？」

「在我們這兩代中已經有了兩次戰爭，」父親回答我。「在以往的二十五年之中，世界的人民不知聽到了多少次『永久』和平的諾言。我們這一次在德黑蘭同意我們這三個國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個國家，會以更聰明的方法來解決將來我們之間的不和的，我們也就可以因此統一起我們的外交政策，以保障我們好多代之中不再有戰爭。那就是我們談論的主題，從中午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怎麼樣統一我們三國的政策，怎麼樣爲全世界一般的安全而聯結起我們單獨的國家利益。

「在會議的休息時期內，我與史老伯伯談了一會兒，祇有我們倆個人。」他很舒服地伸了個懶腰，嘆了口氣，似乎預備放棄這個話題。顯然地，在這樣一個重要關頭，我是絕不會讓他停嘴不講下去的。而他從我臉上看出了我的這一種神情。於是他又接了下去：「還有好些關於遠東局勢的其他的問題我想跟他談一下……你也在那兒呀，是不是，當我們開始談到遠東問題的時候？」

「第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

「對了。我們，」他打了個呵欠，停頓了一下。「我們還有好多事情必須同意，一旦他答允了參加對日戰爭，我就……」

「什麼？」

「當然。他談到了太平洋的戰事……啊，那個時 你一定也還在德黑蘭呀。」

「可是，這麼了不得的一個消息！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他笑了一下。「像紋身的女子在結婚之夜所說的，你自己沒問我呀。」

「他們什麼時候參加，還有多久？」

「喔，總之還有好幾個月呢。我想他之願意對日參戰並且開始在遠東的戰鬥無非是想使我們決定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假如我們能答應他在五月一日發動西歐侵入戰，他願意在他的主力部隊調到西伯利亞之後即刻對 作戰。可是，從軍事觀點來看，我們覺得蘇聯應該以全力在東戰場對付希特勒。在希特勒打敗後，他們打日本的時間還充裕得很呢。」

這驚人的消息使我啞口無言，半響說不出話來。

「因此，」父親接下去說，「他同意祇要他把給養與部隊調到西伯利亞去以後——通過那兒唯一的鐵路——他就立刻對日本宣戰。他也提到了時間問題：希特勒打敗以後六個月。

「由於這種種的關係，我有好多問題必須和他親自談一下：關於戰後的中國，中國的共產黨等等。我不能當着邱吉爾的面談這些問題的，因爲很多問題會關聯到英國在香港，上海，廣州等地的治外法權的……我告訴他蔣答應我組織一個眞正的民主政府，假如我們能支持他反對英國的這些在華特權；我告訴他蔣很担心蘇聯將來在滿洲的行動……不過我想他現在總可以多少放心了一點。史太林同意滿洲應該屬於中國，並且願意幫助我們來反對英國的這些特權……現在赫爾利已經到莫斯科去繼續這一方面的談判了。」

這使我想到我 經爲那個關於伊朗的未來的三國協定的草擬與談判化了點小氣力。我問我父親那個

協定最後是否簽了字。

「喔，是的。簽了字，封了起來，並且交給了伊朗政府。我還得謝謝你的幫助。那個赫爾利……」父親帶着回憶的神情說。「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假如說有一個人能夠清理中國國內政治的糾紛，那就是他。你知道，伊利奧，」他說，掀起被窩預備坐起來，「像赫爾利這一類的人物是非常可貴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是忠心耿耿的。我可以交給赫爾利辦許多我不敢交給國務院中任何人辦的事，因爲我能夠完全信任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想到把我父親牽進了一種他後來不得不設法脫身的境地中的那些國務院的人們。

「你知道，」父親說，「好多次國務院的人們都設法想把人家給我的電報信件隱藏起來，故意躭誤或是擱起來，因爲他們認爲有幾位這些職業外交家與我的想法不同。他們應該替邱吉爾工作。事實上，有很多次，他們的確是如此。不要去想到他們了；他們全都認爲美國實施外交政策的方法是先探明英國在幹些什麼，然後學他們的樣。這與他們的政見沒有關係，決不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問題，」父親說，帶着些惱怒的感情。「據我所知道，赫爾利以及其他爲我工作爲六七位都是徹頭徹尾的共和黨。可是他們知道他們的國家是在戰爭中，而他們都迫切地想盡他們所能爲國家做些事。於是他們就那麼做了。」亞瑟走了進來，幫我父親穿衣服。「六年以前，」父親說，「人家叫我肅清那個國務院。我們的國務院活像是英國的外交部。他們外交部中有一個常務次長。不論他的政府是保守黨也好，工黨也好，自由黨也好，他永遠是常務次長。政府的變換與他的職位毫無關係。他是常務的。我們的國務院就是如此。因

此，我們有像赫爾利這樣的人物，而他們所做的反比國務院的人們加倍地可貴。赫爾利唯一的缺點是我們必須先告訴他應該做些什麼。假如我們告訴了他，他就會去做。而他會忠實地，好好地做。他是絕對願意這樣做的。」他停住了，聽到他自己的激昂起來的聲音而笑了。「喂，」他說，「我是預備休息的。完全是你引我想到國務院中的那些穿細條褲子的孩子們的。」

我大聲地笑了起來，他問我爲什麼不換衣服一起去吃飯。我告訴他我並沒有被請，而即使我被請，我也不預備去的。「我實在太累了，爸。這幾天來我也工作得非常辛苦，昨晚我通宵沒睡。我預備就在這兒隨便吃點東西就去睡了。」

他狡美慕地望着我。「那麼你明天還在這裏？」

「是的。就是走也得到四五點鐘。」

第二天早晨當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關於土耳其參戰的問題已經有了最後的決定。反對土耳其參戰。

「從某一點的意義上看來，我猜這是邱吉爾最後一次的努力，想迫使盟國在南歐從地中海發動一個攻勢，」他說。

我問他蘇聯對這件事表示了什麼意見，他微笑了。

「他們與我完全同意。決不能把租借物資分給土耳其，史大林說，假如這會躭誤西戰場的戰事的話。今天下午我和邱吉爾預備草擬一個聲明來挽回一些土耳其的面子。報紙上爲它的準備加入盟國對德

宣戰也畢竟熱鬧了快一個月了。」

我搖了一下頭，想到史大林與我父親的圓滿的合作，想到我們之間的顯然的共通的利益。而當我說出我的思想的時候，父親批評說：

「最最重要的是向史大林闡明美國與英國之聯盟是並非想形成一個集團來對付蘇聯的。我想我們已經永遠把這個觀念消除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戰爭後唯一可以使我們功敗垂成的是假如這世界又分裂了，蘇聯與英美對立起來。這是我們目前的最大的工作，也將是我們明天的最大的工作：把握住我們自己，使我們繼續在蘇聯與英國之間作爲中間人，仲裁者。」

因爲我們在照着這條路線走，顯然地，美國便成爲了世界的領導者。我們的外交政策不再跟在英國的後面了：父親很成功地在會議桌上表示我們是絕不受我們的說英文的兄弟國所牽制的，而我們的任務是在將來的聯合國組織中，諧和與匯合帝國思想的英國與共產思想的蘇聯之間的相反的意見。在實踐上這是否能有什麼好的効果尚需待歷史來證明。可是我可以在這兒說，當我父親從德黑蘭回到開羅的時候，他充份地相信這樣做一定能有圓滿的效果，不僅能使這三個大國滿意，並且也能使世界上的一切小國感到滿足。

他離開了我以後，就去批閱從華盛頓送來的公文信件，這工作占去了他整整一上午的時間。中午的時候，史迪威來看我父親；那是他與史迪威的最後一面；他們在一起談了二十多分鐘，在這時期內，史迪威對蔣委員長的政策表示不滿，並且說蔣是在養精蓄銳，預備在戰後以全力對付共產黨。父親，因爲

心中在想他與蔣的協定，以及後來與史大林的協定，很少說話，祇勸史迪威儘他的力量把事情對付過去。很顯明地，父親在與史迪威談話的時候，心中是在想着些傍的事情；我個人的想法是他在心裏盤算着先行粉碎納粹的必要，而唯有在納粹消滅之後，他才能容許他自己考慮怎麼樣去解決美國統師部在中國所遭遇到的許多問題。

午飯的時候，邱吉爾與霍浦金斯是父親僅有的賓客，他們談話的範圍是那行將發表的關於土耳其總統訪問的公報。公報的措詞得十分的小心，因爲他們顧慮到土耳其與蘇聯之間的持續的敵對感情，而尤其是因爲邱吉爾曾經希望土耳其在這次戰爭中加入盟國。我們離開了餐桌以後，土耳其總統伊諾奴來了，不多一會兒，蘇聯駐土大使維諾格拉特夫代表史大林來參加會談。他們所草擬的公報中必須闡明土耳其政府的意見與美英蘇三國政府完全協調，雖然土耳其正如一般眼光敏捷的新聞記者們所預測，終究並沒有參戰。這樣的一個原則便產生了公報中的下列文句：「土耳其政府與美國合衆國及蘇維埃聯邦間之鞏固的友誼，」和「團結英國與土耳其之有力的聯盟。」

公報草成以後，大家站起來握手說再會。父親退到柯克別墅的後門的階段上，向一隊保護代表們開會的憲兵作即席訓話。我在屋子裏聽到說：

「……這一次當我們肅清敵人的時候，我們決心把他們徹底地肅清，使他們沒有能力再開始另一個戰爭……即使我們必須暫時用武力來維持和平，我們也準備這樣做的……」

他的聲音帶着快樂的調子；毫無問題地他是樂觀的，經歷了這好多天艱辛的會議與工作。

他講完了話以後，我又得和他暫時告別了；我急着想在夜蔭降落之前趕回到突尼斯去。我在他的身邊就到麥克阿瑟的總參謀長蘇石蘭將軍進來之前幾分鐘才走；在我和他單獨在一起的那幾分鐘之間，我知道他與邱吉爾的意見又分歧了，爲了另一個新的問題。他之談起這一點是因爲我在無意之中提到我在突尼斯見到艾森豪威爾，並且告訴他我說不定在第二天上午又可以見到他。

「代我問他一聲好，」父親說。「他不久就得担任起一件更艱巨的新的任務；可憐的傢伙，我一點也不羨慕他。」

可憐的艾森豪威爾，我想；結果，他還是得調回到潘太剛去坐辦公廳。

「這是不是公事，爸？假如我看到他或是勃乞的時候能不能告訴他？」

「這事還沒有絕對決定，伊利奧。可是很明顯地邱吉爾是決不贊成由馬歇爾來接收的。馬歇爾……並不是因爲他關於軍事問題與邱吉爾爭論得太多了，而是因爲他贏的次數太多了。這對於馬歇爾而將是一個很大的失望，我相信。」

我一下子猜不出我父親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艾森豪威爾不會回到潘太剛去的？」

「瞧目前的情形看來，有一件從來沒有人担任過的最最重大的野戰任務要他去接受。他回到潘太剛去幹什麼？」

在我到空軍總部的機場去預備起飛回突尼斯的途中，我想到了任命艾森豪威爾指揮 OVERLORD 戰役的決定，這任命現在看來是很可能會發表的了。當然，這對艾森豪威爾將是一個好消息，可是我却

在想到馬歇爾。從我從父親那兒聽到的一切，從沃根基開始一直到這次會議中我所聽到的，從全面戰爭的指導中，很顯明地馬歇爾的素質與才能是很特殊的，使他成爲一個最好的統帥——不論是在參謀本部抑或是在戰場上——他有超越常人的優秀的才具與修養來統率士兵，來領導戰爭，導會議。而——使他十分失望地——他似乎也具有了一種素質使他變成了邱吉爾的敵人。我記得父親在德黑蘭告訴我馬歇爾是能夠執拗地與邱吉爾爭辯，與邱吉爾對抗的唯一的美國將領。可是，我自己記得，能夠始終不屈不撓地與邱吉爾在一起工作的這種才能實在可以說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素質：而這一個素質，艾森豪威爾也曾經屢次表露過。在任何以英國爲基地的侵入戰中，這一種素質實在是最最重要不過的。

第二天下午，當父親的飛機在突尼斯的埃爾亞與依納降落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將軍，史巴茲將軍，勃乞和我都在機場等着接他與他的隨員。在我們坐着汽車從機場到卡太基的「白宮」的途中，他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與我與高彩烈地談說他當天的飛行。駕駛他的飛機的勃拉恩少校沿着海岸飛行，飛過納粹在蒙高茂萊之前退却的路線：父親清晰地看到了一連串的戰場；他從他的飛機中看到散佈在一千多英里的沙漠中的納粹北非兵團的飛機，坦克與卡車的遺骸。埃爾阿拉美恩之後是托布魯克，之後是貝加齊，的黎波里和斯發克司；父親興奮得不得了，好像是他親自指揮了英國的第八軍似地。

在父親到達卡太基之前的幾個鐘點內，我在忙碌着整頓晚飯時的伙食。我們是在父親的別墅中吃的晚飯，可是飯菜却全是士兵式的，不過我們多了兩個侍者而已。這兩個侍者是意大利俘虜。晚飯是慶祝

我的部隊中一位軍官，奧克拉霍馬市的大衞·勃魯克斯之晉升爲少校的。我懷疑是否有其他的年青軍官有過這樣的貴賓在場慶祝他的晉級的；除開海陸空軍大元帥之外，還有五位將軍，包括着盟軍總司令與地中海美國空軍總司令，三位海軍提督，李海，麥金泰與勃朗。我懷疑父親的隨員中的密探們對我們的意大利使者有些不放心；在晚餐的過程中，他們的眼睛沒有間歇地釘住這兩個不幸者的後背；可是他們倆個却並沒有想下毒藥毒死任何人，祇是因爲他們之被允許與一個國家的元首處在同一的房間中而感到驚訝。晚餐以後，他們顫抖着與父親握手；後來，他們還是和晚餐時一樣地睜大着驚異的眼睛，向我表白說他們認爲這樣地接近墨索里尼或是維克多·愛麥虞限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即使在戰前的意大利他們都會被目爲國家的最危險的敵人的。

晚餐以後，我從父親那裏知道英美方面已經作了最後決定，將任命艾森豪威爾爲盟軍侵入法國的總指揮。父親說他的正式通知將由馬歇爾發出，而馬歇爾目前還在開羅，在正式通知尚未到達以前，絕不可以把這個消息先行透露給艾森豪威爾。父親那晚是十分疲乏了，差不多已經到了他精力的限度；可是第二天他還得作一次視察旅行。事實上，他還想把他旅行的範圍從計劃中的馬爾他與西西里擴展到意大利；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又像上次一樣堅決地加以阻止，不肯負任何責任。

父親固然已經十分疲倦了，可是他的神情之中還流露出一種恬靜的歡愉。他知道自己在一個有限的使命之下完成了很多的事。

第二天早上，在我還沒有醒以前他就起身了，坐着他的C-54飛機起飛赴馬爾他（「在反覆的空中

礮火之下，馬爾他屹然不動地站在那兒，在廣闊的海洋之中孤單而毫無恐懼，它是黑暗之中的一點光明的火焰——迎接那已行到來的清亮的日子的燎火」），然後再到西西里（在那兒克拉克將軍得到他的DSC勳章，還使克拉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爲他最初並不知道父親爲什麼命令他從意大利到西西里去）。四點半的時候父親回到埃爾阿奧依納，我又在機場接他。當天晚上我們在八點鐘吃晚飯，餐桌上祇有他的幾個親近的僚屬，李海，勃朗，麥金泰，華生和我。

在他第二天早晨起飛回國以前，我祇想打聽與我有切身關係的一個消息，可是他當然是無從告訴我。我想要知道史巴茲將軍是否將與艾森豪威爾一起調到英國去，因爲從這一個消息我可以知道我自己的部隊是否有機會能參加那次侵入戰。不幸地父親所知道的祇是關於比他僅次一級的人，而史巴茲的工作則並不在他的這個情報範圍之內。同時，在那個最後一晚，父親所想談論的祇是他離國一個月之中所完成的工作的基礎。

「聯合國……」在那最後一晚他以極大的滿足對我說。「國內的人們，國會的議員，報紙的主筆都認爲聯合國之存在祇是爲了戰爭。對於這一個機構的一般的傾向是說我們被戰爭所迫，不得不團結，而因此我們便團結了。可是戰爭並不是使我們團結的眞正的力量。和平才是那眞正的力量。在戰爭以後——那才是我能够確定聯合國將是眞眞的聯合國的時候！」

第二天一早六點鐘起身，坐汽車到機場。父親先乘飛機到達喀爾，在那兒他坐軍艦伊奧瓦號啓程回

國過聖誕節。我則與我後方司令部的最後一批官兵坐飛機向北到意大利的聖賽凡羅，在那兒我們將渡過一個寒冷而泥濘的聖誕節，懷疑着我們是否將暫時停留在意大利，還是會很幸運地被派去參加那定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發動的對納粹本土的攻擊戰。

九 從開羅——德黑蘭到雅爾塔

在開羅的最後一次會議以後，我在意大利渡過的那幾個星期中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發生。像每一個士兵那樣地謹慎，我小心地從各個消息來源打聽，想知道我的部隊是否會調到英國去參加那計劃中的作戰。正當我接到一些消息說我們調到英國去的希望似乎比以往更爲渺茫了的時候——根據軍隊的經驗，這就是說希望比以往更濃厚了——我們聽到了一種新的使人騷亂的謠言，說我們計劃對隣近羅馬的西海岸上的納粹在意大利的防線舉行總攻。這就是後來的安齊奧橋頭堡，而當我聽過了在埃及以及後來在伊朗舉行的聯合參謀長會議中所決定的各項戰術以後，我很難能相信這個新的冒險會認眞地被執行的。

在我們正想爲這個新的冒險作最後一分鐘的準備的時候，我突然接到命令，叫我卽刻向史巴茲將軍在英國的總部報到。我到達那裏以後，才知道我得担任起一種新的任務——改組與整頓第八（轟炸，戰術）與第九（輕轟炸，戰略）航空隊中全部的美國空中偵察隊，並且督導他們的活動以獲取歐洲侵入戰中必需的一切情報。我到達英國不久以後就聽到了安齊奧的登陸戰。幾個星期後我得到一個機會見到艾森豪威爾將軍，從他那兒我知道邱吉爾是怎麼樣個人地堅持這一個計劃。他爲它取了一個暗號，叫

SHINGLE；而這個計劃顯然地是他的最後一次——完全個人的，高壓手段的——努力，想強迫我們不從西方，而依然從南方侵入歐洲。

我的部隊在一月十九日參加到數目逐漸膨脹的駐英美軍中，而我們即刻與英國皇家空軍中的担任同樣工作的英國軍官們取得連繫，並肩合作。因爲我在前面曾經批判過某些英國的戰爭製造者，所以我想在這兒附加聲明，從一月中旬到D日，從D日到納粹投降的時期中，與我一起合作的那些英國皇家空軍的軍官們實在是一批才識俱備的軍人，他們熟悉他們的工作，而我想我們很難能够找到一些人比他們工作得更起勁，比他們更迫切地想儘早來獲取戰爭的勝利的。他們不僅爲他們的國家增加了很好的信譽，那次侵入戰中我們所蒙受的犧牲之少實在是應該大部份歸功於他們的。關於我們在歐洲的軍事的成功，他們實在有很大的功績，我相信我的這句話是代表與這些英國皇家空軍偵察專家們合作過的全體美國軍官而說的。

一月，二月，三月；而在四月中我們看到了在德黑蘭所討論的一部計劃（英國與蘇聯，意大利與蘇聯之間的穿梭式的對德轟炸）行將實現的初步的有形的證據。一位蘇聯的將軍來訪問盟軍總部，作了一些初步的商談後就回去了。五月中我接到命令，叫我陪伴安德生將軍，柯底士將軍以及第八航空隊中的幾位參謀到蘇聯去察看預備分配給我們使用的幾個機場，並且與蘇聯當局解決穿梭式轟炸開始以前的許多細目。這實在是一個好消息，蘇聯方面居然同意這個穿梭式轟炸的計劃，他們居然準備以戰鬥機保護我們的轟炸機，並且允許我們作空中偵察攝影。當然是這最後一項的工作使我得以參加那次旅行。

那一次飛行使我經過好些我所熟悉的地方：卡薩布蘭伽，奧尼斯，開羅，德黑蘭（在那兒我們的飛機搭上了一位紅軍空航員，一位紅軍的無線電通訊員），最後一直到莫斯科。這是我戰時兩次訪蘇中的第一次；我們在那兒祇住了一個多星期，因此我的印象當然是簡略而零碎的 可是却非常清晰而生動。我還記得莫斯科的廣闊的，廣闊的林蔭道；以及一些高級紅軍將領們招待我們的讌會，在那次讌會中我的位子被安排在兩位俄國人之間，而我們差不多完全用手勢來談話；我記得那座克萊姆林宮，我們到那兒去拜訪莫洛托夫——克萊姆林宮實在是太龐大了，連我們的在華盛頓的潘太剛大廈與之相比都顯得太渺小了，它與我所見到的許多政府大廈完全不同，廳道中鋪滿了厚厚的紅色地毯，套房中安置着舒適的傢具；我記得那華麗宏偉的歌劇場，我們在那兒看李姆斯基——哥薩珂夫的「白雪女郎」，與我從前在紐約的大都會歌劇院中所看過的同一演出相比較，它是更爲美滿，而舞台的裝置也更爲輝煌；我也記得歌劇的觀衆——百分之九十是穿制服的，偶而也有些穿着長袍的華貴的婦人。我曾經在莫斯科大飯店中與七位美國記者一起吃過晚飯；他們利用那短短的時間告訴我他們所分別担任的地區中的情形；像我們所吃的那頓晚飯要化費掉他們的發行人整整的七百美金，而一般俄國人的糧食配給祇需五塊美金一個月，政府的目的是想因此阻止一般人民到旅館與飯店中去吃飯；一位有階級的軍官，一位有名的舞劇明星，或是一位作家，科學家可以以五折或是二·五折來購買他或她的需要品；對於俄國人，全面戰爭就是眞正的全面戰爭。

而我記得我們坐着飛機去視察那些分配給我作穿梭式轟炸的機場，尤其是那個在波爾達伐的機場，

在戰前那個機場與我們在德克薩斯的雷道爾夫機場有同樣的規模，而當我們看到它的時候，它還是一片瓦礫，保持着納粹在退却中離開這個機場時的面目。就是在這個機場上我第一次看到紅軍的人員工作，而開始對他們克服困難與障礙的那種活力有了極大的崇敬。建築一個機場，在他們是動員千百個從戰鬥隊伍中退出來的人員，受過傷的士兵，做許多笨重的工作，這些工作在美國祇要一打壓滾機，一打排土機和二三十個地面工作人員就可以担任了。可是他們還是把那樣艱巨的工作完成了，速度之快與成績之佳使人驚羨。俄國的婦女們也做着同樣的工作：身體高大的亞美遜婦人毫不在乎地把五十加崙的汽油桶像玩具似地拋擲着。

從空中我們看到紅軍用來解決給養與運輸問題的道路：因爲缺乏硬面的道路他們的大卡車便時常開過曠野，而有時候他們的道路實在太泥濘了，於是他們便轉入他們原先道路的側傍，深入草原地帶達四五百碼。供給蘇聯整個南部戰場給養的是一條單軌的鐵道；當我們的穿梭式轟炸開始的時候，我們堅持要由波斯灣把我們自己的一百度的航空汽油與炸彈通過這條鐵道運過去，而因此阻礙了他們自己的運輸；可是他們還是很高興地接受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離開的時候的印象是俄國人差不多全都像孩子似地熱心盼望能與我們相處合作；固然我們也會碰到一個紅軍空軍軍官，硬說他實在太忙，非到夜晚十點鐘以後才能接見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在隣近等着，寒冷凍僵了我們的脚踝骨，但是同時我們可以碰到至少十幾個紅軍軍官表明他們對美國人，美國機器，以及美國工業効率的崇敬。戴維斯曾經向我們展示與蘇聯合作是怎麼樣簡單的一件事；我們政府之

不贊成派戴維斯這樣的人物來担任到蘇聯去代表我們的這一件重大的工作實在是一個最大的悲劇。

從莫斯科與蘇聯南部戰場回到倫敦以後，我得到了一個鬆弛一下的機會，使我得以暫時擺脫那近在目前的侵入戰所加在我雙肩的工作的重担。那是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那兒的一晚橋牌會，那天晚上我與柯底士將軍一組，對艾森豪威爾與他的武官勃乞；在艾森豪威爾的精湛的牌藝之下，我們慘敗得不可言狀。我特別記得那一晚，因爲他們追緊着問起我們的蘇聯旅行，幾乎把我們給問乾了。蘇聯是怎麼一個樣子？他們的軍隊怎樣？他們的飛機駕駛員如何？他們的紀律如何？他們對我們怎麼想？他們對於蘇聯作戰軍官與一般士兵的態度似乎特別覺得有興趣，而對於在德黑蘭與倫敦所碰到的蘇聯官員的態度則並不很重視。當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圓滿地回答了他們的問話以後，我說：

「他們全體所最最關心的還是第二戰場。這將是他們對我們的最大的試練。假如這成爲事實，那當然再好沒有。假如不……」

「假如？」艾森豪威爾叫道。「這『假如』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他上次在德黑蘭父親與邱吉爾的諾言以及那約定的日期，五月一日。

「我並不知道這些諾言。那次我不在場。可是我知道法國的侵入戰。蘇聯可以毋須爲這一點而担心。」

D－日。OVERLORD 與那同時發動的蘇聯的攻勢。V－1 與 V－2 的飛彈轟炸。從「星條」報

上我讀到了敦巴敦橡樹的會議；我很高興地想到這三位巨頭關於和平問題已經有了進一步的團結。接到父親的一封簡短的信，告訴我那年九月他在魁北克與邱吉爾的會議，會議中所討論的主要是關於對日戰爭的事項。一九四四年的夏秋，我日夜工作的對象祇是在法國，德國與歐洲低地的上空的攝影偵察；這工作需要我以全部的精力去對付，並且是非常繁重的，因此當我接到命令，叫我帶着技術的使命回國的時候，我的心情突然輕鬆起來了。這新的使命將使我暫且在潘太剛工作，將使我再見到華盛頓，將使我與父親和我的家族會晤。

我的妹妹安娜是我在白宮中所見到的第一個家屬，她先告訴我當我見到父親時我會發現的他的最近的變化。可是我還免不了怔驚了一下，主要地是因爲我聽到了很多人談論在這最近完成的競選運動中，他的健康是怎樣地不佳。他看來似乎有些疲乏的樣子，比以往清瘦了些，此外倒並沒有什麼太壞的徵象。「你能期待些什麼呢？」他向我伸出手來，當我利用他兩個約會中間的空暇，偷進去作了一次短短的訪問。「這些競選旅行是實在累人的，可是我却會因此發福的！」

他看來是比以前老了，憔悴了。可是他的臉頰上却有些紅色。他告訴我他希望能够離開白宮，或許是到溫泉去住一兩個星期，不過他大部份是確定要到海特公園我們的私宅去過聖誕節的。「你喜歡不喜歡這個計劃？」他問我。

「當然我喜歡的。不過我怎麼能知道聖誕節我在什麼地方呢？到那個時候，我說不定會又回到英國去了。這必須看我的工作來決定。」

我問他什麼時候我能得到一個機會與他詳細地談談，我想知道自從我上次在非洲與他分手後一年來的時局經過。

「我才有好多話要問你呢，」他回答我。「我想要從你那兒知道關於戰爭的最直接的消息。」他看了看他桌上的日記本，用鉛筆劃掉了一行字，然後宣佈他當天晚上可以見我。「晚飯以後。假如你沒事，下午可以多讀些報紙。我相信從那兒你可以知道我們的國家認爲我們是已經怎麼樣地接近勝利了。」

我並沒有向他提醒他一年前說我們可以在一九四四年年底擊敗納粹的預言。可是我那天下午倒的確得到了一些空閑，讀了一部份報紙與新聞雜誌，而當天晚上我向他提到我所讀的東西。

「我知道你的意思，爸。他們在談論戰後的歐洲。談論三巨頭的團結是怎樣地不够，而爲什麼你不再召集一次三巨頭會議。」

他點了點頭。「我猜他們現在是渴望着一些足以給他們大大地評論一番的題目。很幸運地這次戰爭總算是打勝了。」

我問他是否計劃再舉行一次三巨頭會議。

「喔，總得舉行一次的。我希望在總統授命式以後，我們能在一月下旬再會晤一次。事實上，問題倒不是時間，而是地點。史大林希望這地點在蘇聯境界之內。」

「又是在蘇聯？」

「你知道，他的這一點要求我們是很難拒絕的。他在指揮紅軍，而紅軍正在向前推進。」

那第一個夜晚，他果眞叫我多說話——他非常饑渴地聽我關於戰爭的一切報導以及我們的作戰情形。他留我在他的臥室裏坐到很遲，一句連一句地問了我許多問題，待他問完的時候，時間已經很遲了，使我沒法轉變談話的目標而倒過來問他。

可是兩三個早晨以後，我得到了我的機會；我到潘太剛大廈去向一位將軍報到，他派人通知我說他當天太忙，要到第二天才能接見我。於是我卽刻趕到白宮去，走進父親的住室，希望能在他還沒有開始白晝的工作以前見到他。他揮手叫我坐下；他正在翻閱一些公報；當日的晨報散亂地被丟在地板上。他繼續讀他的公報，時時發出驚嘆的聲浪，表示不滿。當他讀完了，拾起頭來的時候，我充滿着好奇心，睜大着眼睛看着他。

「希臘，」他說。「英國軍隊。與那些最近四年來打納粹的遊擊隊開火。」他並不想掩飾他的怒氣。關於這個事件，我在一張華盛頓的報紙上看到的祇是一個很模糊，很不完全的故事；那完整的故事在最近的幾個星期之內是不會被刊載出來的。「英國人居然敢這樣做！」父親叫道。「他們始終念念不忘過去，眞不知道他們要攪到怎樣的地步！」在他的傍邊，咖啡在沸騰着；他看了一下，發現它已經煮就了，給他自己倒了一杯，然後以邀請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還够倒一杯的，」他說。

「好極了！」

「我絕不會覺得怎麼希奇的，」他接下去說，「假如邱吉爾祇是聲明他在支持希臘的保皇黨。那根

本是他的性格。可是殺戮希臘的游擊隊！用英國的軍隊來幹這個勾當！」

「說不定還是用美國租借法案的裝備來幹呢，」我提醒他。

「這個我必須查明白，」父親說。可是馬上他又接着說，「不過，關於這件事我目前恐怕也很難能做些什麼。」

「發表一個公開聲明？」

「責備英國嗎？」他搖了一搖頭。「現在不行。時間還多得很呢，我可以在二月中見到邱吉爾的時候親自對他說。總之……」他的愁苦的表情突然消失了。

「總之什麼？」

他突然地轉換了話題。「你知道，差不多一年以前威廉女皇親自到這兒來過。她到白宮來訪問我。而我們開始長談起來」——他微笑着——「我得說，是我引她談開頭的，我設法使她談到荷蘭的殖民地，以及戰後對於這些殖民地的措施。爪哇，婆羅洲——以及全部的東印度羣島。我們把這個問題反覆地談了六個多鐘頭，是分兩三個晚上談的。我直爽地告訴她從日本的統治下解放這些殖民地的全是美國的軍隊。美國的陸軍，海軍與陸戰隊。我提到了菲律賓。」他帶着回憶的神情微笑着。「伊利奧，她同意在戰後她將以我們統治菲律賓的政策爲她統治荷屬東印度的標本。她答應我在戰勝日本以後，她立刻宣佈她的政府將首先賦與荷屬東印度的人民以自治與平等的權利，使他們享有自治領的地位。

「在東印度的政府成立以後，假如人民通過自由選舉，決定他們希望能完全獨立，那麼荷蘭政府將

給與他們以完全的獨立。就像我們允許菲律賓以獨立一樣。

「那是她的諾言與答應履行的責任。那就是說荷蘭將從英國的領導之下完全解脫。想一想那對史大林的影響！那將使他明白西歐諸國在戰後所能，並且所要完成的事業！」

我猜想英國在希臘的跋扈的行動使他想起了他與威廉女皇的這些談話。

「那是對的，」他說。「那是對的。那就是爲什麼我覺得現在立刻發佈一個公開聲明來責難英國並不是必要的；不僅是因爲這個聲明將要被納粹們用來做他們的宣傳資料。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將來絕對有辦法用壓力來使英國關於這個的殖民地問題與我們採取同一的看法。那是一個整個的問題：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印度，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我們將來是可以把這個世界造成一個眞正的二十世紀的世界的，你等着瞧吧！」

幾分鐘以前的他的尖銳的憤怒已經完全平息了，當他很熱心地想到他的將來的計劃，使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僅完全不受英國的外交部牽制，並且還要用壓力使那座帝國的牙城承認進步的潮流。

而很明顯地他希望能够在計劃中的下次三巨頭會議中與他的同席者重新整理那環球的世界政策。

幾天以後我離開華盛頓，去完成一件值得歡樂的私事。在亞利桑那，十二月三日那一天，我與費愛沐遜舉行婚禮。我期待最多在兩三個星期以後，我便會被調回到 ETO 去的；可是恰好在十二月十六日之前，我得到了一個絕對不會意料到的，來得恰是好時候的休假——用比較精確的軍隊用語來說，我

接到命令，要我暫時在國內服務，過了聖誕節以後再回到我的防地。這個命令於十六日之前到達：而希特勒的亞頓突圍戰則是在十六日發動的。當我在潘太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驚愕得幾乎半天說不出話來。空中偵察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收集必要的情報，使我們的野戰司令官們得以警戒，並且有準備來對付敵人的意外的奇襲——而從送到潘太剛來的報告中以及後來發表的公報，我們知道那一次突圍完全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奇襲，雖然還不致於使我們的褲子完全卸落，但却也使我們的褲帶鬆掉了。這次突圍表示——我這麼地想——我的部隊犯了一個很大的疏忽，而我的本能的反響是立刻向上峯請求允許我乘專機回到歐洲的盟軍總部去查究我們的毛病究竟出在什麼地方。我的上司的見解却是非常賢明的，他們認爲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也就沒法可以挽回，而我之在場與否對於亞頓突圍戰的後果並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影響。因此留在華盛頓，遠離着我的部隊，我祇得用想像來推測當時的情形；氣候決不能是一種遁詞，因爲不論氣候之好壞，攝影偵察是總該有些收獲的。祇是當我在華盛頓的臨時工作結束，飛回到總部以後，我才發現我們的偵察並沒有過失的地方，事實上關於敵人在亞頓後方的部隊集中的情報我們早就收集齊全而呈報到總部去——這些情報是被一位糊塗的二級參謀所擱起來或是疏忽了的。

我在國內的最後幾天是在海特公園與我的家屬一起渡過的，那是我與父親在一起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很奇怪地，或許是由於太多的戰爭的標題與事實，那個聖誕節反而變成了充滿和平與安怡的時日；外面的世界似乎暫時與我們隔離開了，而我們一家又團聚在一起了，正如我父親一年前在開羅的謝恩節時所說的，我們更密切地團結在一起，因爲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長長的起居室中間的那張桌子被推了開去，房間的中央安置了裝飾得很美麗的聖誕樹，一堆堆的禮物等我們去拆開——每個人的禮物都分開堆在不同的椅子上。在聖誕節的那天晚上，父親坐到他常坐的那張搖椅上，靠着壁爐，打開了那本熟悉的書，而我們則在他的週圍各人找地方坐下。我的地方則是在地板上，靠近壁爐的鐵格。爐火很歡樂地發出爆裂的聲音；父親的聲音，朗誦着我們大家熟悉的聖誕頌，很有節奏地升起又降落；我的思想毫無目的地飄游着，而不久就整個停滯了。接着，嚓！我覺得費的肘子碰到了我的助骨，聽到她的尖銳的低語在我耳邊響着：「你在打呼！快坐好！」而我很慚愧地抬起頭來看我父親，他祇是莊重地對我閃了下眼，而繼續諗下去。我忽然注意到他不知道爲什麼忘記了在他的前面的下顎上裝上那顆應有的假牙。而我的姪子，小佛克蘭林的三歲的兒子克利斯也突然注意到這一點。他把身子湊上前去，以清淅的聲音阻斷了我父親的朗誦：「祖爺，你掉了一個牙齒！」那是一個很簡單的，直接的聲明，並非請求而也無須回答，因此父親微笑了一下，又繼續諗下去。可是克利斯對於聖誕頌的興趣已經完全沒有了。他不久就站了起來，走到父親的跟前，把身子湊得更近，伸出他的手，用他的手指點在離父親的嘴不到一寸的地方，堅決地說，「祖爺，你掉了一個牙齒。是不是你把它吞下去了？」

而這句話結束了那晚的聖誕頌的朗誦。「這個家庭中的競爭太多了，使我沒法大聲地諗下去了，」父親大笑起來，而把書大聲地闔上。

「明年，」我的妻說，「那將是一個和平的聖誕。而我們都要嚴肅地，一言不發地聽你諗。」

「明年，」母親說，「明年我們一家人可以全部在國內一起過聖誕了。」

在聖誕日大家打開了各人的禮物，把包裝紙整理好了以後，我走到房間的角上父親的寫字桌前面，很小心地把他剛收到的心愛的禮物貼在他的集郵簿上。帶着開玩笑的口吻，我說有一天他的集郵中會多一種聯合國的郵票的。「別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伊利奧，」他說。「並且我很快地就可以得到。」他把身子往後靠在椅背上，對我揮動着他的放大鏡。「眞奇怪，我自己心裏也正在想到這一種郵票。說不定我可以在下個月的會議中把這個問題也放在議事中討論。」他大聲地笑了起來。「你想他們會不會懷疑我之提出這個問題是由於我的外在的集郵的動機的？」

「那麼會議是確定要在下個月舉行的了？」

「完全確定了。我眞希望它快些舉行。工作的變換對我很有好處。」

「你是否還需要個侍從呢？」

他微笑着。「這要看你的上司的意思了，伊利奧，我希望沒有什麼問題。」

「我也這樣希望。」

「可是即使有什麼問題，我不久還可以看到你的。我很認眞地在考慮明年暮春或是初夏的時候到英國去旅行一次。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去告訴英國的人民與英國國會大英帝國是怎樣地應該把它將來的希望寄托在聯合國中——全世界的聯合國——而不應該把這希望寄托在大英帝國和英國鼓動其他國家所結合成的反蘇集團中。」

我問他是否認爲有這一種危險性。

「這恐怕是難免的，」他很嚴肅地回答我。「我們現在就應該計劃和這一種傾向對抗。」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聖誕節不談國事。」母親這時也走到我的後面，很堅決地說，「我也正要說這一句話。我們大家都已經同意，今日不談正事。」

費要回到好萊塢去，我把她送上了火車，兩天以後，我向父親，母親和其他的家屬告別。元旦日我回到了我的指揮崗位上，立刻埋頭於我的工作中。三個星期之後，從「星條」報上我讀到父親將舉行一個很簡單的總統任命典禮，我覺得很高興，想到費也可以回到華盛頓參加這個典禮。可是，嘣！天塌了下來，我發現我自己被牽涉在對納粹戰爭以外的其他許多戰爭中。

我不願意在這兒多費篇幅來記述那件有意中傷我的事件，因爲這並沒有多大用處。假如說費之冒險地嫁入羅斯福的家庭中需要什麼介紹的話，那麼她已經得到了這些介紹。熱烈的風在卡比托爾山上歡樂地吹着。陸軍部的檢察總監親自到我的總部來，調查許多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正在鬧得亂哄哄的時候，可以說是再湊巧沒有，陸軍部的推薦晉升將官的人員名單就在這時候呈到父親的公文桌上等他批准，而在這張名單之中——由杜立特將軍推薦，由史巴茲將軍與艾森豪威爾將軍批准——我的名字也在裏面。

父親對於這一類名單總把它當作例行的公事，看一遍就簽字批准的，可是費後來告訴我他那一次對着名單却遲疑不決起來，他想了一次，兩次，三次，還是不能決定。按照他的慣例，他總是使他的兒子

來對付他們自己的困難，他決不干預。可是那一次我猜他却居然允許他自己破例來操心一次；他告訴我的妻他相信我是够資格晉升爲將官的。最後他決定簽字批准而把那張名單送到上院去，一方面他寫了封信告訴我一切經過並且向我解釋他要上院來決定我上司對我的推薦與信任是否得當。我把手指寒着我的耳孔而等待這事情的後果。果眞又是一次國會的調查。

可是我的惡星似乎還沒有完全放過我。一月下旬霍浦金斯到達法國，他到巴黎的盟軍總部來看我。我以感謝的心情回憶起他用婉轉的方式向我透露出那個消息。他很隨便地提到三巨頭會議決定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而他就是爲這個會議到歐洲來的。於是他說父親在他與我談話的時候已經在航海的途中了，他坐的是軍艦昆恩西號，有一隊機動艦隊一路保護着他。看到我剛要提出那重要的問題，他立刻加快他的速度。父親很希望我再做他的侍從，他說，可是他不願意行文到陸軍部去要求調動我。父親，霍浦金斯說，不願意把陸軍部置於進退兩難的地步，因爲很顯明地卡比托爾山崗上的共和黨們又會借這件事而鬧得天翻地覆的。

那是一個很大的失望。於是，換了一口氣，霍浦金斯說父親這一次把我的妹妹安娜帶了去。聽到了這個消息，我心情比較好了一點；我知道父親喜歡有一個家屬在他的身邊，使他可以毫無顧慮地隨便談說，完全鬆弛，並且絕對信任。因此這次有安娜陪着他倒也很好。最後，我相信一部份是爲了要安慰我這一次失望起見，霍浦金斯叫我當晚陪他一起吃晚飯。他說，他想在他到馬爾他去會見父親以前跟我談談他腹中的一些心事。在那個時候我突然發覺我對這整個的事也未免有些太小孩子氣了，於是我趕忙振

作起高興的心情來。

當晚在他的房間裏吃晚飯的時候，霍浦金斯對我施展了他的特長：他是一位可愛而有趣的伴侶，充滿了思想與誠諧，而我們很快活地在一起過了一晚上。他向我宣示他的預言，他早先已經與艾森豪威爾談起過，說納粹的抵抗將於七月中全部瓦解。我嘲笑他，並且與他打賭四月底以前納粹就會完全敗北。他告訴我邱吉爾又在暗暗地計劃另一個南歐的侵入戰：邱吉爾稱之爲阿得里亞海中的牽制戰，以擊破意大利的僵局。我們都知道這是邱吉爾的最後一次努力，想使盟軍比紅軍先進入巴爾幹，我們不禁相對地微笑了一下，霍浦金斯很有把握地宣佈說美國的聯合參謀長本部是絕不會容許邱吉爾爲這個目的使用那些太平洋戰區中所迫切需要的登陸艇的。

他說父親相信這一次的克里米亞會議將是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次必要的三巨頭會議。會議中的議事差不多完全是關於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的組織，以及歐亞各國內的管制與政府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假如我們事先沒有好好的計劃，將使我們將來在行政上感到空空地毫無頭緒。

霍浦金斯又繼續說，父親堅決主張史大林，邱吉爾與他對於和平的機構必須意見完全統一，使戰勝國在戰爭一停止以後立刻就開始學習他們自己以往的罪行的教訓。父親很迫切地，他說，想確定在納粹被打倒以後，我們負責管制的軍事政府中的處於指導地位的官長們將不是以往商業界中的巨頭，因爲這些人物所關心的祇是重新樹立起德國的企業組合。

我很快活地吃完那一頓晚餐。霍浦金斯定第二天啓程赴羅馬，在他到馬爾他去與父親會合以前他還

須在梵諦岡有些公事要完成。我託他帶了封信給父親，謝謝他的關心，而回到我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因此——雅爾塔會議中便沒有我的份了。而更重要的是我從此不再見到我的父親了。

十　雅爾塔會議

雖然我沒有陪伴我的父親到馬爾他，而在雅爾塔會議那些日子，以及後來在埃及的大比特湖都沒有我，但這些地方經過情形，我却能夠得到不止一次的直接報告。一部份印象是隨後從我的妹妹安娜得來的，另一部份，則得自霍浦金斯。我父親在空閒的時候，也有些信給我，信裏面他告訴我一些他個人的態度，反響。從這些不同的及個人的報導，在重要的情節上是互相符合的，再從官方對我父親這次行程的日誌中，我足以構出下述的圖像：

克里米亞會議，曾取道馬爾他及埃及，從時間上說是最長的（父親離開美國有五個多星期）也使三巨頭的領袖人物們，能夠有更多的商談（父親在克里米亞的八天中，曾舉行八次正式會議，及無數次非正式談話，總括了全部軍事上及政治上諸問題的充份檢討）；不過，它並不是這次戰爭的最重要的高級會議。

重要原因在於若干主要決定已在他處議定——在華府，在開羅，在德黑蘭。

在雅爾塔，蘇聯大元帥，英國首相，及美國總統以及他們的軍事和外交助手，不過集合來完成他們業經達成的一般協議之特殊細節的工作而已。這次參加的顧問們比任何以前爲多。無疑地這次會中所談

的許多細節也是重要的，但其全貌早在德黑蘭會議中形成。假如父親還活着，無問題地，三巨頭會議以後會時常舉行，不僅在波茨坦的一次而已。雅爾塔會議之成爲必要，是因爲德黑蘭所議定的大計在敦巴敦橡樹會議中並未順利地生效執行；而且僅次於三巨頭之三國各代表人物尚未有機會見面親談。在雅爾塔，又一次它融洽一致，給戰後世界整個結構之骨格以血以肉，這就是它的重要處。

雅爾塔會議之在克里米亞舉行，是爲了史大林的便利；在父親離開華盛頓約一星期之前，紅軍業已開始其準備就緒的冬季攻勢。這項攻勢，據報而且是事實，雖然氣候是惡劣的，較預定計劃提早了一個星期，原因是要減輕對四綫盟軍所加的最後掙扎的壓力。

英國首相對選擇雅爾塔爲會議地點極不高興！霍浦金斯報告邱吉爾的表示給父親說：

「他說，就是我們花上十年工夫去找，在世界上也找不出來比雅爾塔更壞的地方了。……他斷言那地方是生傷寒病的好去處，而且要命的虱子，到處藩殖着。」過了一天左右，他自己又傳過話來說：從薩基飛機場坐汽車到雅爾塔，要化六個鐘頭，這條穿山逾嶺的公路的一段，最好的地方也虎人不淺，最壞的地方，乾脆走不通；德國人從這裏撤退了後，把整個地區，弄得這樣可怕，參加會議者的健康，會處於判定的危險之中。

邱吉爾的表示，照會，父親曉得了，也就把牠們丟進擋案裏去。在馬爾他，父親是二月二號到的，哈立曼在接他，他聆悉汽車在那條公路上開是沒什麼問題的，而那地方的健康狀況也沒什麼問題，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第一次軍事參謀會議在馬爾他舉行。因爲盟軍的勝利已經有了若干徵象，因此聯合參謀總長們所關心的唯一的現實問題是那一部力量必須仍舊留在歐洲戰場；而必須增加多少力量在太平洋戰場。海軍上將金氏及海軍軍官們，他們因爲顯而易見的諸種理由，是一貫地對於對日戰爭抱更大的關切；他們現在反對——自然是較溫和地——馬歇爾的主張把所有可用的力量，放在歐洲戰場上去，以便在可能的最快期間內解決納粹。在馬爾他英美聯合參謀總長會議開了幾天，有兩次邀父親出席，有一次邀邱吉爾出席，都是爲報告存在於他們之間意見諸小分歧是怎麼樣解決的。

有一次，父親同安娜曾經乘汽車在馬爾他兜一個卅哩的圈子，在愉快的，溫暖的陽光下，去看他上次來時，送給馬爾他人民的彫雪石壁。

在克里米亞的一千四百英里飛行是夜航。整個晚上，每十分鐘或十五分鐘間，就有一批C—54式巨型機，從盧加機場起飛，向東經希臘南部尖端，再向東北橫跨愛琴海及黑海到薩基機場，在飛行航綫之下面，美國及蘇聯艦隊往來巡游，預防飛機發生意外强迫下降之可能性，以資保護。

在父親的那架第一號飛機上，李海，麥金泰與勃朗，華生，邁克·瑞萊同亞瑟曾注視到六架戰鬥機在雅典起飛追趕，並看到另一架飛機的機器發生毛病折回。中午，父親那架飛機在蘇聯領土上降落，莫洛托夫，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與哈立曼在場歡迎。廿分鐘以後，英首相機也到了，紅軍樂隊及儀仗隊開始奏樂致敬。美國國歌，英國國歌之後繼之以國際歌，這時安娜與父親已登乘一輛蘇聯汽車，司機也是俄人，在行列之最前，開入一片雪掩的原野，其後就曲曲折折盤上那「紅色峭壁」。從薩基到雅爾塔沿

路，均由蘇聯軍隊警衛。安娜曾用力拉父親的袖子說：

「看！好多都是女的呢！」

在黎娃地亞宮前，以前是沙皇的消夏別墅，其後一度爲人民肺病休養院。後來納粹殺人强盜曾作爲參謀總部，大隊汽車把美國客人停下來。納粹退出黎娃地亞宮時，他們什麼都沒給留下，裏面精光了，僅剩下兩幅小畫是掛在父親寢室的牆上。但俄國人從莫斯科搬來一套旅館全部人馬及設備，很合適，很像要什麼有什麼。哈立曼的女兒來得也合適，她來歡迎他們；他們全都累極了，他們到了後的時間表就是：洗澡，吃飯，睡覺。馬歇爾將軍睡在皇帝臥室，海軍上將金氏在沙皇皇后住的那一間。

距此十二英里，就是專門撥供英首相住的別墅；史大林住的別墅則距此六英里。第二天，星期天，蘇聯大元帥一早就到了，同日下午四時，他同莫洛托夫到父親處作第一次非正式拜會；五點鐘第一項正式會議在黎娃地亞宮的壯麗舞廳中大圓桌前舉行，會議工作十分緊張，時達兩小時又四十分鐘，其後的七次會議，按日舉行一次，情形與此次相彷，僅有最後一次會議時間較短些。工作是極繁的，約有下列諸項：

（一）決定一個全體一致的對希特勒主義戰爭的詳細步驟。在會議進行中，紅軍以空前的速度反攻納粹。自然，在英美陸海軍代表們，對此就有所推測，究竟俄人已否在東綫澈底擊破德國防綫，或在會議休會之前，這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國家能否崩潰。

（二）德國敗亡後的佔領與管制德國問題。父親來到克里米亞，希望說服兩個同伴；使他們相信管

制德國應該統一化，不應瓜分爲各個佔領區。管制與行政不但在最高機構中採取聯合方式，一切等而下之機構也應如此。但英國與蘇聯對此意見均甚冷淡。他們說分區佔領的意見應該成立，使父親接受。於是在雅爾塔，對德佔領區的劃界問題是解決而且大家同意了，什麼時候各該國軍隊在其本區內建立行政管制的問題，也決定了。

「此乃余等不易之目標，」三個夥伴如是寫道，「以消滅德國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並保證德國永不復可能擾亂世界和平。余等決心解除或控制所有德國之工業……」。在美國知名的摩根索計劃，（父親正是這計劃提案人之一），內中各款是要打擊德國工業潛在力的核心，如果沒有這種潛在力，現代國家就無法進行戰爭。他所找到的一位傾聽這計劃的人是史大林，可惜由於並非他倆人的錯，這個嚴密的條款，未能照辦。

（三）德國賠款亦經決定，並列定一表——包括付款年月，賠償種類　工業設備等。（此表，其後英國未曾遵照，美國亦然。）

（四）聯合國大會，此會奠基於敦巴敦橡樹，在德黑蘭其原則之犖犖大者，已先行得到同意。雅爾塔會上決定在舊金山召開，時間離該時不足兩月。敦巴敦橡，所遭遇的障礙是否決權問題。是否任何三強之一，運用否決權，足以獲允其制止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某一議案之處置呢？譬如說：安全理事會對某一被控爲侵略國的處置決議，否決權對此又該如何呢？

在雅爾塔三巨頭對此問題，曾予正視，並在應有的高度上考量它。父親與史大林對三強否決權觀念

表示贊成，他們的理由基於下述簡單而明透的事實：即假如想要維護世界和平的話，祇有在世界最大強國獲得互相同意條件下，始有可能。假如三強中兩強，對其他一強有不同意處，或某一強對其餘兩強有不同意處，則和平即在險境中，祇有全體一致與目標符合無間，才能拯救和平。

這一議程上問題所引起的兩難窘境，父親替解決了。三強，外加中，法兩國必須全體一致同意，這世界機構始能對某一被控之侵略國，採取經濟的或軍上的制裁行動。但安全理事會十一個委員中，如有七個委員一致，即可傳審某一侵略國，在世界輿論的裁判下，得一清算。

父親堅決主張維護各國間諸合一致之必要，特別以三強間爲然。遂引伸到否決權之原則上，以確保諸合一致。

（五）由於歐洲諸國之獲解放所引起的諸問題，三巨頭亦提供諸言，並以此重申大西洋憲章之各項原則。

這就是自主，一切人民有權選擇其自己政府之形式與自由選舉。

（六）關於波蘭，史大林堅持寇松綫——並有利於波蘭地稍加修正，定爲波蘭東部國界，同時基於同一立場，犧牲戰敗之德國，割其若干土地，增加波蘭北部及西部幅員，以維護波蘭爲一強盛自給自足之國家。關於建立一波蘭政府，自指一全國團結之政府，覓一妥協方案，實屬必須。當時俄人在莫斯科有一波蘭政府，而英國則支持在倫敦有使聯權之舊波蘭政府。父親當時是調解人，亦是仲裁人；這個問題對團結殊爲重要，現在也還是一樣。

（七）邱吉爾，特別不容他人染指於地中海及巴爾幹的英國利益，堅持對南斯拉夫之將來應重予規定，後經同意，南國臨時內閣應包括舊閣員若干名，又爲了史大林之故，舊閣員僅以未曾妥協「通敵」者爲限。

（八）父親確信，三巨頭時時集會，實爲迫切之需要：此次克里米亞會議，僅在德黑蘭後稍逾一年，足以爲證。因此對於三強外長集會，定出一經常而繼續性之會期表。

（九）明智地，莊嚴地，同時也是眞誠地，三巨頭寫下他們的信念：「唯有余等三國以及所有愛好和平諸國之間，繼續並增進合作與了解，……始能實現一鞏固與持久之和平。」上述引句中頭兩個字「唯有」值得我們注意，數目「三」字亦然。

霍浦金斯可以爲我下面的話作證，即邱吉爾，史大林與羅斯福之團結，於雅爾塔較諸在德黑蘭更爲堅固，更爲確實具體。同時顯然地，父親較在以前諸會議中更扮演着領袖的角色。爲彼等所拍之諸照片，父親坐於中央，並非偶然。他左右邱吉爾的力量，較前愈爲週至，史大林亦樂於追隨父親的意見，接受父親的各種解決辦法。

亦正是在雅爾塔，或較諸前此若干次會議，尤充滿一種巨大的，全部担當的責任感於三巨頭肩上。在各種見解上，自然也有分歧，就是一方諸代表之間，亦有差異——譬如，父親對他的顧問們也並非言聽計從，全以爲是的。但是，諸如此類的分歧，在進行建築一個確信的，堅强的和平巨大工作面前，消失隱沒了。

在這次會中，還有許多富有啓示性的小插曲：

一次，在史大林別墅裏宴會，父親——外交詞令式地，但也是誠摯地，誇讚蘇聯香檳好，席間主人就很得意地說，此酒來自史大林的故鄉，喬治亞。父親更由衷地開懷笑着說：戰後，在他退休不作總統的時候，想在美國販這種酒，拿佣金，乘機發點小財。

同時蘇聯方面也善於詞令的運用，他們引人注意克里米亞的天氣；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是陰沉不快的，父親一到，就好起來。他們說民間傳開了：蘇聯當地人民都在講，並形容這種好天氣，特稱之爲「羅斯福天氣」。

他們彼此之間還交換着禮物，及勳章。英首相，史大林，艾登，莫洛托夫：父親贈給他們特製的凸彫大勳章；父親此外還送一本一靶子：德國」的書與史大林，大約是一種婉轉的政治性的暗示，表示盟國「鵠心」應該把重量放在德國上面。「鵠心」一字是當時全面轟炸德國戰略據點的電報上用語。另外父親又贈送蘇聯大元帥八枚勳章——總司令級的兩枚，司令級的六枚，轉予八個紅軍將領。

在美國代表們離開黎娃地亞，那天是星期日，二月十一日，蘇聯方面在宮中設宴，殷勤以伏特加，各種俄國酒，及父親曾誇讚過的喬治亞香檳相勸，並備有魚子醬，牛油，橙子及紅皮橘。這事使我的妹妹安娜記起一天早晨，她出去散步，一位操英語的蘇聯特務小姐，陪着她。她遇到一羣俄國小孩子，她就分送給他們巧克力糖棒。這些孩子收下了，但這位特務小姐嚴肅地堅決地把糖要過來說：

「他們够吃，我們不願意美國小姐以爲他們不够吃。」

在會議快結束散場的時候，史大林又再重申他在德黑蘭所作的第一次自動表示：從對德國勝利之日起，六個月內蘇聯必向日本宣戰。他說完了，又沉思了一下，又把六個月的估計，修改爲三個月。

在官方公報所包括諸點之外，三巨頭同意蘇聯爲確保太平洋安全起見，將千島羣島及南庫頁島劃歸蘇聯。後來就因爲這點，父親及史大林邱吉爾被批評爲「祕密分贓」。顯然地這種批評，故意無視了當時這一協議之無法公開這一事實；因爲當時蘇聯尚未參加對日戰爭。說千島羣島是俄國對日作戰的「報酬」也不正確，因爲在一年前德黑蘭，史大林自動地表示這一步驟，並無要求什麼「報酬」之意在內。

從黎娃地亞，父親坐車達到賽伐斯托波爾，已是薄暮時分了，大約這是憑弔這世界上受戰爭破壞最慘城市之一的荒涼漫無人烟景色最適宜的時刻了。全是瓦礫，這裏，那裏，一堵牆筆直地呆呆地站着，好似廣告牌。人們告訴父親說，德國人遁走後，賽港有六棟房子沒有倒。

在蘇聯「卡托琴」號輔助艦上睡了一夜，一早作長距離飛行赴埃及抵德塞瓦機場，全途一千英里。到達以後旅客們看見重巡洋艦「昆恩西」號在等候他們，這條船曾經從紐斯新港搭他們來的。在等候他們的，還有全世界對雅爾塔會議反響的新聞。連胡佛都吝妬其詞說：「是將予世界一大希望。」父親流覽了一下電報打來的若干報紙社評，就拍了一個才出世的無綫電傳眞電報，並加稱：「余確信全世界人民重視此次會議之諸種成就……吾人三大國家力能合作，在和平時期亦如戰時，亦獲一眞實之保證。」

父親在「昆恩西」號上，有三個重要客人來訪。安娜後來告訴我說：那時他是極疲倦的人，繼續兩星期來的緊張，給耗盡了力氣，他疲了，似乎全靠精神來支持。但他不顧疲勞，仍然要接見他們，同他

們談話。

第一位客人是埃及皇帝發魯克，他們談到戰時美國購買埃及長纖維棉花的事及戰後相互貿易的重要，父親並肯定地預言戰後定有大批美國旅行客到尼羅河流域來遊覽。第二位客人在下午高聲談笑登甲板，是黑色的塞拉西，猶大勝利之獅，愛亞屋皮亞（即阿比西尼亞）之帝。這位皇帝熱烈地告訴父親他在國內舉行的種種改革，並以渴望的神情贊成父親所希望的戰後兩國間關係之加強。

第二天早晨來了第三位客人，沙地阿拉伯皇帝沙德，這是他離開王國第一次旅行。他是搭一條美國驅逐艦來的，因爲在「昆恩西」號之傍拖曳這條艦船，父親這邊的人們，可以看到艙面上裝起遮雨的東西，以便這位皇帝走出來。小心地，我的妹妹安娜，這天離開父親作開羅之遊去了，爲了尊敬回教風俗，應該讓家裏的婦女迴避。

這位皇帝與父親對巴力斯坦猶太問題交換首次意見。父親老早希望說服沙德，將歐洲大批被迫害驅逐無家可歸遊蕩之猶太人，基於公平道義讓他們安居於巴力斯坦。後來巴魯什告訴我說：父親承認，在他一生中同他談過話的人，要以這位鐵的意志之阿拉伯王，爲最不令他滿意的了。最後，父親答應沙德，決不允有美國人去鼓動對阿拉伯人的仇視。

敍利亞，黎巴嫩，法屬殖民地，多數居民是阿拉伯人，父親對他們的代表來訪者說，他有法國政府允諾敍，黎將來獨立的書面保證。他向他担保，他隨時可以書面通知法國履行其諾言，並以儘可能的幫忙，支持黎巴嫩人及敍利亞人以制止武力行爲。

沙德對父親坐的輪椅看着羨慕，使他吃驚的是父親立刻送了他一把。

從蘇伊士運河起飛，經地中海返國，長途於茲開始。在阿爾及爾停了一會，等戴高樂回話，是不是他不準備發牢騷。他是不打算接受父親的邀請拜訪父親一次？由齊弗雷大使來了回音說：

「因爲一串理由，戴高樂在此刻，離不開巴黎。眞抱歉，阿爾及爾太遠云云云云。」父親對此聳聳肩，昆恩西號就向紐斯新港開駛而去。

從如此成功，如此重大的會議回去，但回去的旅途是悲傷的。父親最老的老朋友，最親近的老朋友，華生從亞力山大港西返途中染病，在大西洋中途死了。安娜後來告訴我說，父親回到白宮的時候，特別地疲倦，也就不足爲異了。

但是，他可以說又重新恢復了他的固有的熱情，在與母親重聚的時候，他說：

「你看從克里米亞來的公報：它所紀錄下來的航路！從雅爾塔到莫斯科，到舊金山，到墨西哥城，到倫敦，華盛頓同巴黎！不要忘了，牠還要紀錄下來柏林呢！」

「這是一次全球性的戰爭，可是我們已經開始轉變牠成爲全球性的和平呢！」

十一　結論

凝鍊一全球性的和平的工作已經創始而且創始得很不錯。不幸自羅斯福逝世之後，他的勇毅的創始，在若干地方，若干點上，是被損害了。也許「損害」二字，還嫌形容得過輕；也許應當這樣說：和平正在迅速消失之中。

這種令人悲哀的記述，是處處有例子可以證明它的眞實性的。李普曼在叫：「沒有和平」，報紙上刊載着關於我軍德國佔領區極東角的許多前進航空基地的種種新聞，告訴我們空軍怎樣在那裏建立起來，用最新式，最快的火箭飛機來代替那「古舊的」的P——51式機。這些懸解的問題要求一答案：爲什麼呢？

難免令人想到，這種疑懼心理是由於我們怕原子彈的「祕密」被人染指的妒嫉與病態精神的忌恨而產生的。所謂「祕密」，其實在紐納原子彈製造廠工作的每一位科學家，都直說過，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祕密的。可是我們還把這殺人的玩藝兒摟緊在胸口上，以避免我們的「不堪信任」的盟邦的侵凌；而一方面則寧願把這玩藝兒交給穿軍服的人們，就像我們老早是個軍國主義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平民所有的民主國（不能不多謝我們的創始祖先，我們是一個平民民主國。）

諸如此類的證明，是隨手可以多舉的。

我們的工作是要把上述現像其本原因找出來，爲什麼和平正在迅速消失之中？爲什麼在華盛頓許多鷄尾酒會中，人們熟習地開談着對蘇戰爭「最好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幹他一場——此言之意，就是最好在蘇聯對原子武器研究還未到家的時候幹他。爲什麼記者們寫着：「在歐洲每一位政治家，在他的心底都有個基本的，主導一切的假定，就是他必須準備設想發生英蘇之戰的可能，同時一切國家亦將捲入於戰禍中」呢？我們必須找出來，誰是這些政治家？我們必須擊碎他們這種主導一切的前程假定，我們必須爲對日勝利與歐洲勝利日之後，顯已確立了的世界和平而鬥爭。

這一工作開始要先計算一下：這期間什麼變故發生了，什麼變故，引我們從和平的路上轉入岐途？在這岐途上陷我們於紛亂之境？

我以爲有一個事實，一旦把握與了解它，就可以對戰後一切政治眞相，弄清楚與辨別明白了。這事實就是羅斯福死後，現代世界進步的力量，失掉了牠的最有影響與最有說服性的導師。由於他的死，爲世界所有國與國間，人民與人民間的團結一致的最明確的呼聲停頓了。更有甚於此者，對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言，他不僅是美國的象徵，也是自由的象徵，人民將解放與建立一和平富足新世界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死了，人民的一切希望也隨他之死去而幻滅，也失掉了他們的信心。

自然，我們必須明白，沒有那一個個人，無論他是如何偉大的世界領袖，因爲他生或死會影響世界歷史於永久；最多不過影響永久而無限的時空之一刹那而已。但在羅斯福這一個例子上，一個個人之

死，確意味着一段繼續性的空虛，——就在這段永久時空間的須臾中——這種空虛是普漫於進步的力量，前進的力量，相信戰爭並非爲了維持戰前現狀而打的力量之中。

進入這眞空裏一看，進步的朋友們是走出去休息吃中飯去了，裏面闊步的正是立在反對方面的人，進步的仇人，舊世界的保護者，反動的衛士們。

要爲以上的論據，找出特殊的種種證據來，也不難。在此書開頭的幾頁中，我曾據我個人所悉，記載過這位我們全體勝利的建築師與其他領袖們所商討的計劃多種。在這些計劃中所載，諾言猶在；但把諾言與所實行者相較，言行對照之下，我們看出了什麼來呢？

譬如中國爲例，在開羅，羅斯福從那位封建軍閥（他恰巧又適爲中國戰時領袖），扭擠出來一項諾言。這諾言答應在全面戰爭未停止前，完成一眞正的，全國統一性的代議制中國政府；在這改組的新的，更爲民主的政府保障之下，儘可能地，迅速舉行全國普選。自然，這諾言是有條件的。蔣提出兩個條件：（一）必須父親從蘇聯方面獲得絕對保證，保證滿洲重返中國主權之下，此一中國邊界必須被尊重，並包括蘇聯不致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之諒解。（二）美國支持中國，戰後拒絕英國在香港，廣州與上海治外法權，蔣並爲那調這一條件稱：日本停止抵抗以後，祇可美國戰艦駛入上述諸港口及其他港口，英國戰艦是不行的。

後來履行得如何呢？父親的特使赫爾利作得很漂亮。從蘇聯方面獲得所有必要的保證，事實上其後蘇聯亦遵守了這協定字面上及精神上的一切。輪到美國該履行牠的條件上的責任，我們可並沒有。第一

次駛進中國各港的戰艦，就都是英國的。不准英國戰艦駛入中國港口的命令，不知壓在那兒了，很可能就壓在國務院。

結國：美國破壞了它的諾言，蔣也就撕破了他的。中國目前狀況，並不是個進步的狀況而是連續的反動。政府亦非全國統一的政府，並非所有各黨各派都參加；而是獨裁的政府，下面人民大衆是飢饉，在上面是貪污與鬼混。

由各殖民地的領域裏得來的證明，言行相較，尤爲尖銳地，大有距離。以荷屬東印度言，威廉女皇曾稱：一旦衝突停止，她立即宣佈東印先獲得自治領的地位，然後很快地由全民投票，表決獨立。是的，這一項諾言是以美國軍隊負責解放這些物產豐富殖民地爲雙方的諒解的。事實呢，使世界都爲之沮喪，英國提防爪哇人民的獨立會對她自己的殖民地發生影響，像發出砲彈似的速度，衝進荷屬東印，利用美國租借法案得來的物資；用最殘忍的手段，鎮壓這些爭取獨立的人民，而在美國，我們完全什麼也沒有做。

或以法屬安南爲例。父親多次堅持這一主要爲美國軍火及軍隊所解放的殖民地，決不能隨便交還法國，使她照數十年老樣子被她的一批帝國主義者門徒所擠取。然而，當英國殖民地軍隊開入安南的時候，他們把法國軍隊及統治者行政官吏也帶進去了。快！時機熟啦！在來不及有人看見的時候，把它交回給前日的帝國主義者的手中吧！

這些例子雖重要又足以暴露其眞像，但較諸反動對於進步的壓力之最嚴重的證據，牠們還比不上一

牛呢！最嚴重的對三強團結的破壞，而三強團結，正是和平的拱心石。羅斯福把這塊石頭彫好了，砌好了，許多人一直在敲牠，希望牠又掉下來碎了。

這種國際團結中之怠工者爲首之輩，就是那些硬認爲否決權是錯誤的人。此輩或由於無視或由於利令智昏，對現世界爲美、蘇、英三強所共理，必須三強工作諸合，始能再證和平這一事實，盲而不見。至於說蘇聯如何倔强，如何貪得無厭，凡有自尊心的强國不能同她維繫團結，除非——可怕的字眼！壓她，這實亦不能自圓其說。這種辯解是不能抹煞一切的，全世界曾經看到三强團結的事實，目睹其經年逾月團結的進步，看到了由十二月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到一九四五年正月，以及一九四五年中一系列外長會議的事實經過。

僅是本年外長會議以後，國內才是狼嗥鬼叫說貝爾納斯已經把美國出賣落水了，在會院中受范登堡一流叫喊領導人物及新聞界，亞爾斯特——羅易，哈佛——麥克可密克的異口同聲合唱，要求「對蘇强硬」——從此以後，我們間的團結，就更壞了。

究竟貝爾納斯在莫斯科作了些什麼如此吓人的事呢？他僅曾談到原子彈最後交聯合國管制的可能。因爲貝爾納斯是够清楚地體察出來，假如有那麼一個單獨因索，可能讓我們戰時是戰友，和平時期設想是同盟的國家心目中產生對富强美國之疑懼，那麼這因素就是我們想把世界上最有毀滅性的武器之祕而不宣。爲什麼要祕呢？祕起來是想打誰呢？

好，顯而易見，貝爾納斯受擊學乖了。兩個月以後，他聽從了點內部的風聲，準備宣佈自己創作的

一條「對蘇強硬」路綫。事有奇怪的巧合，僅僅一星期之後，邱吉爾先生就在密蘇里省，福爾頓城，講演向蘇聯指揮一個野蠻的猛攻。邱吉爾就是那位曾經不斷拚命以圖躲開由英倫海峽進攻歐陸者，從一九四二春天他就躲，一直拖過一九四三，四四的冬天。也就是那位，經常拚命想壓迫盟軍改變戰略，以便驅使美軍向山嶺防綫進攻；他毫不忸怩地把德意山嶺一帶戰綫，稱之爲：「歐洲柔輭的腹下部」的。他過去就努力把進攻德國的重担，推到別人身上，以保障英國在巴爾幹及中歐的利益，在這兩地方同盟友蘇聯逐角抗衡，危害了原可迅速到來的和平；現在他又急急忙忙放起一個試探風速的汽球，對他以前的盟友立刻發動戰爭了。自然他不會未曾與聞，在他嚷嚷來一個英美軍事同盟的時候，英美聯合參謀會議，仍經常在華府開會，在大戰業已「結束」很久，他們一直還在開會中。

生死攸關之三强團結，是漸漸解體了，事實上這一解體的日子是甚至可以說在戰爭尚未結束前已然開始了。在納粹崩潰三個月之前，三强外長及陸長就陸續在倫敦，華府及莫斯科集議了，草擬着德國投降備忘錄，規劃投降條件應該如何。經過幾次研究，就此項備忘錄，獲得最後協議。莫斯科曾以此備忘錄一份，訓令朱可夫元帥遵照，但倫敦及華盛頓却並未將此項紀錄送達在盟軍總部的艾森豪威爾將軍。事實上，艾帥規定的投降條件，是他參謀長史密斯將軍所擬的，因爲艾帥不知道有是項文件存在。蘇聯因此惱怒，是否足奇？其後她對美英不遵照雅爾塔規定，未立即在彼等應該撤退的佔領地帶撤兵，表示憤慨，亦是否足奇？此時蘇聯對英美佔領德國當局，並未盡力履行也是在雅爾塔規定的賠償程序，亦是否足奇？

因爲這一串事實的發生，無可避免地激起克里姆林的反響。無疑地，自從對德勝利之後，史大林及其顧問決定了，假如全面情形，顯着地是向着同盟之解體，他們就立刻要想修理保護自己的牆，以預防意外了。鐵幕之起，並非簡單，其存在是有種種理由的。如果邱吉爾能指責歐洲有個鐵幕，則史大林可以告訴他需要鐵幕的原因的。不幸，國際間政治手腕，就是如此，邏輯是被片面指責別人「你可又兩樣了」的鬼術所代替了。回到這本書前面所述目前危急狀況之主要的基本的諸因，則我祇可說，是美國與英國先揮起裝甲的拳頭的，是美英第一個破壞了三強集體諸決議的。

同時亦須注意者，在槍聲終止後世界尚在昏慵狀態中的時候，我們放棄了一個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任務，即英蘇間調人的任務，因爲今日安全利害的衝突祇存在於這兩個國家之間。不僅不仲裁這兩個國家間的紛歧，（以前父親則是小心地從事仲裁），我們還挑一邊幫忙；比幫一邊還壞呢，我們不但單純地，在英國的傍邊，比齊而已，還要爲她擰腰。譬如，悲劇性的希臘例子，英國兵不顧英國人民公開的抗議，無情地屠殺反法西斯的希臘人民，我們還同英國外交部，一鼻孔出氣，宣稱那一場滑稽選舉是民主的。同樣，我們挑撥無甚怨言的土耳其，去反對蘇聯要求共管達達尼亞海峽。祇准兩國共管達達尼亞，並且基於地理上的原因，祇准希臘與土耳其去管！在這樣重要的一條海峽，我們支持英國反對蘇聯管理如此重要的海峽的一切條件，我們是又一次無視了三強團結的原則。

再舉伊朗的例子來說。假如不是故意使其尖銳化，伊朗問題在這裏不過是一場眞正滑稽劇而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時常是完全置伊朗政府的請求於不理，由英美作主人的結果，把伊朗問題繼續保留於

議程中，好像牠是從來未有危脅和平的事件似的。其實事實很容易知道：英國滿心妒嫉它，把持着伊朗南部油礦的特權，按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的比率分油田之肥，自然那比較多的一半是屬於英國這獅子的；蘇聯呢，在伊朗北部油田則按一半一半制分配（同時應該記着，伊朗北部油田是與蘇聯已庫油田很近，是一脈相連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把這件事，當作反蘇運動日了。所有美國的專欄撰述者，評論家，到處聯合一致地抨擊俄國人都是帝國主義者。我們所見所聞，幾乎要接受這種歪曲意見了，因爲老是喋喋不休，如此如此重複地宣傳着。

伊朗問題之重要，其值得重視之處就在富有啓示，啓示給我們知道，在倫敦華盛頓有一批詭計多端的人們，急於想製造，鼓動仇視蘇聯的戰爭空氣，好似蘇聯不會對納粹主義的武裝力量，肯當其衝過，俄國人不但首當其衝並且還推翻了納粹，這就是什麼爲了和平而聯合蘇聯一直是佔重要性的自明之理。

如果我如此說，如此彈調，那是因爲我有權利，雖極微渺，如此地說；因爲我曾經，與那些使我不忍回憶其衆多之已死殉戰烈士，共同工作過，共同飛翔過。發現他們所完成的事蹟在不及幾個月後就被人蔑視並不是愉快的，更何況蔑視他們的貢獻的人們又是些始終不曾（即使在珍珠港事變以後）在正確的角落裏露過臉的人物呢？聽到那所謂新「國際主義者」的叫聲，在今天特別尖銳，也是不能愉快的，——國際主義觀念的議員，是想用一種國際聯合來發動第三次大戰，來向一位曾經在第二次大戰中是我們的戰友進攻的。

是我用了「有一批詭計多端的人們」這句話，同時我還要指明他們就在華盛頓。或者我應當更指得明白點。我現在想到國務院的那一批職業人物，父親從來沒信任過他們，這裏包括某些人，時常錯認他們是我們外交事務的「專家」的。我想到國會裏，無論兩黨中那一黨的那些反動派，他們死硬認爲最重要的是將來走那一邊，而不是爲將來大家一起合作。我想到我們那些「新聞自由」的衞士們，這些新聞是英勇地主張不負責任的自由的。這些就是用最漫罵的口吻來反對三强團結原則者，因之他們堅持否決權是一種「毒惡的制度」。

同時我也想到，那些把我們外交政策縮成原子彈大小的人們，那些軍官們，祇往他們自己職業前途着想者，是準備好，隨手就可以宣佈：文明不過一堆瓦礫而已。

我曾經表示過，我認爲可感謝的是美國習慣及其傳統，不准軍人控制國家的命運。我確信法律規定總統是海陸軍大元帥，而總統傳統上都是平民，決非偶然。但我們不可忽略，應該清醒地看出，實際上軍人已經僭越把握了戰後外交的大權。我並非批評馬歇爾在中國的工作，也不把史密斯將軍在莫斯科任大使除外。我亦未，也沒有要論辯而不承認李海海軍上將不是總統最好的外交顧問。但是我要主張這些重要的外交職位，是應該交予文官的，一個像美國這樣不好戰的民主國，依靠軍人們來取得國際事務資料與指導國際事務是不適當的。軍事人員走到美國政治或外交界，必須嚴格先脫離軍隊，或退休爲平民之後才成。

軍人外交之危險性，必須明瞭，軍人統率的是軍隊，只有在進步的外交政策之下，軍隊作爲此外交

政策之工具的時候，軍隊始能成爲進步的力量。這就是爲什麼，不管人多麼能幹多麼高尙，他是不能同時管理外交又統率軍隊的。我國海外駐軍的態度是這一理論的富有興味的證人。在我們士兵相信他們爲勝利而戰，一般說來，他們是愉快地，拋棄家庭妻子，兒女天倫之樂，寧願領非常少的一點牛肉，負起鬥爭與勝利的負任的。兵士們「讓我們回家」的騷動，遲至波茨坦，都沒發生過，因爲當時仍然似乎有——亦確有，爲民主而服務的具體工作，要在被征服的法西斯的老巢中推行。一旦，他們作戰的目標——三巨頭在德黑蘭條約中向世界保證的，卽主要的「爲人民子子孫孫謀和平的目標」，已然日趨顯然幻滅的時候，從巴黎一直普遍高漲到東京的回家怒號在華盛頓引起十分敏感的配合。

讓我把事情交待很清楚，我並非反對維持龐大軍隊。恰好相反，我是贊成的，假定這軍隊是依據聯合國憲章，用來作爲保障國際安全的軍力之一部份，祇要聯合國各國依據上述這一假定去做，這正是聯合國的基礎，也就是說，三强團結更空前的進了一步。

現在我該問這一問題了：我們能做什麼？我們這些並非美國政府一官半職之人，但較諸官兒們更重要者，也就是說，美國公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做什麼來保險我們的政府，重返羅斯福所指領的路上去呢？

回答這一問題，我必須很簡短的寫下一個教訓來，我最初由歷史中，其後由觀察我父之爲總統中，得到這一教訓。在我國，我相信，那些非常反應敏銳，非常接受人民的明智而又聰慧的願望的總統，是最偉大的總統。林肯直到美國內戰將近兩年之後，才能在解放黑奴法案上簽字，解放了黑奴，並非因爲

北美人民當時沒有迫切的壓力，他才如此作；適乃由於當時要求的壓力，尚不充份之故。在美國的民主制中，總統與人民間存在着一種關係，維持此種關係之應有的聯繫則又非常稀有。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是美國的公民，如果那一位總統有意作一個偉大總統，我們必須協助他。假設說羅斯福是一個偉大的總統，則主要地應感謝在他四次白宮任內，美國人民之能公開發言，明白表示其對國事的意見。

譯後記

寒冷的冬夜，在燈下把全文校完，雖在疲乏之中，却感覺到有一點歡愉輕鬆地盪漾在心裏。終算把一個月來壓在身背上的担子給卸掉了。

原定是在二十天內把全書譯出的，不曾料想到在翻譯的時期內發生了好多私人的事務，大大地減少了預定的工作時間。中間我到南京去了一次，其後又爲住居問題而苦惱，而奔走。總之，這本書的翻譯是在不安的心緒與忙碌的生活中擠壓出來的。最初讀完一本書時所引起的激動的感情也就在趕譯的過程中因上述的原因而逐漸冷却，或許因此有了一些疏忽，欠缺了一些譯者應有的熱誠，這是我應該向讀者致歉的。

書終算譯完了，但是却把預定出版的時期給就誤了。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中，物價的波動，印刷的困難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影響到一本書的出版的。書之不能如期出版因此似乎也不足爲奇。但是這本書却是一個例外。假如說這本書之不能如期印出曾經引起了許多關切這本書的讀者的失望與責難，那麼這責任是應該完全歸之於譯者的，因爲出版者，發行者與印刷者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給予這本書的產出以最大的便利。

有幾位朋友是應該值得譯者表達深沉的謝意的：託朋友從美國以A——I的優先空郵權把這本書寄

給譯者的美國新聞處的貝納脫小姐，爲這本書的出版與印刷而奔走接洽的以羣兄與盛舜兄，以及因爲我時間不及而代我譯出最後二章（十，十一）的王達仁兄。達仁兄在譯作兩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但是爲了使全文的譯筆與格調能够一貫起見，我非常狂妄地在某些地方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動。假如會因我的改動而引起某些翻譯上的錯誤，那麼這責任也在於譯者。

離開中國四年，好些人民與地名的標準譯名也便非常不熟悉。但是大體上講來，總是努力在譯者的見聞範疇之內使它們與一般報紙上常見的譯名相符合。因爲是隨譯，隨排，隨校的，有些小地方在前後文中之不能統一或許是免不了的。爲了閱讀與排印的便利，全文亟力設法免除英文原字的使用，比較重要的人名與地名，在書尾附有中英對照的索引表。

關於這本書的整個的意義與可能引起的作用與反響，原作者在書中，尤其是在前言及最後一章中，已經敍述得十分詳細。在這兒再加上些譯者個人的介紹與評述似乎是十分不必要的。羅斯福總統已經死了，他的計劃與他的路綫也被背棄了，但是我相信，堅決地相信，他的偉大的理想却依然活在每一個愛好和平，愛好民主的人民的心中，給目前在寒冷中掙扎的人們以一點溫暖，給在黑暗中呻吟的人們以一線希望的光輝。

希望這本書中的譯本的出版能够引起一點反響，一點激動，使好戰的，反動的份子能够放下殺人的武器，爲他們的，以及我們的子孫，作一點清醒的，人性的思考與反省。

一九四六・十二・二十二日，於陋巷。

譯名中英對照表

（以筆劃爲序）

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
乞威爾(英)	LORD CHERWELL
爪哇(地)	JAVA
巴力斯坦(地)	PALESTINE
巴頓將軍(美)	GENERAL GEORGE PATTON
巴魯喀(美)	BERNARD BARUCH
比基尼(地)	BIKINI
孔諾萊將軍(美)	MAJOR GNL D. H. CONNOLLY
卡太基(地)	CATHARGE
卡薩布蘭伽(地)	CASABLANCA
卡爾(英)	SIR ARCHIBALD J. KERR CLARK
史大林(蘇)	STALIN
史大林格勒(地)	STALINGRAD
史巴茲將軍(美)	GNL CARL A. SPAATZ
史沫茲元帥(英)	F. M. JAN C. SMUTS
史塔克海軍上將(美)	ADMIRAL HAROLD STARK
史密斯將軍(美)	MAJ.-GNL WALTER F. SMITH
史迪威將軍(美)	GNL J. STILWELL
李海海軍上將(美)	ADMIRAL WILLIAM D.LEAHY
李普曼(英)	WALTER LIPPMANN
西西里(地)	SICILY
伏洛希羅夫(蘇)	KLEMENTY E VOROSHILOV
安齋奧(地)	ANZIO BEACHHEAD
安諾德將軍(美)	GNL HENRY ARNOLD
多得喀尼斯(地)	DODECANESE ISLANDS
艾登(英)	ANTHONY EDEN
艾森豪威爾將軍(美)	GNL DWIGHT EISENHOWER

吉倫將軍(法)	GNL HENRI H. GIRAUD
伊朗(地)	IRAN
阿蘭(地)	ORAN
阿爾及爾(地)	ALGIERS
沃根基(地)	ARGENTIA
貝弗勃洛克(英)	LORD BEAVERBROOK
貝爾納斯(美)	BYRNES
邱吉爾(英)	WINSTON CHURCHILL
克拉克將軍(美)	GNL MARK CLARK
克里米亞(地)	CRIMEA
沙地阿剌伯(地)	SAUDI ARABIA
狄爾將軍(英)	F. M. SIR JOHN G. DILL
杜爾諾(美)	GEORGE DURNO
法屬摩洛哥(地)	FRENCH MOROCCO
依諾奴(土)	ISMET INONU
依斯梅將軍(英)	GNL SIR HASTINGS ISMAY
金(氏)海軍上將(美)	ADMIRAL ERNEST KING
拉巴特(地)	RABAT
岡比亞(地)	GAMBIA
亞歷山大將軍(英)	GNL SIR H. ALEXANDER
亞頓(地)	ARDENNES
勃魯克將軍(英)	GNL SIR ALAN BROOKE
勃乞(美)	HARRY BUTCHER
柯銀漢海軍上將(英)	ADMIRAL SIR A. CUNNINGHAM
柯克大使(美)	AMBASSADOR A. C. KIRK
威爾士(美)	SUMMER WELLES
威爾遜(英)	GNL SIR HENRY M. WILSON
哈立曼(美)	W. AVERELL HARRIMAN
范登堡(美)	A. VANDENBERG
馬爾他(地)	MALTA
馬歇爾將軍(美)	GNL GEORGE MARSHALL
紐芬蘭(地)	NEWFOUNDLAND

泰德(英)	A. C. MARSHAL SIR A. W. TEDDER
格羅夫斯(美)	MAJOR GNL L. GROVES
曹台洛(希)	EMMANUEL TSOUDEROS
梵諦岡(地)	VATICAN
麥克阿瑟(美)	GNL DOUGLAS MACARTHUR
麥克美倫(英)	SIR HAROLD MACMILLAN
麥金泰(美)	ADMIRAL ROSS T. MCINTIRE
莫洛托夫(蘇)	VYACHESLAV MOLOTOV
華生將軍(美)	GNL EDWIN E. WATSON
雅爾塔(地)	YALTA
奧但尼爾(美)	W. LEE O'DANIEL
勞逸斯將軍(美)	GNL RALPH ROYCE
達喀爾(地)	DAKAR
達達尼爾(地)	DARDANELLES
達爾朗(法)	DARLAN
提恩將軍(美)	GNL JOHN R. DEANE
道格拉斯將軍(英)	A. C. MARSHAL SIR S. DOUGLAS
費(小羅斯福夫人)	EMERSON FAYE
發洛克(埃)	FAROUK, KING OF EGYPT
菲許(美)	HAMILTON FISH
敦巴敦橡樹	DUMBARTON OAKS
費利曼將軍(英)	A. C. MARSHAL SIR W. R FREEMAN
賈德幹(英)	SIR A. CADOGAN
雷道爾夫(英)	RANDOLPH CHURCHILL
雷多公路(地)	LEDO ROAD
蒙巴頓(英)	LORD LOUIS MOUNTBATTEN
蒙高茂萊將軍(英)	F. MARSHAL SIR B. L. MONTGOMERY
赫爾利將軍(美)	GNL PATRICK HURLEY
墨非(美)	ROBERT MURPHY
摩根索(美)	HENRY MORGENTHAU JR.
摩爾曼斯克(地)	MURMANSK
魁北克(地)	QUEBEC

鮑拉(美)	WILLIAM BORAH
鮑倫(美)	CHARLES BOHLEN
鮑梯格(美)	MAJ. JOHN BOETTIGER
潘脫萊列亞(地)	PANTELLERIA
德黑蘭(地)	TEHERAN
慕尼黑(地)	MUNICH
撒拉(英)	SARAH OLIVER CHURCHILL
霍浦金斯(美)	HARRY HOPKINS
諾戈斯將軍(法)	GNL CHARLES NOGUES
邁克(美)	MIKE REILLY
賽伐斯托波爾(地)	SEVASTOPOL
魏納脫(英)	JOHN G. WINANT
戴維斯(美)	JOSEPH DEVIES
戴高樂將軍(法)	GNL CHARLES DE GAULLE
龐德海軍上將(英)	ADMIRAL SIR DUDLEY POUND
羅美爾(德)	F. M. ERWIN ROMMEL
蘇末維爾將軍(美)	GNL B. SOMMERVELL
蘇石蘭將軍(美)	GNL RICHARD K. SUTHERLAND
盧得士(英)	LORD LEATHERS
穆罕德特·萊閘·派萊維(伊)	MOHD REZA PAHLEVI

(GNL = GENERAL
F.M. = FIELD MARSHAL
A.C. MARSHAL = AIR CHIEF MARSHAL)

這本書是一個觀察者對這一次世界大戰中幾次重要會議的最直接的報導，未來的歷史家們將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很珍貴的資料，足以幫助他們對歷史作最後的評價。

——羅斯福夫人

一九四七・二月初版
一九四七・四月再版
一九四七・六月三版